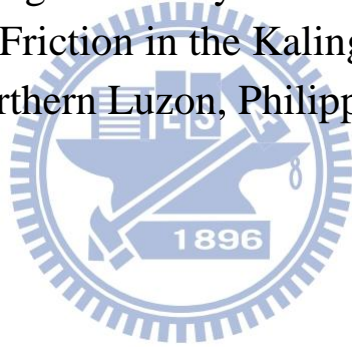


國立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碩士論文

「電力與邊緣的叢結」－
菲律賓呂宋島北部 Kalinga 村落的權力與制衡

Assembling Electricity and Marginality:
Power and Friction in the Kalinga Region of
Northern Luzon, Philippines



研究生：陳貞宇

指導教授：蔡晏霖 教授

中華民國 一百零二 年 一 月

「電力與邊緣的叢結」－
菲律賓呂宋島北部 Kalinga 村落的權力與制衡
Assembling Electricity and Marginality: Power and Friction in the
Kalinga Region of Northern Luzon, Philippines

研究生：陳貞宇
指導教授：蔡晏霖

Student: Chen-Yu Chen
Advisor: Yen-Ling Tsai

國立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碩士論文

A Thesis
Submitted to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Ethnicities and Cultures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in Social Science

Jan. 2013
Hsinchu, Taiwan

中華民國 一 百 零 二 年 一 月

「電力與邊緣的叢結」－菲律賓呂宋島北部 Kalinga 村落的權力與制衡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陳貞宇

指導教授：蔡晏霖

中文摘要

本文以菲律賓呂宋島 Kalinga 省村落的電力發展為主軸，探究 2010 年電力輸入前後的村落內/外關係演變，以及此地與各式政經力量的交會。

在不同的政治時期，Kalinga 所在的 Cordillera 山區都被建構為叛亂與封閉的邊緣地區。事實上，Cordillera 山區從未停止與國家和資本家共織的金權佈局產生互動。本文以電力研究為主，正是因為電力並非單獨存在的物質且背後埋藏著交錯的叢結，含括動力需求、政治角力、生態平衡、地方安全與利益嫁接等。

本文意圖指出，電力輸入不僅是政治事件，也是地方新治理階段的開展。電力對村落內部關係產生影響，也一併重組它與外部的距離與互動，甚至將內/外重新劃界。當國家與資方透過無/有電作為治理手段同時，村落居民透過自身的邊緣位置生產出制衡策略，以農作和買賣所構築出的生態網絡維持地方安全。因此，這座 Kalinga 村莊的邊緣性得以展現其多重的內涵與可能。

關鍵字：呂宋島、Kalinga、電力、地方生態、邊緣性

Assembling Electricity and Marginality:

Power and Friction in the Kalinga Region of Northern Luzon, Philippines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Ethnicities and Cultures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hen-Yu Chen

Advisor: Dr. Yen-Ling Tsai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introduction and influence of electricity in a Kalinga village, Northern Luzon, the Philippines. In 2010, electricity was gradually introduced to this village and therefore transformed the relations within and without the village.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brought about by electricity as well as the confluence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forces revealed thereof.

Despite under different political sovereignty, Cordillera Central Mountains, where this Kalinga village located, had been considered as a marginal and secluded area occupied by rebels. As a matter of fact, however, the interaction with and struggle against power network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capitalists never ceased. As a result of the complicated networks produc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electricity—including demand of electrical energy, political bargaining, ecological equilibrium, local security and profit grafting—the core of this paper is electricity.

The introduction of electricity was politically significant; it was a new phase of local governing. Electricity not only transformed the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village, but also reorganized the distanc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village and the outside world. In addition, electricity even re-mapped the boundary of inside/outside. While the state and the capitalists used electricity as a governing mechanism, the villagers figured out counter-strategy through their marginal positions. By means of agriculture and local business, the villagers constructed an ecological network to maintain local security. Consequently, the marginality of this Kalinga village contains multiple components and possibilities.

Keywords: Luzon, Kalinga, Electricity, Local Ecology, Marginality

致謝辭

學習、研究與書寫的路途，或走或跑、或晴或雨、或雅緻或困頓。這路上，記得與忘記、留稿和篩去、溫柔的以及沉甸甸的一切，我都輕輕巧巧地收在步步前進的微風裡。

我最感謝的是我的爸媽和妹妹們願意等待、守候和信任如同候鳥般的我。因為有你們為我暖著家，讓我總是在南回的日子裡飽足氣力和精神。我也要謝謝小阿姨、大阿姨和其他家人們對我一直以來的照顧。

本研究特別感謝教育部 101 年世界南島學術研究獎助計畫的支持。

謝謝交大與我的老師們。謝謝族文所在 2011、2012 年以頂尖計畫補助我的田野調查旅程，讓我有機會完成這份研究。最為謝謝晏霖老師，提供給我三年多來太多無條件的提攜、鼓勵與後援，在學識、工作、社會關懷和生活中都給我滿滿的溫土；謝謝老師一方面指導我但也給足我極大的空間作自由發揮。我也要謝謝清大的威宜老師，在課堂以及口試現場都為我的研究主題提供許多源源不絕的好建議並紮實我的理論根基，如此地讓我充滿研究上的活力。我也非常感謝雅仲老師與秀幸老師給予這份論文的修改建議和全力支持。另外，我還要謝謝簡美玲老師自我入學以來對我的關心與鼓勵。非常感謝族文所全體老師讓我擁有在所上與你們一同學習和工作的機會。在此，我也謝謝東華大學的葉秀燕老師自大學時期就像是我的推進器一般，鼓勵著我勇往直前；並謝謝羅正心老師贈送從花蓮來的田野筆記本。同時，我也謝謝東華大學的海外志工隊及所有成員，讓我有機會認識住在菲律賓山上的這一群人。

Most importantly, I felt an immense gratitude to my adopt family of Kalinga. Especially my adopt father, Mr. D-I. In fact, I couldn't write this thesis without his prolific life stories and open-handedness. Also, I was grateful that my adopt mother was always intimate with me and looked after me meticulously. Over and above, I must offer my heartfelt thanks to my dearest home brothers, sisters, relatives and friends. Besides, Uncle W. and his family members supported me a lot and I do really appreciate. Sorry to protect the privacy, I need to hide all the names in this thesis. Actually, I sincerely stored up all the acceptance, hospitality and kindness from all of you. *Salamat. Isdigiyoue!*

接著，我要謝謝在研究所生活中陪伴我的同學和夥伴們。謝謝璐誼，我們一起在交大的日子看似漫長但也轉眼即逝，謝謝有你陪我走過研究生的不同時期；

共同在研究室埋頭吃便當的半年多，現在想來都是趣味。謝謝亮亮的認真跟溫暖，有你的那些日子想來都好愜意。謝謝孔伶總是帶來繽紛笑語並照顧著我。謝謝阿餅自大學以來都很關照我並時常為我解圍。謝謝宜娟，給予我許多信心喊話，並且總是不吝分享經驗與心得。謝謝小玉總有辦法創造學業上的激盪以及占卜解密、謝謝擁有美食好品味的柏帆贊助口試蛋糕。謝謝小恩曾與我一起在工作上奮鬥以及自華一直以來的鼓勵和陪伴。謝謝研究室吃飯團成員，明政、景宇、美玉和美晨；明政總為低迷的氣氛帶來搖滾的生氣，景宇總是記得照顧我們的胃並打氣，還有美玉和美晨總是讓研究室午餐時間顯得熱絡。謝謝交大農社的所有人，即便各自奔忙，但你們的熱情就是最棒的貢獻。我也相當感謝在族文所一起努力著的大家。

此外，我還要特別感謝社文所的姿萱學姊，在課業跟工作上都是值得學習的對象，並不厭其煩地為我指正英語寫作。還有清大人類所的怡潔，在研究與論文各方面給予我建議，並且總以誠摯的笑容鼓勵我。同時，謝謝清大人類所的mokki、小多、瑟晏、萱佩在修課、口試及工作上的大力相挺。我還要謝謝雅嬪和秋伶總是妙手化解我在工作上的各種的疑難雜症。還有交大圖書館館員長期為我處理國內外的圖書借閱。

要感謝的還有，我大學時期的朋友劭瑀和陳偉，曾陪伴我一同到 Kalinga 山上久待半個多月，並且回國後製作細膩出眾的攝影集與展覽。我也非常謝謝麗華，總是掛心和陪伴我，為我寄送論文、連線聊天並且從高雄寄來水果點心。我也要謝謝美姬，謝謝你共伴在新竹的日子，以及印論文、搬家、唱歌和所有，有你在時總是陽光燦爛。謝謝秀儀，為我緊繃的研究生生活帶來話題與樂趣。我也謝謝意筑曾為我解答文本和精神作伴。還有，我在此也要大大地謝謝自 2010-2012 年贊助文具、衣物等種種物資的各方朋友們，謝謝你們的慷慨相助。

最後，我要謝謝溫翔翔。謝謝你在我田野期間為我處理台灣的瑣事，也給我許多支援和建議：更多的是，謝謝你分擔我的心情，並且相伴左右。

感謝這一路來的總總，化為我人生中重要的養分與光景。感謝 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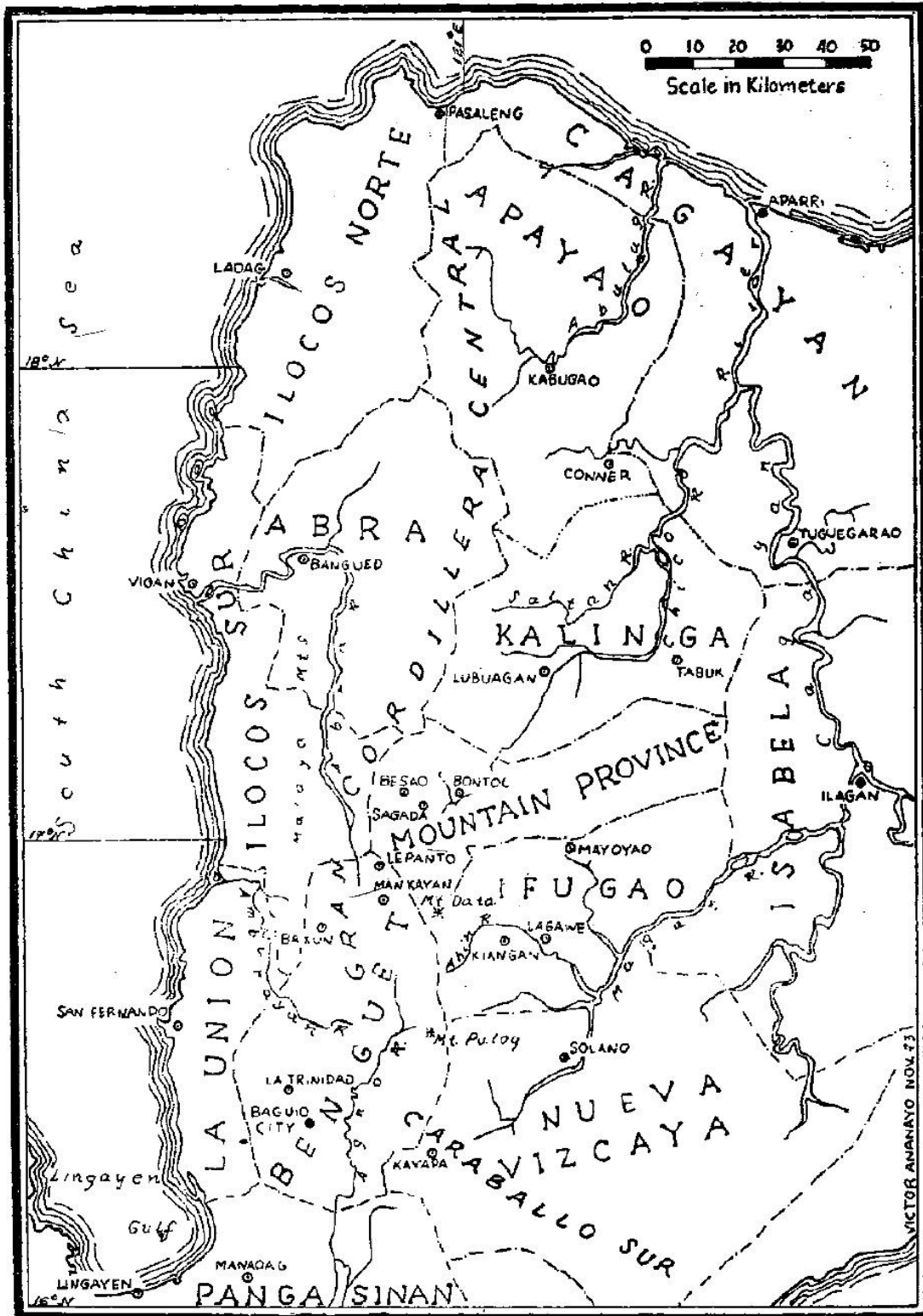
貞宇 謹記

2013.01.28 竹北

目錄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
致謝辭	iii
目錄	v
Cordillera 山區地圖	vi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緣起	2
第二節、問題意識	4
第三節、文獻回顧	5
第四節、田野地概述	13
第五節、研究方法	24
第六節、論文架構	27
第二章、「被殖民的邊緣」—呂宋島 KALINGA 的歷史與人群	28
第一節、殖民政權掌控下的菲律賓近代史	30
第二節、貼在 CORDILLERA 山區的標籤	38
第三節、來到上村	47
第四節、小結	52
第三章、「底層的共存者」—多重附生的政治經濟角力	54
第一節、後冷戰的鬼魅	55
第二節、在電力之前	67
第三節、小結	74
第四章、「界線與關係的重劃」—電力與上村的遭逢	79
第一節、電力架設	81
第二節、界線與關係	85
第三節、伴隨電力而來的間接影響	96
第四節、抵禦策略	101
第五節、小結	105
第五章、結論	107
第一節、從槍桿到電線桿	107
第二節、從抵抗到制衡	109
第三節、未來的研究展望	111
第四節、再思邊緣性	112
參考文獻	114

Cordillera 山區地圖¹



A. The Cordillera Region of Northern Luzon.

¹ 此地圖取自 Scott W. H. (1977:1)。

第一章、緒論

”Good morning, sister. Come in, man-a-pe.”²

天色黑矇矇一片，上村的婦女們已經起步到離村不遠的池塘，洗了僅限清晨才有的溫水澡。³陽光緩緩曬暖這座村莊，婦女們已經準備好供家人喝的熱咖啡、早飯。此時，上村逐漸滿溢熱絡的氛圍。公雞啼、豬隻叫、狗吠與小孩鬧，還有收音機的歌唱、劈柴聲與閒聊。空氣中的鵝黃色迷霧尚未散去，洗菜、洗碗、洗澡、洗衣的一群人已擠在公用水龍頭下忙碌著。剛砍完柴的青年、等待上學的孩童、準備到城裡工作的人，坐在陽台上、家門邊、火爐旁喝上一杯現煮的甜甜黑咖啡。”Man-a-pe”(來喝咖啡)也像是招呼語一般，傳遞居民的熱情與善意。裝在鐵杯或是塑膠杯裡冒著熱煙的深黑色咖啡，彷彿開啟一天生活的鎖鑰。在聲聲的 Man-a-pe 中，我得以與此地相逢、對話與共處。



圖 1-1(左)：居民住家一隅的火爐、炊具和柴。⁴

圖 1-2(右)：婦女和少女們一天生活的起點，往往是從公用水龍頭開始的。

² Man 作為動詞，”man-a-pe”是指喝咖啡；而咖啡的單字則為 kape。

³ 村落附近有一池塘的池水在清晨時，因為水的溫度比高山氣候更高。因此趁清晨去洗的話，就會有「溫水」。這池溫水大多是早起忙碌家事的婦女和小孩會去洗；婦女們說這樣可以節省木頭的消耗而且水量相當足夠。

⁴ 本文當中的照片若未特別標註，表示圖片是作者自攝。

第一節、研究緣起

本研究論文的田野場景在菲律賓 Cordillera 行政區 Kalinga 省水壩區的上村。⁵我對於 Cordillera 山區的認識源於 Cordillera Day。1974 年，菲律賓政府打算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合作在 Cordillera 山區的 Chico river 下游興建水壩 (Chico River Dam Project)。⁶但居民認為政府真正的目的是為了要挖掘當地豐富的礦場資源。⁷一旦興建水壩就會淹沒許多 Kalinga 當地的村落，人民也必須離開自己的家鄉，造成人民生計問題。村落因此群起反抗政府興建這座水壩。菲律賓中央政府為此派遣大量軍隊、警察進駐 Kalinga 鎮壓，也引發當地長期的武裝抗爭行動。1980 年，一位住在 Kalinga 省內 Dupag 村莊的長老—Macling Dulag 被軍方蓄意暗殺後，人民的反抗聲浪更加高漲。迫使菲律賓政府取消水壩計劃。不過，政府的暴力威脅沒有因此而解除，反倒透過各式的監控讓人民生活在恐慌之中。Cordillera 的人民於是組成 Cordillera People Alliance，並在 1984 年以過世長老 Macling Dulag 的逝世紀念日定為 Cordillera Day。⁸之後，一年一度的 Cordillera Day 就成為菲律賓國內外的人權工作者(含台灣)、各國原住民族、學者專家、國際記者、關懷者們所共同與會的重要日子。每年的 Cordillera Day 不僅是個具結盟意義的發聲平台，更跨界地讓來自不同國家的人民與組織相互串聯，形成一股來自群眾的集體反抗共識。因此，我認為探究 Cordillera 地區的群眾與議題是重要的，原因正是它位居邊緣，透過邊緣可以映照出中心形成的過程，看見中心發展所引發的殘缺與暴力。

我在 2010 年首次與上村居民接觸。當時，我參與台灣東華大學海外志工隊，因此得以與 Kalinga 上村耆老—迪爸結識，並種下之後持續互動的友好情誼。Kalinga 山區居民對於「陌生人」(尤其是外國臉孔)的出現總感到排拒、警戒。山區村落之間的往來是透過親屬、婚姻或是買賣的關係締結。任何人在 Kalinga 山區的生活經驗都仰賴稠密的人際網絡。我也不例外，我因著迪家的收養和款待而得以進入上村。⁹迪家人帶領我參與家族的婚禮、慶生、財產轉移等儀式，讓我

⁵ 本研究內容經諸位報導人同意後進行書寫。但我基於保護田野地與報導人隱私，將以全匿名方式取代人名，而地名則是真、匿名混用。研究地點的地理位置與村落(barangay)、聚落(village)關係會據實呈現。上村內含有藏峰聚落、綠聚落和隱聚落，我將以聚落規模(面積、人口)最大的藏峰聚落研究成果作為上村的代表。

⁶ Chico river 是整個 Kalinga 省內主要的河流主幹，由此河延伸出許多支流。

⁷ 菲律賓的礦產在世界儲礦量中佔有重要地位，種類主要有：金、銅、鎳、鉛、鉻、鈷等。而 Kalinga 省內最多的礦產則是金礦和銅礦。(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in the Philippines, n.d.)

⁸ Cordillera Day 起源參考自 Cordillera People Alliance 網頁：<http://www.cpaphils.org/> (2012/10/10)

⁹ 另一方面，也因著東華海外志工隊對於水壩區的兒童教育、部落關懷有長期的耕耘。居民因此

在村莊裡有了「女兒」這個位置。我在研究者和迪家乾女兒的雙重位置中，面對研究挑戰/阻礙時有現身和隱身的轉變機制。此轉變機制協助我克服許多田野中的狀況。不過，雖然我致力建立與村落人群的互信感和熟悉度，並非全村的人都理解我長待於此的目的地。有人會問「你是否在替台灣政府工作？是軍方嗎？」「你就是一個調查者，你在這裡調查什麼？」。這些居民們的防備與抵禦也啟發我思考上村因歷史、位置和環境所發展出的當代處境。

上村在國家眼中被視為原住民居住地。菲律賓原住民位於主流政治、經濟、社會的邊緣，且在環境資源主權上與國家有矛盾關係。菲律賓原住民基本的生存保障仍因著國家內部的鬥爭被犧牲著，且其族群權益的爭取仍尚未被普遍重視。菲律賓原住民的人權保障是近幾年世界原住民權益團體極力呼籲各界聲援的議題，可見菲律賓原住民的處境仍是相當艱難。¹⁰ 不過，透過在上村的研究，我發現居民將「邊緣位置」視為一股力量，並由此生產行動策略與生存動力。我認為：在全球政經力量擠壓、國家政策剝削下的上村居民為了生存而動員、抵抗、制衡的路徑是值得被觀察與看重的。因此，我選擇來到上村，也選擇了牽連政治、經濟與生態的電力發展歷程作為研究的切入點。

上村是一個山村，四面環山並以梯田經濟為主要生產模式。上村在 2010 年以前是個無電村。「無電」的狀態容易讓人聯想到閉鎖與邊陲，但歷史上看上村所在的 Cordillera 山區，與平地、城鎮之間的貿易往來淵遠流長。我在本文中並不以「部落」稱呼 Kalinga 的村莊、區域，原因正在於當地的社會結構組成與我們所想像的「部落(tribe)」並不相同(Eggan, 1963:349)。人類學家 Barton(1949)、Dozier(1966)和 Takaki(1977)都以「區域(region)」作為基礎單位並以此單位進行研究。「區域」是 Kalinga 當地人以防禦為目的所組成的基礎單位。我所在的「水墾區」在過去是一個擁有在地主權的區域，曾與其他 23 個區域締結和平協約 (Peace-pact, *Podon*) (Takaki 1977: 23)。山區各地域之間透過「和平協定」產生了多重的共生滋養關係(Barton, 1949; Takaki, 1977; 劉芝田, 1971)。¹¹「和平協定」也是 Kalinga 當地不成文的律法，由各區域透過慶典儀式簽訂。一旦觸犯會引來

較為熟識「台灣人」，而我則因著台灣人的身分與其他外國人有所不同。

¹⁰ 舉例：菲律賓原住民聯合會(Kalipunan ng mga Katutubong Mamamayan ng Pilipinas)於 2012 年仍請求國際援助，並要求菲律賓政府、軍隊停止非法殺害原住民領袖並尊重其人權。資料來源：[http://www.aippnet.org/home/daily-sharing/967-philippines-stop-the-killings-of-indigenous-peoples-leaders-justice-for-genesis-ambason\(2012/11/15\)](http://www.aippnet.org/home/daily-sharing/967-philippines-stop-the-killings-of-indigenous-peoples-leaders-justice-for-genesis-ambason(2012/11/15))

¹¹ 各地區可依其政治需求簽訂數十個到數百個和平協定(Dozier 1966:12)。另外，本文中斜體字部份則為 Lubuagan-Kalinga 語的用詞，拼音用法參考 Takaki (1977)。

相當嚴厲的責罰。和平協定的建立，可使雙方進入對方的土地上活動、貿易和旅行，進而通婚。「和平協定」會與時更變，數年後可進行修改、延續，以適應不同情境下的當代所用。然而，在現在的菲律賓行政地圖上，「區域」不是一個單位，而且被切割成為數個村(barangay)，化為國家行政地圖上有整齊界線的一個個村落。以水墾區來說，現有三個村，依據地理相對位置分為上村、下村和西村。

我對於上村的研究聚焦於電力輸入後對此村所產生的影響和各式力量的交會。電力作為一現代基礎工程，因此常被用來作為地區分類的門檻，例如無電同等於資訊流通落後、社群孤立等；有電則是現代社會的基礎條件，快速的網路更是象徵著一地的科技、進步的重要指標。誠如 Tsing 在 *In the Realm of the Diamond Queen* 一書中提及，都市人想像的貧瘠，就是有系統地否認現代存有的差異性；因為現代人鮮少認為這世界存在著差異，所以想像出一個部族、一個地域並且將它視為他者的再現(1993：x-xi)。¹²上村雖在 2010 年才有電力輸入，但是全球政經關係的糾葛與跨文化的滲透從未排除此地，所以上村的改變是隨著這些力量匯聚而被牽動的。不過，上村居民的內部歧異讓他們在面對外力涉入時產生不等長的距離和阻隔。因此在理解村落變動樣貌時，我也不可忽略其內部殊異與在地歷史演變的脈絡。總之，我對上村的研究試圖突破部落社會/現代社會、落後/進步的分類框架，探討上村在有/無電的歷史進程中，以其位置的邊緣性與不同的能動者(國家、資方、異質居民)所產生的摩擦。

第二節、問題意識

從上村、Cordillera 山區到菲律賓，都歷經長久的殖民政權統治。即便高山、平原到城市有著不同的地理界限和地區發展，但它們都共同地經歷了殖民的侵略與剝奪。殖民政權為了有效治理，在地理區域上作出切割和分類。Felix Keesing(1962)就認為，菲律賓的高/低地作為文化區上的指稱是源自西班牙殖民政權的管控所需。西班牙殖民力量所滲入的範圍等同於邊界的區劃；也或是說，高/低地的區辨只是國家收編下的策略之一。我便以上村與國家治理、全球文化產生互動的可能性與路徑作出提問。本研究不再標籤化上村，或是讓人僅以「有所差異」這樣的觀點來看待它；而是希望在我書寫上村的歷史位置、政經關係和在地經濟的同時，幫助閱讀者思考上村與國家、全球化間的緊密關係，並且釐清

¹² 參考原文為：What these stories of the Tasaday and the Penan suggest to me is the poverty of an urban imagination which systematically has denied the possibilities of difference within the modern world and thus looked to relatively isolated people to only adversary, its dying other.

上村在當代跨界連結的關係所位居的視角和行動策略。

本研究以上村的電力發展作為探究的主軸。電力的特性與重要性在於它並不會單一存在，而有複雜的生成叢結(**complex**)。此電力叢結包括居民的動力需求、各方政治角力、村落生態平衡、生計安全與利益糾葛；也就是說，電力的發展遠比表面所見的日常平靜樣態來得更複雜。伴隨電力而來的還會有新物質型態、人際互動網絡、社會與地景的變遷等。我試圖理解上村的當代樣貌如何在電力輸入過程中被形塑。我想問：在上村內部可見國家治理力量與在地制衡力量的撞擊、互動與揉合，而這兩股勢力的摩擦要如何透過電力的發展歷程來觀透？電力看似是單向地的關係(由國家電力公司為上村裝設電力)，然而實質上卻牽動上村內/外之間的政治、經濟與生態的循環網絡。我將從居民的眼中看電力與上村的邊緣性將如何產生關係，並且當國家與資方透過無/有電作為治理山區自然資源的手段時，村落居民如何透過自身的生態邊緣性生產出日常制衡策略？¹³

第三節、文獻回顧

電力的輸入叢結對於地方的政治、經濟與生態產生影響與變動。然而這並非單向的影響歸因而已，地方政治、經濟、環境上的能動性皆會與上村的電力生成、象徵意義發生連動。以下，我將針對 **Kalinga** 的政治生態與地方經濟進行文獻回顧，並希冀實踐生態觀點。此節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以政治生態觀點探究菲律賓原住民所處的當代局勢。第二部份透過在地經濟的勞動與交換討論高科技引入後帶來的變動。最後則回顧北呂宋相關的研究材料與民族誌。

(一)治理、環境與邊緣性

首先，先談過去 **Kalinga** 透過和平協定展開的地方政治關係。**Barton** 認為，過去的 **Kalinga** 各地並未形成如同國家組織(**state organization**)的部落型態，僅是以和平協定作為政治互動的路徑(1949:145)。**Dozier** 則說和平協定是用來作為化解區域衝突、危機的機制，尤其是在各地進行獵頭儀式的過程後能達到修復的效果(1966:1、153)。**Takaki** 則指出，和平協定的真正意涵含有宣稱在地主權的地域劃界概念(1977:4)。綜上述之，我認為和平協定作為在地的政治結盟關係，其關係的厚生在於人際、田地、親屬與在地認同等網絡的緊密共生。也就是說，**Kalinga** 一地具主權治理的政治基礎在於集體的共生意識。各地更透過和平協定發展出共

¹³ 「邊緣性」(**marginality**)所指的是與各式力量持續交會、互動的關係。(Tsing 1993)

生貿易(symbiotic trade)。可以說，Kalinga 地區的政治結盟對於貿易形態的資源共享有其必要性；和平協定更深的意涵在於維持各地之間的共生與資源交換。Kalinga 一地有高山、平原、小鎮跟村落等不同的地勢環境；和平協定管理著山區與山區、山區與平原、邊緣與中心之間的互動關係，形塑出一段相嵌、相嚙、相拌的歷史過程。

接著，我放大來看東南亞研究傳統中的「低地」(lowland)與「高地」(highland)之分。低地和高地的生態與社會向來被視為兩個截然不同的系統。例如低地就是國家文明開展的緣起，且有集約農耕(象徵著知識與技術)的特徵。相反地，高地被歸類為異質文化的所在地；更重要的是，高地被視為國家(王朝)統治之外的地域。James Scott 在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2009) 中的洞見就是要翻轉高地與低地相互對立的研究傳統，轉而認為高地與低地是共生的歷史有機體。他以高地居民曾經生活在低地，低地居民曾是高地人為例，指出高地與低地的相互影響勢必存在，甚至是處於相互辯證的動態關係。從 Scott 的研究可知，「高地」並非被國家隔絕的所在，高地是居民的政治選擇，是居民主動透過選擇地理位置作為一種政治策略。我認為在歷史資料、官方紀錄中，可看出政治二分假設的裂縫。例如菲律賓山區的群體分類與資料書寫產生許多混亂。殖民政權透過語言(音)研究創造各地區的族群連結性、在地圖上劃出人群分布範圍、忽略各地之間的高度變動性等。而這正是由上而下的統治者俯視觀點所造成。對於國家而言，這些管理系統的建立與分類正是國家穩定主權的基礎所在。

同時，我也認為 Kalinga 的人們對主權的理解和運用，完全解構了一般對於「主權」的理解。Kalinga 對於主權的認知建立在環境資源的使用關係，且環境資源的主權是可以複數持有的；¹⁴這有別於一塊領土只有一個政治主權的想像。我以 Kalinga 的主權觀點重新看待高低地二分的思考傳統；一旦將高地與低地劃分，也就截斷理解高/低地生產關係的脈絡。另外，我們對於主權的可能性想像也箝制當代原住民與國家在土地、自然資源衝突的對應方針。Kamieniecki & Granzeier 以美國加州 Six Rivers National forest 的 Chimney Rock 地區所蓋的一條伐木道路爭端為例指出，穿越 Chimney Rock 地區原住民神聖領域的道路危及在地的生態文化安全(eco-cultural security)，但法院最終判決原住民文化權對於神聖地的保護不能夠約束美國政府在經濟策略上的利益需求。除此之外，當地的聯邦

¹⁴ 透過和平協定，不同區域的居民可共享自然資源的使用。

政府(地方政府)也以擁有此地的主權作為政治施壓。這正反映出在國家治理下對於主權可能性的閉鎖，並且國家透過法院、地方政府等一系列的結構來捍衛主權的正當性(1998:266-268)。

傳統上所認定的主權在全球環境關懷的實踐中不斷地被挑戰著。Litfin 便認為自然的主權(sov^{er}eignty of nature)也由社會建構而來，成為一種合理但隱含權力與支配關係的方式。他藉由環境議題的觀點提出「主權」的概念應被重新解構，應透過自治、控制與權力不斷改變的實踐，更可以是一個歷史性多變的混合體(1998:1-5)。¹⁵ Litfin 認為這就是主權綠化(the greening of sovereignty)的概念，是世界政治中一股可被期待的新動力。在 *The Greening of Sovereignty in World Politics* 一書中，Wilmer 提出近年來的原住民議題傳遞出原住民族要求依其知識範疇行使實際政治主權，尤其是自然環境的主權。Wilmer 更認為僅將自然/資源視為物件(object)是唯經濟論的謬見，且將自然視為由國家主權所能治理的觀點也是過於小看自然/資源的複雜性。他指出西方的主權實踐隱含著西方對於分離與自主的迷戀以及其男性氣概的展現，由此說明原住民文化對於自然的建構與「西方」的差異。主權綠化的概念分解了我們對於主權不可分割的想像，也提供環境治理、族群政治的新思維(1998:55-56)。

談述完主權範式的可行性後，再回頭來看經歷過不同政治時期治理的 Cordillera 山區。菲律賓 Cordillera 山區自西班牙殖民時期就是殖民國家所企圖掠奪其山林、礦業、水資源的主要地區(W. H. Scott 1977:45-48)。也就是說，殖民政權治理該地的首重要點在於掠奪、侵占自然資源的珍貴性，並非增進集體國家治理的人民福祉；這當然也就造成國家主權概念銜接上的矛盾。Cordillera 山區與國家治理的矛盾並未因著菲律賓結束殖民命運而終結。在此矛盾當中，國家透過各種管理方式將 Cordillera 山區置於「邊緣」；並將此地居民標籤為不忠。Scott 指出：透過國家統治所形成的現代控管概念，重置了忠誠者與不忠誠者的位置(2009：11)。在國家治理的框架下，倘若不接受國家的統治規章，就成了對國家不忠貞的野蠻者/暴民。國家、人民、資方對於 Cordillera 山區的治理主權(由其在自然環境方面)爭奪是導致地方爆發衝突不斷的導引線，¹⁶菲律賓山區(原住民)

¹⁵ 不過，通常在國家管控下的地方不易有多重的主權範式。而這也就造成地方與國家之間的矛盾衝突所在，由是對於自然資源的主權。

¹⁶ 因此，在觀看水壩區的地方發展與政治事件時則必須理解在地與國家、資方之間的對應位置

與國家之間也因此在不同歷史時期中摩擦著。摩擦(friction)是一個比喻，Tsing 以此說明全球化場域中不同作用力的連結、合作、消長等多元揉雜關係(2005:3)。在全球政經關係環環相扣的當代，國際市場開放、資本主義擴張、區域分工的形成同時，也讓 Cordillera 山區與外部的摩擦更為多重。

且將焦點放到我所關注的「電力」來看；電力的政治意涵與象徵意義頗為複雜：電力需透過專門的技術與傳送方式才能被使用，因此電力使用是存在著門檻的。透過國家管理的電力會優先提供給再製發展價值的地方與機構，例如是經濟特區、工業區、大城市、行政重鎮、產業開發區等。如此來看，電力的線路就像是一條條的尺丈，丈量著各地域與權力核心(國家)的連接距離是否相近。而此政治力量不僅將其管理擴及自然資源使用，甚至也會透過「文化政策」進行遠端遙控。更進一步以「距離摩擦」來看，Scott 所指的是，當兩地距離越大，互動的空間就越少，因為所需的時間和花費都會隨著距離而增加，但其摩擦程度不僅是由地理位置決定，更會由社會、國家的策劃而操作著；例如透過地圖、橋梁、馬路等消弭距離所造成的摩擦(2009:166)。也就是說，當「距離摩擦」(friction of distance)減少，或是國家控管的方式轉為透過居民自身的需求，那國家的管控涉入就會變得難以防範。雖然對於山區居民而言，自身的權益不容讓渡給地方政府或是國家。但隨著國家對於地方的政治編制推動積極後，透過當代政治體系(選舉、指派)運作所產生的代言人與既得利益者結盟後，也就慢慢削弱了地方主權的凝聚。而電力和科技產品的輸入，則是填補了地方對於國家造成的混亂產生「合理」的想像與轉移，藉此達到國家得以介入的目的。這正呼應 Latour 所說，(有形的與無形的)科技網絡可以串連起更多連續性的可能，而這些可能性的連結既非地方也非全球，而是非規律的「力量的線路」。我在下一段將說明科技(電力)所接連產生的影響(1993：121)。

(二)科技發展下的地方變動與安全

我認為上村的經濟關鍵與 James Scott 提出的「安全第一」(safety first)原則有很大的相關性，且可供作為市場經濟脈絡外的一個對照(1976/2001:16-43)。我在上村的口述歷史中發現，上村並不能算是一個自給自足的村落。原因在於上村的山區資源薄弱，且長期有糧食不足的問題存在；而這些問題也正是位居山區村落共同困難。然而，山區居民在面對生產不足以及糧食危機時所作出的應對模

與內部參與者。

式並非無限制地擴充生產來源，他們會透過買賣交易、各地區親屬鏈的支援、手工藝品的製作，以及倚重山區生物的多樣性作不同季節的食材取用。雖然，上村目前並沒有脫離生產糧食不足的循環；不過上村也從未發生過集體的糧食危機或是饑荒。而這正是「安全第一」的重要性所在。

James Scott 於 1976 年發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以越南、緬甸的農民研究提出「生存倫理」以及「安全第一」的論點，闡明安全生存問題置於農民政治經濟考量上的中心位置，且農民的道義經濟更加著重在於社會公正、權力義務以及互惠等原則(1976/2001：1)。¹⁷其中，「安全第一」是指一種風險與選擇的評斷標準。也就是說，愈是處於生存邊緣的家庭，對風險承擔的忍受度愈低，「安全第一」的約束力就愈大；因此農民為了生存，必須常規性地進行生產活動，以保障和捍衛自身安全(1976/2001：27-32)。因此，Scott 著重談論的是農民的生命安全和糧食安全等生存問題。

然而，我將「安全第一」原則同樣地放到菲律賓高地來看。菲律賓高地上的居民或許不再同樣地面對 Scott 筆下的農民危機處境；但是同樣的部份是，「安全第一」仍作為居民對於風險評估以及選擇的依據。當居民遇上外來者進行開發投資，以及當地將面臨環境變動時，他們以「安全」作為最優先的考量。以上村來說，居民透過對比電力與地熱的安全與危險，傳達出居民對於「安全」的認知內涵。甚至於，我認為居民在此提出的安全第一原則，含括 Scott 所說的生命與糧食安全，另外也包括集體安全與環境安全的考量。也就是說，我在菲律賓高地所見的「安全第一」不僅是為了溫飽和生存，還包括了居民所認定的整體環境安全。

18

接著，我要說明電力作為一動力進入在地後所帶來的經濟上的擾動。電力對於在地經濟的擾動，包含其親屬關係、勞動與消費的原有排列組合。以親屬關係來說，隨著電力使用門檻降低(煤油較貴)後，各親屬鏈變得較短。親屬間各自工作、住所分離以及贈饋儀式簡化，只剩下單一家族、近親的互助關係較為顯見。也就是說，原仰賴親屬關係構築的在地連結關係有新的摩擦面產生。這個摩擦面有其利處與隱憂。利處在於原有的親屬鏈結關係中，較為凝固和無法被言說的衝突與關係得以找到出口。且電力輸入後所增加的動力與結點仍有利於村落的運轉

¹⁷ 以此對比在市場經濟中，資本家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作為依據。

¹⁸ 「安全」不僅是理論上的概念，更是居民在地使用的語言。

和新生。而隱憂是出現在於勞動和消費的新循環中。

首先，若從 Marx(2006〔1975〕)的資本論觀點來看待水墾區目前的電力使用與勞動關係，我們可以這麼理解：為了取得電力的使用，在地人必須首先選擇加入資本市場的勞動，才得以「交換」電力，因為電力是「無形的」商品(透過工業技術而取得)，在以物易物的場域中是無法交換到電力的。因為電力無法透過自行生產而得到，唯有透過「交換」，而交換的條件便是付出「勞動」。且這個勞動條件必須符合資方的需求，在定時、定地的場域裡工作才能得到固定的薪資。正如 Mckeown 提出的觀點：在市場的不對等關係下，勞動做為商品並非個人自由的選擇，而是在權力不均的狀態下所必須作出的讓渡(2011:63)。如此一來，資方/政府得到了可奴役的勞工、接受規訓的人民，勞工、人民則是必須交出勞動的自主權並遭受剩餘價值的剝削。

對於水墾區居民而言，進入勞動市場也就表示必須遠離原有的生活環境，不僅必須離開山區也必須離開家庭。在村子裡，有多戶家戶僅有女性與孩童居住，其丈夫皆在外地工作，由於距離和花費的考量，往往都是半年才能回家一趟。其勞動者的生活、情感、家庭皆一併在勞動力交付的同時也被犧牲了。不僅是勞動力外移，就連在聚落內所種植的稻米、水菜、農作物等也都相繼成為可交易的商品，透過居民到外地兜售換取現金；並直接影響到居民對於農作物栽種的選擇。雖然這些交易行為並非是在電力進入之後才出現，但電力進入加速了商品買賣的機會。原因在於，電力進入後，科技產品與電子商品的需求伴隨而來，為了滿足需求，勞動力的穩定交換就變得更加牢固。這便像 Marx 所說：「商品交換促成了多方的流動，且唯有透過交換商品才得以成為商品。」勞動力便是在這交換過程中也成為了可易的商品(2006〔1975〕:134-135)。

進一步探究村子裡農業機械使用上的轉變，也與勞動力的轉換習習相關。正如 Polanyi 指出，「人類的經濟是附屬於其社會關係之下的。(1991〔1944〕:115)」在尚未有農業機械前，水墾區仰賴人力勞動。舉例來說，每年三月播種時，地主僱請佃農或是親友協助農地的鬆土工作，以徒步行走方式進行鬆土。雖然此工作耗時耗力，不過還是讓部分人得到薪資；也讓現金從地主階級流到其他居民手上。後來，村裡購入公用翻土機，使得農作所需的勞動力下降；公用機械幫助地主的現金成本降低，使得他人可獲的薪資減少。也就是說，佃農必須轉作其他工作以賺取現金，甚至必須離開村落生活。以上各個例子都讓我看見，水墾區在電

力、科技產品、機械產品的使用日益增加之後，其經濟的循環開始鬆動與重構，相對也使得在地社會與環境的關係產生改變。也就是說，自由主義市場出現後讓勞力、土地成為可計算、可交換的「商品」，以此啟動經濟與社會的連帶影響。¹⁹

這讓我再思考到勞動與商品、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商品的特性是為了滿足某特定需求而存在的，這與自然環境存在的目的不同。在先前我提及，由於聚落內對於現金需求的增加，因此導致勞動力外移與轉換的過程，而這同時也影響了聚落內居民與環境之間的關係。一旦勞動力外移，便是直接地與生活環境脫離；當勞動力的轉換可以交換到所需的商品之後，居民可能便不再需要與環境之間維持緊密的關係如此一來，家戶與家戶之間、生活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會產生新的運作，使得「個體化」的可能性增加。正如同 Sallnow 對於巴拉圭 Qamawara 地區研究發現，當此山區的金、銀礦產逐漸取代農作物的價值與地位，居民們對財富的追求會讓人放棄他們原本在山區的種種工作，在地的政治信仰也會被財富的追求所掩蓋。而且文化邏輯中的金屬、道德及權力皆被重新排列組合，原先無市場模式所的居民合作關係皆不復存在(1989: 209-231)。

簡單來說，我在 Kalinga 上村看到的是：因著電力、勞動力以及商品三者的交換，使得村落內、外的分別不再絕對，甚至是重新劃界。也就是說，原先因著地理距離所劃分的內外部，隨著電力的使用與發展，使得內外部之間產生新的循環。隨著居民們對現金需求的日益增加，包括繳納教育費用、稅收、交通費、電費等，居民漸漸選擇可以獲得穩定現金收入的「好工作」、「好生活」(Faier 2009)。在 1970 年代之後，菲律賓政府推動輸出家務產業(domestic labor export industry)作為國家生產的經濟轉型政策(Tadiar 2009:1-22)，連帶使得菲律賓境內的女性外出工作機會大增。水墾區也有多位女性曾有過出國工作經驗，皆普遍大幅提升家庭所得並解除經濟負擔，使得更多女性趨之若鶩。而村落內的男性是選擇前往大都市工作，以賺取薪資供家庭使用；過去在山地聚落所仰賴的農作物買賣、自行種植食物等工作不再是首選，而只是補充「好工作」之外的勞動。勞動力的轉移和商品輸出入的流動，也進一步讓外部的訊息、觀念、行動一併伴隨而來，全球化的力量也在這過程中得以在地方介入。

接著就透過民族誌進入 Kalinga 的在地樣貌。

¹⁹ Marx(2006 [1975] : 56)認為商品是為了專門的、特殊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所構成的，而所有的商品都是自然(物質)與勞動(人力耗費)的結合。

(三)民族誌與北呂宋

北呂宋的族群歷史、慣習考究的文獻在美國政府殖民菲律賓時期有豐厚的累積。北呂宋的非基督徒(non-Christian)研究開展始於美籍人類學家 H. Otley Beyer(Zamora 1967:1-7)。20 世紀初，Beyer 針對北呂宋地區不同族群的語言研究著手(主要研究範圍是 Ifugao)；爾後提出北呂宋的七次遷徙周期作為呂宋島族群來源的解釋。於此之外，菲律賓本土的人類學研究也因著 Beyer 長住菲律賓與相關學者共同規劃研究單位並逐漸發展。Henry Otley Beyer (1967)、Felix M. Keesing (1962)、William Henry Scott (1974)和劉芝田 (1970、1971)等，他們對於北呂宋的民族慣習、語言、信仰和遷移有諸多的歷史考證和民族誌資料。²⁰

另外針對 Kalinga 所作的深入調查有 R. F. Barton (1949)、Edward P. Dozier (1966)、Michico Takaki(1977)等學者。根據他們的研究指出，Kalinga 可約略分為南/北兩支，Barton 與 Takaki 的研究範圍為南支，Dozier 在北支。南北 Kalinga 的語言相通、物質基礎相當且文化模式相去不遠；兩支最大的判別標準在於稻作，北支種旱稻(dry rice)，而南支則種水稻。由於稻作不同，使得南北的聚落規模、生產技術和政治組織也所差異。不過相同的，Kalinga 在西班牙殖民時期就發展出捍衛地方安全的戰事組織，後成為和平協定的主要捍衛者。

Barton 在 Ifugao、Kalinga 等呂宋山區的考察幫助後期的研究甚深，他探究的是 Kalinga 的習慣法(custom law)和親屬與經濟、信仰之間的群體連帶全貌關係(1949: 1-16)。Barton 帶動人類學初期在此的研究觀點，將 Kalinga 視為非基督教徒(Pagan)來進行其社會與文化的異族觀點調查。然而，Dozier(1966)跳脫此一框架，不將 Kalinga 視為一個遠古/原始的(primitive)所在，而是試圖理解 Kalinga 拌入現代社會後所經歷的改變；於是 Dozier 透過 Kalinga 的社會組織、生命禮儀與信仰儀式的變遷作討論(1966: 3)。其中，Takaki(1977)是我在田調期間聽見在地人最常提及的一位女性人類學家。他是位日裔美國籍人類學家，合計在 Kalinga 的 Lubuagan 鎮、上村進行田野調查、語言研究長達三年以上的時間。²¹ Takaki 對於 Kalinga 的研究發表成為博士論文—*Aspects of exchange in a Kalinga society, Northern Luzon*；他受到 1960 年代的生態人類學研究取徑影響，針對 Kalinga 的傳統經濟交換模式(galos)與在地經濟、生態產生的緊密結構性作出詳盡的脈絡分

²⁰ 我在此僅挑選了部分的相關文獻作為回顧基礎；更多的文獻可再參照各學者的其他著作。

²¹ 上村居民有些人說他住在 Kalinga 三年、有些人說五年。Takaki 的書中則記錄進行田野調查期間為 1964-1968 年間。

析。上述的北呂宋相關研究以及材料都作為我在本研究中的基礎。而我在第二章針對菲律賓 Cordillera 山區與 Kalinga 的歷史描述中會再一一提及。

第四節、田野地概述

由於我在後續的文絡中，將會不斷提及以水墾區上村以及諸報導人的訪談資料。因此，我在緒論中加入田野地概述，為上村與訪談者作基本的背景與介紹。

(一)、上村的生態圖像

生態並不只是指出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互動而已，還包括整體環境中其中的能量循環、物質流與信息傳送等律動交通。也就是說，人並非是環境當中唯一的能動者，且環境也不是浪漫靜止的一塊鐵板。環境中所存在的物與物、環境與環境之間也會產生連結；這些連結所密織出的關係正是生態網絡中重要的一環。

上村長久以來仰賴的生計方式可分為種作、買賣和親屬關係；而這三部分也串連成為上村所生活其中的生態圖像。我認為上村產生變動的制衡力量是來自於這三部份的平衡；正像是 James Scott 所認為「安全第一的原則是農民生活中生態學依存性的邏輯結論，表明了生存安全比高平均收入更優先(2001:35-36)」。然而安全優先並不表示居民的行動保守，他們甚至可以為了避免遭受掠奪，共同討論夜間巡守和槍枝分配、破壞道路等行動。因此安全不同於他們的行動，而是集體的核心意識。上村所仰賴的生計方式也都必須符合安全考量，以種作為例：不管居民計畫要栽種何種新作物，稻米的基礎收成就是一條安全的防線。上村以前曾經嘗試要種植咖啡樹，但是因為一場猛烈的颱風把所有的咖啡樹苗都吹倒了，在那之後居民就再也沒有說過要種咖啡了。²²由此可知，居民在決定種作的同時，已考量到其最低可收入的安全保障。其次才是投入收益擴增可能性的勞動，例如種蔬菜、水果等。

米不僅是 Kalinga 山區的主食，也是各地之間相互供應、交換、儀式與貿易的產品，以此作為維持食物安全的方法。尤其是在種子的交換上也相當頻繁，在整個 Cordillera 山區可以看見米的多樣品種各有不同的動態管理方式。Cordillera 山區的農業生態系統是以米(rice)作為核心，且不同地區的米類品種分別延續、

²² 上村裡仍有零星的好幾株咖啡樹，因為多生長在私人土地上，所以這些咖啡樹多屬於私人擁有。若市長在公有地、無人地上的咖啡樹就可以隨意在咖啡豆長成的冬季中採收。上村居民並不特意照顧咖啡樹種，通常居民會撿拾已經掉落在地上的黑色、紅色的咖啡果回家作曝曬，之後再磨成粉、煮成咖啡。

紀錄了各地在社會、經濟與技術上的不斷改變(Sajise et al., 2012:75-86)。而種作稻米的梯田是裝載地景記憶、生計安全、親屬關係以及生產技術的關鍵所在。

1. 梯田經濟(payaw)²³

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UNU-IAS)2012 年的研究統計，菲律賓的林地面積自 1950 至 2010 年以每年約略減少 5%的比例逐年消逝；但是 Ifugao 省除外。²⁴菲律賓林地面積下降趨勢的原因，一方面因著菲律賓政府極力推動工業化之因，另一方面是因為經濟發展過程中對於自然資源的需求增高，以及等待生態、季節再循環的時間、空間被壓縮。UNU-IAS 認為 Ifugao 省林地面積不減的原因在於梯田經濟的維持。以此類比同樣以梯田作為農業生產方式的 Kalinga 省上村，當地的梯田要如何維繫其經濟與生態的平衡？



圖 1-3(左)：2011 年上村的第二期稻作。農民使用錄音帶的反光圈嚇阻吃稻的鳥禽。

圖 1-4(右)：這是幾畝面積較小的田地。

梯田的生成與維繫並非一朝一日可成就，上村的梯田開墾多仰賴多世代的接力延續。在開墾新梯田時，會從最老的土地附近再開墾；上村的人相信愈老的土地，表示其地力富饒可供長年耕種。也就是說，愈老的土地是愈保險的生產依據。不過當人口逐漸攀長，梯田的開墾就不再以生產力作為主要考量因素，而是考量地形平坦、水利暢通、光照以及鄰近的作物生態等。

一般的梯田多在半山腰的位置開墾，上村的梯田也是；聚落也多與梯田的所

²³ 在 Lubuagan-Kalinga 語中，梯田被稱為 payaw；但是上村居民多以 rice field 稱呼田地。

²⁴ Ifugao 省與 Kalinga 省同屬於 Cordillera 行政區(CAR)中的一省。

在靠近。梯田的上方，也就是山頭的位置，會保留相當大面積的原生林地。梯田和村落的選址必須考量陽光、水和溫度，因此愈往高緯度的山地開挖，其溫度不適宜用來栽種作物。另一方面，在梯田的上方維持大面積的林地，也反映出居民的保水概念。林地就像是水庫般抓住了水力，讓水保存在田地的上方。如此一來，田地的灌溉用水就有來源。而梯田的附近也會挖掘水溝，引水入田。再者，梯田本身也就像是水渠一般地傳遞水流，水流會溢出或是流通到下階的梯田。如此一來，透過梯田地貌的展現就可發現上村生態運作的概念。

梯田中的石頭、雜草和畸零地對於梯田生態也是很重要的存在。在梯田的開墾技術中，愈是上階的梯田就必須將其田埂鋪得更厚、更高；愈是下階、緩坡的梯田就可以鋪設較矮、薄的田埂。石頭作為田埂鋪設的主要素材，同時混合土壤搭蓋成為上階梯田與下階梯田之間的區隔，也可稱之為生態廊道。原因在於，由石頭鋪設的埂道一方面供通行使用，一方面也會長出許多野生草、植物。這些野生的草叢和植物不僅可以抓土，也成為雨水沖刷時的緩衝處。上村的梯田大小不一，最大可到 3000 平方公尺(粗估)，最小甚至僅有一個家用浴缸大小，而大小不一的田地旁皆會有不等大的畸零地。畸零地常被以為是不利生產，或是效益不高的荒廢地。但實際上畸零地就是提供物種多元性的沃土，上村居民就是透過畸零地栽種老虎草，讓老虎草不壓縮到原有的農作生產面積，又可以使用老虎草進行掃把製作。畸零地也可以用來種植水果，上村就可見香蕉、野莓、土鳳梨和酪梨等栽種。而這些種植在畸零地上的植物也會在休耕期間為居民帶來各式可供選擇的食材。

另外，上村林地又分為公有地和私有地。公有地的距離村落較遠，私有地多圍繞在村落附近，因此居民多取用私有地的資源和木材，且私有地為家族共用，因此幾乎每戶都可就近取用。公有地則是依據各聚落、各村之間的劃界區分，然而其相對距離較遠，因此當居民有特殊需求，例如打獵、取建材時，才會去公有地使用公有的資源。也就是說，公有地資源被取用的次數較少，恢復周期較大；私有地被取用次數較多，恢復周期較短；這樣的區分也是居民視為維持生計安全的做法之一。村落內，木頭的使用量龐大，原因在於木頭仍是山區最主要的燃料來源。根據每家戶所取的木頭大小就可估測該戶家庭的林地擁有狀況；能取得較粗木頭的家戶幾乎都有私人的林地，才能輕易地取得粗木頭使用；倘若是經常使用細木枝、斷木的家戶，通常是在私人林地附近或是山路間拾取的。聚落中部分家戶也使用瓦斯爐，不過由於瓦斯費用昂貴且要到市區才買得到，因此以木頭作為燃料仍具相當重要性。

梯田除了種作稻米之外，在不耕種的季節，梯田就會被當作水塘，裡頭注水

(或接雨水)進行曬田，有些居民也會在裡面養小魚、小螺(當地人稱之為 taiwan)、青蛙、水菜等，這也算是一種施肥、增加地力的方式，也可以提供居民額外的野生動植物的食用需求。²⁵梯田經濟當中，水牛(carabao)是很重要的財富象徵。²⁶因為梯田無法使用大型機械，因此水牛耕田仍具重要性。2010 年前後，上村獲贈、自行購入小型的共用翻土機，目的是為了減輕人立、水牛的勞動消耗。不過，小型機械的效益有限，因此翻土機跟水牛就成了梯田間的同事。

上村的水稻可一年二獲。水墾區所種植的米為較難以栽種的紅米，有別於 Tabuk 市區大量種植的白米。紅米的口感比起白米較為 Q 彈(白米較為濕軟)，也因為紅米栽種地多處高地，產量較少的因素下使得紅米的價格比起白米要來得更好(價差會浮動)。在水墾區有個稻米銷售組織(rice-selling organization)，組織內的成員會協助育苗或是幫忙照顧田事。稻米收成後，成員們會將收成量集中。再由組織主席向政府機關接洽收購。稻米販賣組織裡面的成員，大多數都把自產的全數的收成量賣給政府，再去買較便宜的 Tabuk 米食用。另外，山區的 sayu-di(龍鬚菜)、don-sui(水菜)等蔬菜類作物，也因著城市人口的需求而開始種植的。

2. 買賣互通

我認為山區資源生產除了農業外，買賣交易也是山區重要的資源來源之一。曾有上村居民說：「山上各村落之間所擁有的物質相雷同，這裡有的東西，別座山也有；這裡沒有的，別的地方也不會有太多。所以如果要取得山上所缺的東西與食物，就必須要下山去買、去賺。」也就是說，從過去到現在，從山上到山下的互動與往來其實相當密切、頻繁。上村不算是自給自足的村落，因為有許多的資源必須透過交換取得。²⁷ 村中的買賣除了透過當地雜貨店的物流、交通的運輸之外，還有一種被居民暱稱為「跟著腳來的商店」(the store with footstep)的兜售方式。

²⁵ 村落裡的幼童們也常會以”Taiwan”作為我的名字，即便我解釋過後，他們還是會像呼喊口號地叫我 taiwan。他們也會到溪河、池塘裡拿田螺回來給我，一邊指著田螺一邊告訴我說那個田螺就是我(This is Taiwan, this is you!)。

²⁶ 水牛的 Lubuagan-Kalinga 語為”Lu-wong”。一隻水牛的平均價格是四萬披索，如果買胖一點的就需要五萬披索以上。

²⁷ 上村擁有的是自給的、內部傳遞的技術和知識。



圖 1-5(左)：「跟著腳來的商店」正在山路上步行往來。

圖 1-6(右)：「跟著腳來的商店」正在村裡兜售貨品。

在上村，每周約有兩次左右的機會能遇到「跟著腳來的商店」，必須依據天候因素或是路況優劣而定。這類兜售方式現在多由婦女擔綱。²⁸我常見幾位婦女以及他們的孩子在頭上頂著要賣的貨物，沿著各村、各聚落進行買賣。有些人用布袋網綁貨品、有些人用鐵製臉盆裝貨，其重量往往需要由另一人協助放到頭上後才能行走。這些兜售的婦女所拜訪的村落並非隨機挑選的，他們會選擇有自己親戚所居的村落作生意；一方面可透過親戚協助吆喝生意、一方面親戚也可以保護他們在當地的安全與交涉。因此，在上村所見的兜售婦女們對於當地居民而言是相對熟悉的臉孔。倘若是陌生人到當地做生意，可能還會被當地居民質疑他的動機與目的。也就是說，「跟著腳來的商店」其實也可被解釋為「跟著親戚來的商店」。

「跟著腳來的商店」有著與在地雜貨店截然不同的商品作為吸引力。他們兜售的商品多半是保存期限較短的食品，但品項的變化性較高。他們經常販賣熱狗、鹹魚、肉丸、甜甜圈等不同的加工品；另外在日用品部分，賣有各類的影集 DVD、枕頭套、衣服、毛毯等。這類的商品在上村的雜貨店內是相當少見的，而在下村也僅有幾家雜貨店賣有麵包、塑膠拖鞋和罐裝飲料。如此一來，居民對於「跟著腳來的商店」都懷有一股期待感。在電力架設後，兜售商人們帶到上村的貨品中，最常被拿出來討論的就是 DVD 影集。在村裡所流行的 DVD 光碟通常以大雜燴的方式在販賣；也就是說一片號稱由成龍主演的 DVD 光碟，其中涵括了成龍歷年來的各部電影作品。這種類似外出旅行的買賣生意，必須透過親戚的接應和招待，從中獲得微薄的利潤。

²⁸ 迪爸說早期是不分男女皆會到各地兜售、買賣。但因著男性多到城裡打工或是擔負更重的工作，因此「跟著腳來的商店」目前才會經常見到由婦女們來作。

這群兜售貨物的婦女們依靠著自身的腳程，往返於各地之間的「捷徑」(山路)。他們通常也是各村落間的「廣播器」，隨著腳步的移動把各村間的消息都串連在一起。不過串連所需時間較長，聚集買賣時所談的話題都以「周」計算，例如談論上周哪家生了小嬰兒、兩周前有人出了車禍或是哪周要舉行婚禮之類。因此，兜售商人便以腳程成就了臨時市集與集會的開張。且這類的兜售方式也最為靠近山區買賣交流的原型：透過當地居民熟悉的路徑作為來往的通路，並且在貨物上互通有無。

不過，兜售商人的買賣方式難免受到對外道路暢通後，貨品、人的流通變得相對便利所帶來的衝擊。也就是說，兜售商人的腳程逐漸被車程所取代，部分居民轉變為自身前往外地的大市集、超級市場添購；也會對兜售商人的商品感到不信任感。不過，這些衝擊都不影響到「跟著腳來的商店」的存在。因為兜售商人之於山區村落的功能與重要性不僅是買賣而已；兜售商人所帶來的緩慢訊息流通、訊息交遞中，也串連出各地的緊密關係。

(二)、家屋與雜貨店

在這部分，我將描述主要幾位報導人。我在上村主要的收養家庭為迪家。迪家家族在水墾區是個大家族，各村落之間幾乎都有親戚往來。而我在田野工作期間多居住在上村迪家，也透過迪家的家族網絡進行訪問與觀察。因此，我便先從迪家的家屋與所經營的雜貨店說起。

迪爸是一名經商者，也是村內的地主；同時也是在地 NPO 的領袖(president)。²⁹迪爸今年約莫 66 歲，他的祖父原是來自 Lubuagan 鎮的居民，他與迪媽於 1969 年結婚後便在藏峰聚落成家。迪爸的家就蓋在藏峰聚落的中心位置，是一棟木頭與水泥混作的兩層樓建築。迪爸和迪媽共生有七個兒子，三位已婚另外成家之外，其餘四位兒子皆與迪爸夫妻同住在此。家中另外還有迪爸已經高齡 90 歲但仍相當硬朗的 Ina (媽媽)。³⁰迪家一樓有自營的雜貨店、儲藏區和兒子們的臥鋪。屋外有條樓梯可以直通二樓，訪客來時都會直接走到二樓的客廳。³¹迪家二樓的牆面和地面都鋪設了堅固的深色厚木板，客廳一隅便是用來烹煮食物所用的爐

²⁹ 此 NPO 設立於 1998 年，原是為了推動農民耕作技術以及串連各 NPO 組織的訊息而組成。但近年來，因為成員分散在不同的農業計畫，而較少運用和經營此組織。

³⁰ Ina 作為母親的稱呼，此稱呼與台灣阿美族對於母親的稱呼相同。

³¹ 「客廳」是我在書寫上較易作為區分空間而使用的名詞，當地人鮮少以客廳、餐廳或是廚房等詞彙作出空間上的區別。大部分的當地家戶都只有一個空間作為招呼客人、吃飯、煮食所用，因此在客廳、餐廳與廚房的空間上是混用的。而迪家因為屋內空間較大，因此我便在書寫上以「客廳」稱呼家中的公用空間。

灶，且在碗盤邊有個洗手台和水龍頭，這是為了方便迪媽的家務整理所需。³²二樓還有迪爸夫妻的一間臥房和一處大通鋪，二樓外面還有可放兩條長椅的大陽台。大通鋪在白天是家人的公共空間，新買的電視機就放在這裡。而當我到此之後，夜晚的通鋪就是我睡覺的地方。由於迪家沒有女兒，因此迪爸還特意把迪家大哥的女兒叫來與我同睡，作為我的同伴(company)。

迪爸年輕的時候，在各地打工賺錢。他曾經在礦場內當保全，也曾到市區幫人蓋房子，最常作的就是四處兜售批來的貨物。這些過去的經驗都一一累積成日後他經營雜貨店的能力基礎。迪爸的雜貨店開設於 2008 年，雜貨店內有一個不到 100 公分寬且隔有鐵欄杆的窗戶，這個窗戶便是顧客與老闆溝通、交貨的窗口。早期，迪爸的雜貨店賣有聚落尚無電力時所需的煤油(*igas*)，因此被視為藏峰聚落裡「最大」的雜貨店。³³無電時期，上村各家需用煤油，而 300ml 的煤油就平均要價 30 披索；因此販賣煤油的門檻較高，因為商家必須要有資金囤貨。³⁴尤其是在仰賴搬運運輸的上村，雜貨店一次的進貨量都必須有相當的份量。不過自電力輸入之後，居民對於煤油的需求便逐漸下降，迪爸囤積煤油的數量也順勢遞減。藏峰聚落內另外還有四到五家的雜貨店，各家雜貨店的大部分商品幾乎無異，就是醬油、食用油、零食、肉罐頭、酒、三合一咖啡、泡麵、肥皂、洗髮精等等。迪爸的雜貨店比別人多賣煤油外，也是上村唯一買得到白米的地方。迪家的稻米產量不僅夠自用，還能拿來販賣；言下之意就是迪家的田地與收穫量達到一定的數目。且迪家的田地和收穫量不僅來自於水墾區的土地，迪媽更借貸給 Tabuk 市的農民，並在收穫季節時取回等價值的稻米數量。除了煤油和米之外，迪家雜貨店還買得到沖泡奶粉包、小包裝牙膏、小包裝洗衣粉、米粉等，這些幾乎都是居民在日常開銷有剩之餘才會購入的商品。

Ina 和迪媽是迪家唯二的兩名女性。Lubuagan Kalinga 語中的母親為 Ina。因此迪爸稱呼自己的母親為 Ina，不過聚落中的年輕人受到美式英語文化影響後，皆以 Mom、Mama 稱呼自己的母親。現在，Ina 一詞除了稱呼母親外，也用來稱

³² 當地通常僅有新蓋的家屋才會在屋內設有水龍頭和洗手台。大部份的家戶都必須到戶外取水、戶外公用水頭籠作清洗工作。

³³ 迪家的雜貨店僅被視為上村最大的雜貨店而已。一旦以水墾區作為比較範圍，在下村就有比迪家規模更大的好幾間雜貨店。這些大雜貨店除了有迪家雜貨店的所有物品外，也賣乳液、可口可樂、拖鞋、洋酒、煉乳、手作麵包、雞隻、椰子等，這些都是透過便利的連外道路而運回的商品。

³⁴ 根據 2012 年 4 月的台灣銀行匯率，新台幣比菲律賓披索(PHP)的匯率為 0.77:1。舉例來說，100 披索便相當於台幣 77 元。在本文當中，所有的菲律賓披索匯率皆與此匯率相當。

呼祖母輩的人。例如迪爸和他所有的兒子、孫子都稱呼 Ina 為「Ina」。Ina 有一畝自己的小田地，距離藏峰聚落約莫 10 分鐘腳程。他常在每日早餐食用完後，換上一身便裝以及背著用購物袋改造而成的後背袋，手握著小鋤頭並動身前去田裡工作。Ina 的田裡種有各類的作物像是辣椒、豆莢、高麗菜、蔥頭、龍鬚菜等。有時 Ina 會把收成的作物拿回來給自家吃，有時也會託給聚落的婦女帶到市區去賣錢。我和 Ina 僅能用我掌握有限的 Lubuagan Kalinga 語溝通，例如像是我每日起床時，早已坐在爐灶邊烤火的 Ina 就會把屁股下的小凳子讓給我，並對我說「*man-don ling*」(很冷)；言下之意是要我快坐到爐灶邊取暖。Ina 多用母語跟家裡人溝通，有次家裡僅剩下我時，他竟說了「Where's your father?」向我提問。Ina 小時候經歷過美國殖民政權以及二次世界大戰，學習過相當基本的英語，但因為戰爭的關係就沒再上學了。Ina 雖然年紀大且聽力不好，但是每次當迪爸詢問他關於過去的歷史記憶時，他仍然侃侃而談許多的過往。

迪家主要的家務工作都是迪媽在張羅的。他說自 16 歲嫁給迪爸起，每天早上都是凌晨四點就起床準備一天的開始。迪媽一天的工作內容相當奔忙，一早要先煮餵養豬隻用的餵水，然後準備好兩大壺給家人起床後要喝的黑咖啡。迪媽也會趁天未亮之際洗好澡，然後開始煮早餐、米飯，米飯是一天三餐中都要吃的主食。爐灶上正在煮東西之際，他還會跑到屋外的水龍頭下清洗昨夜用過的鍋碗瓢盤。等大家都起床之後，迪媽還得招呼來雜貨店的客人跟餵雞吃飯。當早餐吃完之後，迪媽有時會用蠟油打亮家中的木地板，有時會去河邊洗衣服、有時會去田裡曬穀。一天中僅有下午時段可以稍作休息。晚上他又會接著打理各式家務。迪媽一天的生活就是上村婦女們的縮影，若是還要照顧襁褓中嬰兒的婦女就又更分身乏術了。不過，事實上，迪媽的兒子們都會適時地幫助迪媽的工作，例如像是搗咖啡粉、煮米飯、餵豬等。而且，家中每個人都會清洗自己的衣服，不會交給迪媽負責。除此之外，迪媽的大兒子和四兒子就住在迪家斜後方。³⁵所以迪媽的媳婦們也都常來串門子和分擔家事，再加上孫女們更是會主動幫忙迪媽做事。而這也是親屬關係緊密的益處之一。

迪家尚未成家並且同住家中的四名兒子，分別是三哥、五哥、老六和小七。其中老六因為與我年紀相當而成為我在田野工作時最倚賴的翻譯者，他不僅幫忙

³⁵ 由於迪家的成員眾多，我為書寫上的清楚呈現因此將七個兄弟分別依照兄弟間的排行來作指稱，分別是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老六和小七。已婚的大哥、二哥和四哥的妻子，我則分別以大嫂、二嫂和四嫂來稱呼他們。

翻譯英文與 Lubuagan Kalinga 語，有時也幫忙翻譯在地人交談當下的情境。他總是有效地化解我在田野工作時所遇到的種種文化藩籬。老六在中學(high school)時住在鎮上就讀私立高中，不過他說自己常常翹課，因為學校教的內容會限制學生思考；他說，「那個時候我跟四哥、五哥一起在 Lubuagan 念書，爸爸租了一間房子給我們住。我們三個人會一起出門去上學，但是等到了學校之後，我會偷偷離開學校回到家裡，我想知道那個電線到底怎麼裝的？但是有一天就發生意外了，我忘記關開關，然後...我就被電暈了。可是後來我也是自己醒過來。多試幾次後，我就知道原來電線如何裝，還有原來電會把人電暈。」老六在 19 歲時參選了上村的幹事選舉(barangay official election)，他說「我喜歡參加選舉，那會讓我有事可以作。而且我會知道居民喜歡我。選舉很刺激、很危險，菲律賓常常會有人因為選舉而死掉。我會帶槍保護自己，而且不能睡覺。」那一年，他成為了全村幹部中最年輕的成員(barangay officer)。老六是個充滿好奇心和冒險精神的年輕人。他還曾擔任村裡的巡守員，在夜間來回巡視整個村落的安全。他也是村裡、家裡重要的「跑腿者」，例如在夜間有人過世時，他就會快腿穿過山間小徑去鄰近村落傳遞消息。

另外三哥今年約莫 33 歲，他在幾年前曾到 Bagio City(碧瑤市)工作過一年再回來山上；他當時跟隨著聚落中其他年輕人去大城裡賺錢，不過他說那些都是辛苦錢。平時，三哥多會在起床後到聚落附近的林地去砍木頭，以作為家中燒柴所用。他也是家中最主要負責編織手工掃把的人。而五哥是在 2011 年時完成浸信會神學院的學位，並成為一名牧師(pastor)。現在他的工作就是負責上村的浸信會傳道工作。五哥是迪家念最多書的人，也經常到各省、各城參加會議與研習。目前，他每周六、周日的夜間都在迪家一樓的空地主持主日證道的禮拜儀式。迪家年紀最小的小七，是家裡的牧牛者。他每日早晚都會到山裡餵食自家的水牛，並且和三哥、老六分攤負責家中雜貨店的搬運工作。家中的各兄弟間皆有不同的長才與家務分工，因此算是人力資源較為豐沛的一家。

我於田野工作期間都居住在迪家有幾個主要的原因。第一、與迪爸是義父、女的關係成為我在田野地中的保護色。因著 Kalinga 山區聚落的緊密親屬關係與排他性，迪家對於我的接納和理解讓我得以長時間居住在此。。二、由於迪爸是地方領袖之一，在聚落中有穩固的名望和地位。因此當有其他居民對於我來此村落的動機存疑時，迪爸便會以他的個人信譽來為我聲援。例如，我曾遇過鄰居、

軍方的盤問，他們問我來此高山久住的真正原因是否為了回報當地的軍事情資給台灣政府。而迪爸就會為我解釋，「他是我的女兒，他來拜訪我的。他只是個學生，他來這裡只是為了完成學校的 project。」對於上村居民而言，迪爸的解釋更勝於我的語塞。第三、因為迪家的經濟能力較寬裕，居住在迪家比較不會壓縮到他人的生活空間與食物。這一點對於長期的田野工作而言相當重要。在物資、糧食較不易取得的 Kalinga 山區，有穩定的食物來源是重要的課題。最後，因為迪家成員豐富的歧異度，也幫助我理解高地居民在各種經驗上的可能性，以及讓訪談有了多重的視角。

除了迪家之外，曾在 17 歲那年參與美籍日裔人類學家 Michiko Takaki 工作團隊的前村長花叔也是我的重要報導人之一。花叔說當年約有五名左右的人參與 Takaki 的工作團隊，含括迪爸也曾短暫參加。當年他曾協助 Takaki 繪製地圖、打字、量測水位高低、記錄溫度等工作，而 Takaki 也教導團隊成員語言學和日語、英語等。花叔對於人類學的基本概念以及對於人類學家的研究方法略有涉足，因此他總有說不盡的豐富歷史資料與線索供我參考。當我居住在迪家期間，花叔在農閒之餘就會來關照我的研究進度。花叔對於子女教育相當看重，他致力於栽培孩子們完成大學學位，也相當支持自己正在供讀兒童教育研究所的女兒。花叔有九位兄弟姐妹，有的人嫁到日本、加拿大，有的人當上學校老師等。花叔說，他小時候要念書很不容易，他和迪爸都是當年完成中學學業的少數者。花叔平日照顧農事，也會在老虎草(tiger grass)收割季節加入手工掃把的製作行列。他對於地方發展很有見地，總是會主動來找我討論。

大致上，我的報導人可象徵性地代表上村中的不同居民。迪爸和花叔的年紀相當，同為村內的意見領袖群。迪爸是商人、地主，而花叔是前村長、小農；迪爸對於財產的看重更甚於花叔，花叔欲透過現代教育的系統翻轉子女的社會地位。此外，迪家老六是個沒念完中學的地方官員，也是參與過特種部隊訓練的村落巡守員。相對於老六的是逐步完成大學學業並且信仰虔誠的牧師五哥。迪家的 Ina 和媽媽則是分別代表二次世界大戰前與後所出生的女性，而迪家尚有許多的孫子女們代表著上村的年輕世代。

本文當中的採集資料與觀察重點多以上村為主。上村在水墾區具代表性的原因在於，上村是水墾區早期就已形成的村落，且上村的可耕地較多。也就是說，上村可謂是水墾區的發源點以及糧倉所在。且水墾區的上村、下村與西村三個村

之間多有親屬關係的連結，村民之間的走訪、拜會相當頻繁。待在上村透過與上村居民的對話，也能補抓到部分的下村與西村的資料。電力部分，上村與下村約莫在 2010 年左右有國家電力公司所裝設的電力可以使用，而西村目前仍仰賴 NGO 團體贊助小型水力發電設施作有限的發電。不過整個水墾區都尚未稱得上全面有電，因為仍有部分家戶因為經濟能力限制而無電可用。我基於電力使用狀況已達三分之二之上，所以仍會以水墾區或是上村作為集體的代稱。不過，我也依上述說明表達村落內部的異質性以及我所注重的焦點。

田野工作期間，我依隨報導人的行動曾抵水墾區各村以及 Lubuagan 鎮、Tabuk 市。³⁶因此我會遇到住在不同地方、往返於城鄉之間的水墾區居民，也會遇到從外地來拜訪水墾區的其他訪客。但我的觀察與訪問對象多以水墾區居民或是曾經居住在水墾區的人為主。透過這些仍住在、曾住在水墾區的居民口中拼湊出他們對於水墾區的述說與經驗。

觀察者與訪談者資料概況：³⁷

地點	受訪者	受訪者職業與背景	年齡 ³⁸
上村	男性 10 人 女性 15 人	地主、村幹事、前村長、家管、研究生、大學生、中學生、牧師、佃農、自耕農、雜貨店老闆、日照中心老師、神父、自由工 ³⁹ 、家管等	13-20 歲 7 人 20-40 歲 10 人 40-60 歲 2 人 60 歲以上 6 人

³⁶ Kalinga 省目前的省會。

³⁷ 在表格上所呈現的人數包括我所觀察的對象以及訪問的對象。而受訪者的職業別當中，有些人是具有多重身分的，而有些人則是依照時序選擇不同的職業從事。因此列出表格僅是為了粗略地提供一個受訪者的資料可供參考，在後續的章節中若有提及相關的報導人都會再一一地介紹。

³⁸ 在年齡上的分類有幾個意義，60 歲以上的人約莫出生在菲律賓獨立建國以前，也就是或許曾經歷過美國殖民時期、美式教育的一批人。而 40-60 歲的人約莫是村落裡的中壯年齡層，這一群所生長的年代是 Lubuagan 鎮仍作為 Kalinga 省中心時期，也就是說這一年齡層的人經歷過距離省中心相當近的階段。20-40 歲的人則為村落裡的年輕世代，內部的歧異度較高，且經常流動於村落與外地之間。而 13 歲到 20 歲則為學生年齡。13 歲約莫是中學一年級，對於語言的掌握度較高，因此我較有訪談的可能與機會。20 歲約莫是菲律賓大學畢業的平均歲數，因此我將 13 到 20 歲定為學生、青少年的一個分類。

³⁹ 「自由工」的意思為：沒有固定薪資工作者，主要是在聚落或是家戶內協助砍柴、搬運貨物、做粗工等，雖然這些工作無實際薪資可得，但都是各家戶在日常生活中必須的勞動工作。因此與臨時工(有薪資可得)的概念不同，所以稱他們為自由工作的人，簡稱「自由工」。以迪家三哥為例，他的工作便是砍柴、搬運迪家雜貨店所需的貨品、編織手工掃把、碾米機操作等工作，雖無個人薪水，但卻有效協助了家庭事業與聚落事務所需的運作，仍有其效益和貢獻所在。

下村	男性 3 人 女性 7 人	雜貨店老闆娘、小學老師、村長/村長夫人、Jeepney 司機 ⁴⁰ 、村幹事等	20-40 歲 9 人 40-60 歲 1 人
西村	男性 2 人 女性 2 人	農人、小學老師、日照中心老師	20-40 歲 1 人 40-60 歲 1 人 60 歲以上 2 人
Lubuagan 鎮	女性 5 人	副鎮長、鎮公所幹事、護士、雜貨店老闆娘、鎮長媽媽	40-60 歲 5 人
Tabuk 市	男性 1 人 女性 3 人	大學生、家務工、臨時工	13-20 歲 1 人 20-40 歲 4 人
其他(非水墾區者)	男性 3 人 女性 1 人	軍人、牧師、攤商	20-40 歲 4 人

第五節、研究方法

(一)、研究步驟

我分別在 2010 年 9 月、2011 年 8 月到 9 月以及 2012 年 3 月到 4 月，共計完成三個階段的田野調查工作。第一階段為田野可行性與研究興趣初涉。我於 2010 年 9 月時因著跟隨海外志工的服務計畫而在水墾區待了兩周。此時期對於水墾區的了解與接觸成了我評估此地田野可行性的基礎。當時評估認為，水墾區有可供照應的報導人以及英語語言上的溝通無礙，因此決定嘗試以此地區作為田野地並發展研究主題。

爾後，我於 2011 年 8 月至 9 月獨自前往當地進行第二階段的田野調查工作。當時的我仰賴迪家的成員作為我在山區行動、拜訪的引領者與翻譯者。我對於當地電力以及科技產品使用的好奇便也逐步開啟。此時期是我首次獨自來訪並與在地長時間生活。當時的主要工作是進行村落裡的基礎調查，包括家戶的親屬關係、田野地的人群結構、村落的日常生活範疇等。另外，我也進行日常所需的語言學習(Lubragan Kalinga 語)；語言學習的過程不僅協助我區辨訪談過程中的氛圍與真實性，也幫助我拉進與居民之間的關係，並增加諸多訪談的契機。我的語

⁴⁰ Jeepney 是菲律賓相當常見的交通工具。這些 Jeepney 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由美軍留下的軍用吉普車(USA military jeeps)所改造而成。Jeepney 的車身有各式的彩繪與裝飾，形成菲律賓街頭另類的展示與特色。

言學習方式是透過兩本字典作為教材，一本是我從台灣帶去的菲律賓語學習工具書(內有 Tagalog 語和中文)，另一本是迪家三哥提供的 Lubuagan-Kalinga 語字典(內有 Lubuagan-Kalinga 語、Tagalog 語和英語)。而迪家五哥跟老六是我語言交換的對象，我以中文向他們交換母語；再由迪爸為我驗收。我的實習場所正是迪爸的雜貨店，我在店內協助販賣商品，也與不同的居民閒聊交談，以此作為語言的練習、確認方法。同時，我也經常與女性勞動者一同洗衣，協助他們看顧小孩。抑或是透過一起看電視之後的喝咖啡時間建立訪談的空間。在這段期間，我觀察的重點多在家戶內電力使用狀況、村落居民的勞動行為以及生產，並透過與當地耆老們的交談擷取日後收集文獻資料的線索。而這階段的成果就累積成為我的研究材料。

在 2011 年的田野工作結束到 2012 年再次前往的期間，我使用文獻分析法大量收集關於 Kalinga 的相關報導、網路消息以及民族誌文獻。我試圖透過文獻資料中的交互辯證找出清晰的研究基礎；再經由政治經濟、生態與東南亞研究的理論觀點作為視角，依據田野材料作出適切的分析與探究。由於菲律賓山區的歷史資料與文獻在台灣不易收集，因此向美國、菲律賓圖書館借閱資料可獲得較多助益。另外在關鍵字使用除了 Kalinga 之外，也運用 Cordillera、東南亞原住民、呂宋島民族等字彙。透過不同的關鍵字使用，得以找出相關的文獻以及著作。

接著，我又於 2012 年 3 月到 4 月到水墾區進行第三階段的田野調查工作。我因著有了前次的調查基礎以及對居民的熟識度，在此次的田野調查工作中得以到訪較多未曾到過的村落、地區走訪。我於田野工作期間所運用的調查方法為參與式觀察和深入訪談。由於我在語言使用上的限制，使得我必須多加運用參與式觀察來獲得村落內的材料，例如去參與婚禮、小孩滿月禮、財產轉移儀式、laga festival (編織節)等活動，從中觀察居民之間的微妙互動關係及其文化意象。在田野工作期間，我多以英語作為溝通的語言，致使我的訪談對象也多是能使用英語作為溝通語言者。而這類的訪談者多象徵著村落中具有知識權力的一群人，因此使得參與式觀察方法更顯得重要。透過參與式觀察以及對於當地語言的粗略掌握，我便能獲知諸多情境、現象與事件，藉此作為分析所需的資料來源。而深入訪談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在於，群聚式的聊天情境下總會造成議題的跳躍與訪談者的語多保留。因此，我在熟悉受訪者的作息與習慣之後，透過單獨地、非公開場合的深入交談作為材料收集。在訪談中，我透過報導人的生命敘事、歷史描述以

及對於議題的見解，一方面可獲取報導人的表述之外，另一方面也能獲得在網路、書籍上所未能得知的片段。最後我在撰寫論文期間，也與一位來到台灣工作的水墾區婦女進行電話聯繫。由於他能以中文溝通，因此在部分材料上曾與他確認和對談。

(二)研究限制

上段的描述中提及我在語言使用上的限制。在台灣可學的語言課程為菲律賓 Tagalog 語。但對於水墾區上村居民而言，Tagalog 語也並非日常生活中所慣用的語言，因此我並未開啟 Tagalog 語的學習。而 Lubuagan-Kalinga 語因語言學習時間不長，而無法作為訪談所用。我在訪談過程中，也會遇到無法以英語作為交談工具的受訪者，當下便會需要翻譯者為我再複述。語言學習過程，我們也往往為了確認字典上的字也需勞師動眾多位耆老協助，他們常說：因為很多字不常用了，語言混用也很習慣了，所以有些字根本就迷路(get lost)了。因此，語言的掌握與使用著實為本研究中的限制之一。

再來便是研究上的距離。由於我能進行田野工作的時間有限，因此在田野材料的取得上必須更為精確，倘若我在離開田野地之後要再做資料上的確認會相當不易。因為並非每位田野地中的報導人都能透過手機或是書信聯繫。因此，作為研究者的我與田野地之間的距離，也是研究限制的一部分。我在研究初期，由於電力在村落內仍供應不穩定，使得我的田野記錄工具僅能抄寫、速記，且照相機、錄音筆也需節制使用。這些狀況在 2012 年時獲得較大改善。

研究限制當中還包括我的身分。由於我並非當地人也不是菲律賓籍國民，我對於村落的背景知識以及菲律賓的歷史掌握都可能影響到我在資料分析上的判斷。在田野資料收集過程中，我對一件地圖的取得印象相當深刻。當時我人在 Kalinga 省的 Tabuk 市中心，我嘗試到市中心、遊客中心等地探問 Kalinga 省的官方地圖。然而官方機構的承辦人都說沒有 Kalinga 地圖可提供。我也就此放棄，後來是迪家老六為我取得地圖，他說「第一天我先去環境局，因為我想他們會有地圖。我問那個承辦人說，『你有 Kalinga 省的地圖嗎？』他說他們沒有，局裡只有菲律賓的地圖。隔天，我換了一件上衣而且戴帽子，我去同一個地方問同一個人，我問他說『你有菲律賓的地圖嗎？』他說他們沒有菲律賓地圖，只有 Kalinga 省的地圖。於是我嘆口氣說『真可惜，那我可以看看 Kalinga 省的地圖嗎？』後來我就拿著那張地圖去印了幾份再還給他。菲律賓人就會這樣，當他愈知道你愈

需要某樣東西的時候，他就不給你。所以你要換個方式去問問看。」舉這個例子的目的在於表達田野工作當中對於當地文化邏輯掌握的重要性，以及與報導人之間互動、互助的必要。倘若沒有老六告訴我這個「技巧」，或許我再待上許久的時間都學不到。因此，我的身分勢必也讓我的研究取向和論說有其侷限性，但這部分都可再成為未來投入研究者再補充與發展的面向。

第六節、論文架構

以下將針對各章要點作出整理：

在第二章的部份，我想邀請讀者的腳步跟我走一趟上村。在這一趟過程中，我將連帶地描述鉅觀下的菲律賓殖民史。然後將鏡頭帶入 Cordillera 山區，讓讀者看見在不同殖民國下的 Cordillera 山區如何逐漸邊緣化。以及，我將解釋 Kalinga 的內部異質性以及水壑區上村的聚落關係。這一章節的要點在於透過歷史的材料以及我的旅行視野，觀看(國家)的治理如何影響、深入 Kalinga。

在第三章，我首先書寫了生活在上村的共存者們：異質的上村居民、國家軍隊(人)、新人民軍(成員)、開發者(美國人)、地方政府(鎮公所幹部)。這些能動者們如何在上村尚無電力之前，利用山區資源(金礦)與電力開發作為相互攻防的武器；於此同時，居民又是如何將電力與「危險」連結。而這個對於危險的連結，又將如何影響上村居民目前面對地熱開發案的判斷。總地說，此章目的在於彰顯上村一地的多重政治勢力，以及各方勢力對於自然資源的不同企圖；對於居民而言連結生計/生態安全的環境，對於菲律賓政府而言則是國際關係中的談判籌碼。

在第四章主要書寫電力進入上村的過程，以及居民與電力在日常當中的相處。我探討電力如何擴展、限制了上村的內部關係，還有電力線路如何重新劃界、連結上村與國家、全球政經力量的位置。最為重要的是，當電力時代來臨，上村面對勞作轉型、經濟變動的狀態下，是否仍存有抵抗/制衡國家(政經力量)介入治理的策略。最後，我分析生態環境在居民的制衡策略中扮演著何種角色。

第五章為結論與討論。此章書寫了從槍桿到電線桿的國家治理手段，透過新的電線桿政治，國家如何更加地無所不入。而上村即便不斷地轉換該地與外部(國家、全球政經力量)的各種距離(地理、經濟、政治)；位居邊緣的上村面對這些介入力量的同時，其策略不再僅是抵抗，而是從中制衡各式政治勢力，創造有利自身安全的生存優勢。

第二章、「被殖民的邊緣」—呂宋島 Kalinga 的歷史與人群



圖 2-1

然後，當車子轉過一處坡路時，突然迎面所見的竟是注滿了水的稻田，在陽光照耀之下延展開來，一層緊接著一層地往山巔堆排而上。面對這種驚人的成就，山姆·克里斯蒂訝異得說不出話來。⁴¹...看見梯田的第一眼在山姆心裡留下了一種驚慌失措的感覺，等到他平靜下來時，代之而起的卻是覺得浪費不經濟。他冥想著這些梯田究竟需不需要，因為他知道在這些經過一代接一代，在手砌築而成的遺跡後面，就是人們需要的平原。『你說，這些梯田生產的糧食還不夠大家吃？』

—引自 F. Sionil José 《偷神像的人》⁴²

引述這段小說的緣由是，當我首次來到 Kalinga 的山區時，同樣地也被這裡綿延的梯田所深深吸引；當我離去後，烙印在我腦海裡的 Kalinga 記憶也是層層疊疊的大小梯田風景。梯田，不僅見證了各地村落樣貌的興盛老衰，它也見證了這塊土地、山林被殖民踩踏的點點滴滴。上村的居民以世代傳承梯田的種作，梯田則回報以不間斷的糧食讓居民得以生養不息。圖 2-1 中位在梯田邊幾棟緊連著的黃色建築物就是上村的小學；所有的上村學童們都必須從各自的聚落步行約莫 15 分鐘的田埂路程來此上學。這座小學是 1921 年由美國殖民政府所建，初期只

⁴¹ 此文取自一短篇小說：《偷神像的人》。在這篇小說中有兩位主角，一位是山姆·克里斯蒂，他來自美國波士頓，是一名情報人員。另一位主角是山姆·克里斯蒂的菲律賓籍助理腓力·拉達克。小說的內容正在描述山姆跟隨腓力回到 Ifugao 省老家所發生的一切故事；以及腓力為了幫助山姆取得祖父珍藏的神像所付出的慘痛代價。

⁴² 《偷神像的人》收錄在《菲律賓短篇小說精選》，譯者張清柏，1989 年圓神出版社出版。

有簡陋的屋舍，隨著時間累積，才有今日的校舍與規模；這所小學見證了美國殖民前後的村落變化。不僅是這座小學，還有倚在小學邊的梯田與群山都在不同的殖民背景下收藏了多重、多褶的在地記憶。

在第二章中，我首先會以菲律賓的殖民歷史說起。⁴³根據 William H. Scott (1974)以及 Renato Rosaldo(1980/2012)對於北呂宋 Cordillera 的相關研究指出，在西班牙殖民政權時期，西班牙在菲政府對於 Cordillera 山區的政治控管和涉入的影響很微薄；他們皆認為要到美國殖民時期在菲律賓的教育、農業經濟和軍事上有較多政策實施後，Cordillera 山區才逐漸被納入國家實際的管控範圍內。但若以 James C. Scott(2009)在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一書中所提出的觀點：高地與低地是不斷互動的過程，而且是互相依存的關係；包括許多山區的產品必須到低地交換，並透過低地的商業模式與貿易中心有所連結。James C. Scott 甚至認為許多原住在低地的人群，早期是從高地遷移下來的，也就是說低地與高地的關係並不截然二分。因此我認為，不論前後政權的轉變如何，低地的變動都絕對地連帶影響著高地。接著，我會把本章的場景帶入 Cordillera 山區。延續前述的殖民政權治理，我在文獻中發現到不同的殖民政權都把 Cordillera 山區劃入特定管轄單位(通常是直隸於中央政府管理)。這被我理解為，對於權力高度掌控的國家機器而言，位居邊緣、遙遠、相異的群體是難以被控管且需被特殊對待的。因此，菲律賓殖民史的重點在於：國家如何在長久的治理手段中建構、形塑出「高地」的「邊緣化」想像，並讓「高地」與「野蠻人」(barbarian)、「生(番)/不成熟的」(raw)、「原始」(primitive)的形象產生連結。⁴⁴

本章中的第一節裡我會概述菲律賓史地的全貌與近代殖民史。第二節是以 Cordillera 行政區和 Kalinga 省作為描述主體，我會拉出在文獻中針對此地的闡述，凸顯此地與各殖民政權間的連結。在第三節中，我將視野投注在本研究的主要田野地點上村。我的目的在於透過前兩節的堆疊，讓讀者能理解到坐落於山腰的上村，它是一座擁有獨立歷史與背景的村落，但它也可能是 Kalinga 山區村落的共同縮影。

⁴³ 我在本章當中所談的「菲律賓歷史」，是為了提供讀者理解菲律賓作為一個國體所共同經驗的背景。我並無意簡化菲律賓各地的歷史與族群差異；尤其是菲律賓南部的穆斯林獨立運動與各個殖民政權之間的戰爭，我也認為不容以單一史觀抹滅地域性的差異。但因本研究不將菲南的族群獨立運動納入討論範疇，在此我就不多闡述。

⁴⁴ 參考 James C. Scott(2009)*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頁 1-10。

第一節、殖民政權掌控下的菲律賓近代史

(一)、旅行菲律賓

每日深夜一點半，台灣桃園機場都有一架由宿霧航空所飛出小型客機；目的地是菲律賓首都馬尼拉(Manila)的 Ninoy Aquino International Airport(以下簡稱 NAIA 機場)。⁴⁵尚未登機前，桃園機場大廳的櫃位就擠滿大排長龍的旅客。我依照人數多寡粗略地把旅客們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帶著最新電腦螢幕、音響、玩具準備回菲律賓的多數年輕移工們，第二類是為了撿便宜而前往菲律賓旅遊的台灣遊客，最後一類是三五成群的少數白人背包客。而我每年就是在這套不變的組合中前往菲律賓。2011 年時，我遇到一位帶著爸媽要到菲律賓旅遊的中年大姊，他說：「聽說這個飛機票很便宜，我爸就說他要在網路上搶購。他說要買，我就想說好吧，帶爸媽去玩。菲律賓我是都沒去過，聽說馬尼拉治安不好。香港人之前不是被搶劫嘛。我們這趟要去長灘島，應該不危險，我們要去一個禮拜。我以前大部分都是飛美加去玩，飛好幾年了。這一次，想說菲律賓近近的，爸媽想的話就一起去。」他問我一個人去菲律賓做什麼，我怕要解釋的太多，因此我回答說：「要去玩」。「那要小心！」他烙下一句我媽媽在我出發前總是耳提面命的口頭禪後就離開了。我想，菲律賓在地理位置上離台灣很近；但事實上，多數台灣人把菲律賓(人)跟我們之間的社會距離區隔地相當遙遠。「菲律賓」只是外勞和待開發的代名詞。⁴⁶

我看著被我分類為撿便宜的台灣遊客們，內心想著台灣遊客從 google 或是旅行社所獲得的菲律賓旅遊資訊可能是以下這樣。菲律賓是由約莫 7100 個島嶼所組成的群島型國家，大致可分為三個主要島群，由北至南分別是：呂宋島(Luzon)、維薩楊群島(Visayans)、民答那峨島(Mindanao)。其中，呂宋島(Luzon Island)地理位置位居最北端，是三大島嶼中土地面積最大的島嶼。⁴⁷在氣候上，菲律賓的北部是海洋性熱帶氣候，一年中的七月到九月是雨季，三月到六月是又乾又熱的旱季；⁴⁸而菲律賓南部是熱帶雨林氣候。除此之外，菲律賓全境地勢由

⁴⁵ NAIA 機場的命名是為了紀念 Benigno Aquino Jr.，他是菲律賓政治改革上的重要犧牲者。菲律賓民眾多稱 Benigno Aquino Jr. 為 Ninoy Aquino。因為 Ninoy Aquino 極力反對 Marcos 的獨裁政權，而被迫飛往美國尋求政治庇護。1983 年 8 月 21 日，當他返抵馬尼拉國際機場時，當場遭到政治暗殺。那是菲律賓民主政治史上相當慘烈的一刻(陳列甫 1988:31-36)。

⁴⁶ 參考自顧玉玲(2008)以及藍佩嘉(2008)書寫在台的東南亞移工們對於自身處境的對白。

⁴⁷ 參考資料為菲律賓旅遊局(Philippines Department of Tourism)，

[http://www.philippinetourism.us/tourism/about-the-philippines-department-of-tourism/\(2012/11/07\)](http://www.philippinetourism.us/tourism/about-the-philippines-department-of-tourism/(2012/11/07))

⁴⁸ Cordillera 山區的氣候與北呂宋的兩、旱季節相當，僅是在海拔較高地區溫度會相對較低。

高山、高原和丘陵組成，有多座活火山，境內的地震也相當頻繁。然而，在旅遊資訊中不會顯現的是：群島地形不僅使得菲律賓國土連結的裂痕較多、較碎，且境內高低落差大，往往使得一統境內的政策不易貫徹(陳鴻瑜 1980:45-46)。另外，台灣與菲律賓除了同為海島型國家外，我們也都經歷過被外來政權統治殖民的斑斑血淚歷史。

菲律賓遭受殖民的歷史推算可從其國家命名開始談起。西班牙人於 1565 年占領宿霧島，當時的西班牙國王菲利浦二世(Felipe II)依自身名字將此地命名為菲律賓(Philippines)；1571 年，西班牙政權征服了菲律賓全境。菲律賓就此展開長達 327 年的西班牙殖民時期(1571-1898 年)。西班牙政權來到亞洲前，已在加勒比海群島以及美洲進行長達 50 年左右的殖民統治。因此殖民經驗豐富的西班牙政府認為，唯有使菲律賓全境改信天主教才能鞏固政權。於此之後，菲律賓便邁向亞洲地區天主教徒數量最多且西化最深的國家 (SarDesai 2001:113)。對於菲律賓而言，西班牙政權統治期間正是其國族疆界的塑型、鞏固期。

在西班牙人統治菲律賓之前，李毓中指出 8 世紀已進步發展的航海技術，促成東南亞貿易興盛且印度與中國文化都接連傳入菲律賓諸島(2003:1-13)。⁴⁹另外在 16 世紀初期，因為馬尼拉的地理位置優越，明朝的倭寇以及日本軍隊都比西歐國家更早地在此競逐(何曉東，1976:7-9、89-90)。陳鴻瑜則認為，因為菲律賓的群島地形阻擋國家觀念的形成，散居各島嶼的居民因著種族、語言、交通上的隔閡，在西班牙征服之前，幾乎未曾出現集體性國家的情感與觀念(1980:49)。

西班牙政府為了管理分散各地的殖民地(含新西班牙(墨西哥)以及菲律賓)，西班牙國王菲利浦二世(Felipe II)下令編纂第一部專以海外殖民地為對象的法典—《印地亞法典》；⁵⁰此法典成為日後菲律賓殖民官、總督的有效管理依據(李毓中 2003:1-15)。此外，西班牙政權也在菲律賓推行政教合一，企圖建立至上的統治威權。不過，西班牙政權並不熱衷於菲律賓的基礎教育和地方建設，因此並未帶來當地農、工業的巨大變遷。只有在 18 世紀後期，西班牙政府積極推動菲律賓農民種植經濟作物，例如菸草、大麻、甘蔗與靛青(植物染料)等；同時也把美洲的農作物—例如玉米、番薯、花生傳入菲律賓。

⁴⁹ 伊斯蘭教的傳入也對菲律賓南部原住民產生深刻的影響。

⁵⁰ 西班牙政府認為殖民母國與被殖民國之間存在著管理方法上的差異；不過此法典形同虛設，因為各地的執行者皆仍承襲當地的習慣法。

19 世紀中葉，西班牙政權鼓吹自由貿易，進一步促進菲律賓的港口交通現代化以及運輸業基礎建設。西班牙政權透過殖民菲律賓，作為與中國華商貿易往來的據點，雙方以「馬尼拉大帆船」(美亞大陸的貿易航線)與「中國船」(中國與馬尼拉之間的貿易連線)連成「太平洋貿易航線」(李毓中 2003:23)。⁵¹此航線的獲益龐大，在西班牙母國宣布此航線專屬於馬尼拉西班牙人所「專用」之後，其他的私下貿易行為被稱為「走私」。⁵²值得注意的是根據 SarDesai(2001:242-246)，1855 到 1872 這段自由貿易興盛時期也累積與培養了一批優秀的菁英階級，成為將來菲律賓反抗殖民政府而建立獨立政權的潛在力量。

1863 年，西班牙政權設立初階義務教育機構，首次由官方系統教授西班牙語言與文學，同時也開辦高等教育的機構 (SarDesai 2001:241)。因此，19 世紀末期陸續出現由知識菁英帶領的改革運動，但都並未燃起菲律賓全面性的革命與反抗。歷經大大小小的起義後，由革命領袖 Emilio Aguinaldo 所帶領的革命團體佔據許多鄉村地區。1898 年 6 月 12 日，Aguinaldo 宣布菲律賓境內獨立，並成立菲律賓共和國(Philippine Republic)(李明峻 2006:3)；此舉對西班牙統治帶來莫大打擊。西班牙政府出資讓 Aguinaldo 離開菲律賓，但 Aguinaldo 抵達香港就向美國購買革命用武器。1900 年間，Aguinaldo 與同行者搭乘美國軍艦返菲，並計畫與美方合作。

Aguinaldo 不知美、西兩國剛在加勒比海上爆發軍事衝突。當時，美國與西班牙已私下秘密約定，達成政治、經濟、貿易的交換協議，且美軍也已調派大批軍隊至菲律賓鎮亂。Aguinaldo 的返國成為美方進軍菲律賓的藉口(何曉東 1976:204-206)。⁵³在菲律賓人民了解美方的愚弄後，各地的武裝反抗活動就不曾停歇。Aguinaldo 也持續帶領民眾追求獨立自由，制定憲法、要求政教分離。然而，因為美國的武器先進且新帝國擴張需求強烈，美國軍隊在菲律賓各地殺燒反抗居民。這導致菲律賓獨立運動陷入苦戰與慘敗狀態。1901 年，Aguinaldo 遭到美國拘捕，革命勢力也大致遭受平定(李明峻 2006:3)。此後，菲律賓就進入美國殖民時期。

⁵¹ 當時，此貿易線為歐美引入大量中國絲綢(廉價品)、瓷器、香料等商品，亞洲則輸入美洲白銀。

⁵² 雖說西班牙政權鼓吹自由貿易，但是透過國家對於利益的壟斷管理，定義出合法貿易與走私的同時，就是透過國家力量截斷了自由的可能性。另外，何曉東(1976:99-109)指出，大帆船貿易帶走了許多農人、工人到船上工作，使得菲律賓底層人民生計受迫。僅讓西班牙上層階級以及馬尼拉的富人們獲利而已。

⁵³ 當時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高生產力對於新市場的需求，因此來到亞洲尋求新據點。

從西班牙殖民時期進入美國殖民時期，菲律賓可說是從舊殖民時代進入新殖民時代。因為殖民統治背離美國立國精神，所以美國對於菲律賓的殖民是一種新的殖民形式。⁵⁴美、菲透過經濟結盟，讓美國的新殖民主義與菲律賓民族主義相互交織、相互制約，產生曲折、反覆、矛盾的殖民特徵(陳衍德、楊宏云，2008：41-42)。雖然美國內部對於侵占菲律賓有多重意見，但當年位居主流論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認為美國應該「開發、教化與提升菲律賓人」，因而維持美國的菲律賓殖民政策。美國在菲律賓的首項建設就是廣設小學機構與師範學院；⁵⁵透過深入的知識殖民再製美國的形象與價值。1908年，美國接納菲律賓革命組織的改革建議，開放菲律賓人民保留其傳統文化以及西班牙習俗，因此在呂宋島的原住民居住地設立 Cordillera 山嶽省份；而此地正是我即將前往之處。

回到 2011 年在桃園機場的深夜候機室裡。一群西方臉孔的男性背包客們，以英文大聲交換著他們對於菲律賓的期待：海產、豔陽跟女伴。隨後，當候機室的登機口打開，列隊的空姐們以燦爛笑容和流利英文對旅客們表示歡迎。我走在結群的背包客後方，彷彿見到美艷大方的菲律賓在招手著。

(二)、NAIA 機場

飛機大約在凌晨三點抵達 NAIA 機場。下機後，我見著西方背包客們從容且自在地通行，宛若菲律賓就像他們的母國一般。入境後，我通常會躲在第三航廈一處可窩睡的角落等待日出。我等待完日出，就接著等待宿霧航空每日中午一班飛往 Tuguegarao 機場(簡稱 TUG 機場)的國內航班。⁵⁶我大部份等待的時間都在觀測天氣以及「欣賞」機場外的暢通高速公路。我觀測天氣的原因是，倘若一天一班飛往 TUG 機場的國內線班機停駛，那我就會被迫選擇搭 12 小時的長程巴士或是在機場多睡一天。此時若是遇到 NAIA 機場內正在舉行周日彌撒儀式，我為了順利搭上國內線班機，都會順道祈求天主讓飛機起降順利。

我選擇待在機場內欣賞馬尼拉交通的原因說來話長。2010 年時，台灣東華的志工隊曾偕同迪爸和老六一起搭乘長達 12 小時的巴士到馬尼拉旅行。我們抵達馬尼拉之後，以縱橫馬尼拉的 LRT(高架鐵路)和 MRT 等類捷運的交通工具作

⁵⁴ SarDesai(2001:253)指出，美國殖民初期對於菲律賓政策制定有三大考量因素：一、美國內部對於佔領菲律賓的歧見；二、菲律賓民族主義的發展與成熟；三、西班牙殖民遺產。

⁵⁵ 以英語授課，直至 1940 年才有教 Tagalog 語。

⁵⁶ TUG 機場位於 Kalinga 省東邊的 Cagayan 省內。因為 Kalinga 省尚未有機場，因此 TUG 機場是距離 Kalinga 省最近的一座國內小機場。

轉乘。我們搭乘 LRT 前，要先走上一段天橋才會抵達各站的站口。每個捷運站的入口處都會有幾位穿著制服的保全人員，他們手持警棍要求每位乘客打開背包、手提袋或是行李以供檢查，也會搜索乘客的腰間和大腿。保全的目的在於確保沒有危險物品(如槍枝、砲彈等)進入車站內。通過檢查後，我們才能在擁塞的人龍裡魚貫地進入月台。馬尼拉捷運系統和轉乘路徑不但令人目眩神迷，其維安的繁複也讓人難以招架。至於走上馬尼拉的街頭更是需要一身好本領；必須要能適應各式車輛急促的喇叭聲、快慢車道的混用、交通號誌僅作參考以及警察只是城市地景中的點綴。走在街上更為難的是，會有年紀不一、東西方臉孔皆有的街童陸續地來索取錢幣或是食物，一旦給了一份後就會像招蜂引蝶一般不可收拾。我坐在機場窗邊看著機場高速公路順暢有序的車流。在機場周遭的交通、乾淨與舒適，與我曾在馬尼拉市區裡所經歷的混亂、吵擾、不安呈現出截然對比。同樣的馬尼拉，透過差異化的空間建構出不同的人群、場景與經驗。我看見這座機場所隔絕的，正是官方治理視野下的多餘與混亂。

正如同 Tadiar(2009)所說，各政權在菲律賓殖民史中遺著對政治結構的影響，由殖民國所種下的新教思維、市場競爭模式更加速了菲律賓人民自我建構與被建構的過程。從機場中的英文語境、馬尼拉車陣裡的 Jeepney 到被丟棄在街頭的大量混血遊童，都一一提醒著菲律賓與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緊密關係。菲律賓的政治改革、社會變動與國際新關係的起點都從美國殖民時期劇烈地展開。美國對於菲律賓的殖民手段有別於西班牙的治理特徵在於實施「菲律賓化」(Filipinization)；也就是讓殖民政府中的菲律賓籍職員比例相對大增(陳鴻瑜 1980:187-188)。然而，「菲律賓化」僅是在削減美國境內部份對於殖民主義的反對聲浪，並沒有讓菲律賓脫離美國的掌握。美國執政時期對於菲律賓的經濟與社會造成衝擊；美國在菲律賓設立自由關稅後，一方面仕紳階級具龐大投資利益與空間，使得菲律賓國內產生更大的階級差距；一方面美國商品傾入打壓了當地的經濟生產結構(SarDesai 2001:256-263)。美國也在菲律賓以公益之名廣設醫院與教育機構，實則是讓英語成為菲律賓的主要語言，達成殖民目的。

菲律賓局勢在 1930 年代有劇烈轉變。當時美國經濟大蕭條，菲律賓的經濟作物佔據美國高比例的進口量，美國民主黨為了反對菲律賓產品無關稅進入美國市場的考量，積極與蔗糖、菸草等利益團體合作促成菲律賓獨立。1934 年 3 月，美國眾議院通過「泰汀斯-麥克杜菲法案」(Tydings-McDuffie Act，也就是菲律

賓獨立法)，在美國總統傑克遜(Andrew Jackson)簽署後通過菲律賓獨立。然而此後的十年為過渡期，美國仍握有菲律賓外交主導權(李明峻 2006:11；陳鴻瑜 1980:117-120)。十年後，菲律賓成立自治政府。就在美國漸漸撤出對菲律賓控管勢力時，日本在此時趁虛而入。

早在 1930 年代，日本透過投資資源開發的方式，獲得在菲律賓開採鐵、鉻、錳與銅等礦產的權利，掌控菲律賓礦產最高限度的 35% 股份。日本在菲律賓的木材、亞麻、椰子乾的利益已經相當大，且還控制菲律賓漁業發展(趙江林、孟東梅 2005:33)。就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突襲美國珍珠港數天後，對菲律賓展開大規模的軍事侵略行動(SarDesai 2001:258)。1942 年，日軍佔領馬尼拉，以軍事鎮壓方式統治菲律賓；同時，美、日兩方開始在菲律賓進行軍事競賽。另一方面，日本政權在菲律賓不得民心，因此菲律賓游擊隊與日本的戰爭從未間斷。1943 年，日本宣布成立新菲律賓共和國(又稱第二共和國)作為傀儡政權。⁵⁷同一年，美軍再次攻入菲律賓。

1945 年，美國重新佔領馬尼拉。同時期，菲律賓人民要求民族獨立的聲浪高漲，美國國會與菲律賓議會在此壓力下決定 1946 年 4 月舉行菲律賓總統大選。1946 年 7 月 4 日，Manuel Roxas 總統宣布菲律賓獨立成為「菲律賓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這也是亞洲第一個自殖民政權手中獨立的共和國家(陳烈甫 1983:111)。⁵⁸獨立後的菲律賓也無法與美國清楚切割，美國依然透過殖民時期建立的民政機關控制著菲律賓的司法、財政、運輸與經濟等重要事業(趙江林、孟東梅 2005)。

菲律賓正式獨立後，政治制度、國家機關、憲法都依循美國的建置；且美國依然佔有菲律賓部分的港口、要地作為亞洲軍事布局的領地(陳烈甫 1983:198)。Tsing 針對美國、菲律賓的關係指出：菲律賓的國家體制、想像和運作來自於美國的引導，目的在於完成美式的國家管控機制(2003:149)。也就是說，不管菲律賓獨立與否，它都脫離不了與美國之間的政治幾何學。這正是我在談論電力發展之前必須談論菲律賓的殖民史緣故，我在第三章中會談到菲律賓國內的電力、電信發展都是在美國殖民時期為了商業投資所設立。

⁵⁷ 新菲律賓共和國又稱第二共和國，這是一個由 José Paciano Laurel 作為總統的親日傀儡政權(陳鴻瑜 1980:125-127)。

⁵⁸ 事實上，美國官方為了讓獨立後的菲律賓仍需依附美國，因此支持 Manuel Roxas 當選總統。Manuel Roxas 政府私下被迫與美方簽定多項不平等條約，向美方輸出菲律賓的國家利益。

另外，菲律賓的國內政權長久以來都掌握在少數地主階級手中，寡頭政權投機取巧的貪腐傳聞未曾間歇。一般人民與廣大農民的權益並未提升與改善，因此各地的抗爭與戰亂也發生頻繁。歷任總統上台後皆面臨國家政策整合、族群紛爭、土地改革、社會平等、經濟發展等議題。其中，Ferdinand Marcos 政權在 1972 年發布戒嚴令，目的在於阻撓菲律賓愈趨壯大的左翼運動與犯罪潮。戒嚴後，菲律賓就此展開 20 年由 Ferdinand Marcos 主政的獨裁時期(陳烈甫, 1983:125-135)。Ferdinand Marcos 將菲律賓視為家族利益獲取的工具。在 20 年的獨裁政治下，菲律賓的經濟效益、國營事業、國家政策都逐漸衰退，對菲律賓的民主健全發展傷害甚深。直到 Marcos 政權推翻後，菲律賓才有再生的機會。

就菲律賓而言，因著殖民、政治鬥爭所帶來的全面性影響從未間斷。在人口來說，菲律賓境內原有原住民族、馬來人、華人，之後又多了西班牙人、美國人與各地移民揉雜在內，造就了菲律賓境內的多族裔景觀。菲律賓在宗教上受到西班牙政權的殖民影響，國內有八成以上的民眾信奉天主教(Roman Catholic)；但同時也可見基督新教、伊斯蘭教和佛教等在不同地區發展。語言方面，菲律賓國內所常用的語言為南島語系的馬來-玻里尼西亞語族 Tagalog 語。因為 Tagalog 語的使用人口以大馬尼拉(首都)為主，且使用範圍廣闊，所以成為菲律賓的國家語言代表。⁵⁹所謂的「菲律賓語」(Filipino)，就是由 Tagalog 語為基礎而演變出的一種語言。同時，「菲律賓語」的字彙也受到西班牙語、福建話、馬來語、英語、梵文等外來語的影響，使得菲律賓語正如同菲律賓的歷史縮影一般。⁶⁰

「各位旅客，請搭乘 5J504 班機飛往 TUG 機場的旅客前往登機門報到。」我殷殷企盼的 TUG 每日一班機終於開放登機；2011 年的旅程，現下終於要更靠近 Cordillera 山區了。

⁵⁹ 1935 年，菲律賓成立獨立的自治政府時，首任總統 Manuel L. Quezon 在憲法中立下「國語條款」，由執行的委員會從菲律賓境內最常使用的語言中挑選出具國家代表性的語言。當時菲律賓國內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是 Cebuano(宿霧語)，而 Tagalog 語則是第二多人口數使用。但因著國家首都位居馬尼拉，因此以大馬尼拉地區慣用的 Tagalog 語作為菲律賓的國語。1940 年，菲律賓全國的各級學校開始教授 Tagalog 語(陳鴻瑜 1980:247)。

⁶⁰ 在菲律賓國內的學童自小學起便有英語課程，致使菲律賓國人可以使用英語溝通者不在少數。但是英語的使用範圍多在工商業、學校內使用，在各地仍常見各族裔人群使用自身的母語相互交談。



圖 2-2：菲律賓地圖（擷取自 Google map）：

圖中紅色的部份即為呂宋島 Cordillera 山區的範圍；
此圖可看出 Cordillera 地區與首都馬尼拉的相對距離。



圖 2-3：Cordillera 山區的地勢圖（擷取自 Google map）。
 圖中由淡橘色所框出的地區就是 Cordillera 的行政範圍。⁶¹

第二節、貼在 Cordillera 山區的標籤

(一)、冷氣房

當我坐在飛往 TUG 機場的座艙，鄰近的乘客中有掛著名牌太陽眼鏡的菲律賓人、勾著美艷女伴的西方臉孔以及身著西裝的華人。一位與我並肩同坐的菲律賓人開口問我的目的地，當我回答「Kalinga」的同時也讀出他眼神所透露的困惑：「為什麼你要去 Kalinga？Kalinga 不好玩，而且 Kalinga 沒有什麼特別的。你來菲律賓，最好待在馬尼拉、宿霧，或是比較有名的觀光地。若是要去山裡，你可以去菲律賓最有名的 Banawe 梯田，⁶²我們最特別的都在那些地方。」我反覆

⁶¹最右邊的紅圈為 TUG 機場，中間的紅圈為 Kalinga 省中心 Tabuk 市。本文中的田野地上村在 Tabuk 市的西方(靠近 A 標示)。從本圖中可看出，從 TUG 機場、Tabuk 市再到上村的地勢，是一路從平原往山路前進的過程。

⁶² Ifugao 省的 Banawe 梯田是世界聞名的文化遺產景點之一。

思考著他說的「Kalinga 不好玩」，究竟是真指 Kalinga 旅遊景點的缺乏？還是另有所指著 Kalinga 省的「落後」？就在一個小時的航程後，飛機降落地面的劇烈搖晃嚇出那位健談菲律賓人的尖叫，他扭過頭更加堅定地跟我說：「你看吧！我告訴過你，你應該去拜訪「別的地方」！」

飛機降落 TUG 機場，映入眼簾的是在鐵絲圍籬外觀賞飛機起降的眾多人潮。TUG 機場僅有一條筆直且兩旁布滿雜草的航道，還有一座依靠旅客步行和行李運送車往返的老舊航廈。進入航廈後，琥珀色的玻璃大門口外也擠滿了被警衛阻擋的親友團、小吃攤商、Tricycle 司機等，⁶³我一邊等待如小發財車的行李運送車倒出山堆般的行李，一邊搜尋窗外的臉孔。當我拖著行李走出大門正要被攤商團團包圍時，迪爸和老六條地拉我搭上一部已待命的 Tricycle。坐在 Tricycle 裡，迪爸很喜歡重複說一段他和機場警衛的對話，「我去機場的時候，警衛都問我來這裡做什麼？我就回答他說『我來接我從台灣來的女兒』。警衛就會很驚訝地問我說，你怎麼會有台灣的女兒？我就告訴他說我以前去台灣工作，所以有台灣的女兒。他本來是覺得我怎麼會有台灣的女兒，因為我的皮膚很黑。看到你之後，他就會很羨慕我的樣子。」迪家一家人都有幾次來機場接送台灣友人的經驗。不過菲律賓各機場的門禁森嚴，有的機場只允許出示機票購買證明的人進入、有的機場必須做通盤檢查才能進入。因此，迪家人幾乎都是在燥熱的戶外看著我進出比屋外溫度還涼爽 10 度 C 的冷氣空調航廈。



⁶³ Tricycle 是一以摩托車引擎作為動力的交通工具。Tricycle 所輸運的距離較短，一段路程需付費 10 披索；因此在菲律賓的各城內、市區中較常見；一旦遠離市區就少見 Tricycle 的蹤跡。Tricycle 的設計主要用來載客，車主會在摩托車的車體旁加上座位包廂，此稱為 sidecar。通常一輛 Tricycle 可供司機、司機後兩位乘客、車廂內三位乘客，一共至多六位成人搭乘。另外，Tricycle 的後方行李座和車頂也可供行李置放。Tricycle 的費用可以依乘客數、行李量和路徑遠近和司機協商、殺價。

左圖 2-4：停放在路邊的 Tricycle，可見乘客所坐的小包廂樣貌。

右圖 2-5：Jeepney 的車廂跟車頂上都可作為乘客與貨物的座位。

(二)、誰是「Igorots」？

為什麼坐我旁邊的菲律賓籍乘客勸我別去 Kalinga？為什麼機場的出入不能讓隨行的人自由進出？為什麼迪爸認為機場的警衛鄙視他的膚色？原因並不在於旅行景點不足、機場太小或是維全等可被說出口的理由，我認為原因正在於：Kalinga 是 Cordillera 山區，而住在 Cordillera 山區的黑皮膚原住民是動亂的來源，他們所在的地方是被視為有別於現代化發展以外的地方。以此來說，被隔絕在外的人是被國家認為無法遵守秩序的人，被隔絕在外的人是被航空公司認為買不起機票的人，被隔絕在外的人是警衛眼中的危險份子。這不只是當代一座小機場的場景，北呂宋 Cordillera 山區的原住民族在國家、律法的眼中正是需要被隔絕且實施特別管理的所在地。

「Cordillera」是西班牙文中「山脈」的意思。⁶⁴根據 William H. Scott 指出，早期在西班牙人初抵菲律賓時，見到菲律賓高地中身上有紋身(tattoo)的人便稱他們為「Cordillerans」或是「Igorots」；並且西班牙人也認為這群身上帶有紋身的人就是獵首者(headhunter) (1977:2)。⁶⁵另外也有一說，起初 Igorots 一詞僅限於稱呼買賣金礦的高地居民，直到西班牙人於 17 世紀開始在 Cordillera 各地開挖金礦，才將整個居住在 Cordillera 高地的居民稱為 Igorots。事實上，整個 Cordillera 山區有來自超過六個以上語系的群體(ethno-linguistic groups)，「Igorots」的共通點僅在於他們的祖先共同走過西班牙三百多年的統治歷史。⁶⁶由此可知，「Igorots」只是西班牙政權對於「未知」的假設。誠如 Tania M. Li，東南亞的「高的」(“highland”) 普遍地被認為是有別於主流政經社會之外的邊緣地帶，是低度開發、是屬大自然的，甚至是未開發的(1999：1)。由於高地的文字、歷史資料被收集與考證的數量不多，因此「高地」始終是被想像的客體。

W. H. Scott(1977)根據 Cordillera 的歷史研究指出，在西班牙殖民時期下的 Cordilleran 山區在貿易、居住型態和文化方面都逐漸產生改變；並且居民的宗教

⁶⁴ 以呂宋島來說，較為著名的高山有 Mt. Makiling、Zambales 山脈、Cordillera 山區。這幾座高山多是南北走向，海拔達 2000 公尺以上且陡峭險峻(趙江林、孟東梅 2005)。

⁶⁵ 事實上，會進行獵首行動的族群不僅限在 Cordillera 山區，並且也非全 Cordillera 山區的族群皆有獵首的文化行為。

⁶⁶ Goda 認為，即便當代的 Cordillera 山區居民不具備單一族群認同的同時，他們也會被外界定義為普遍認知的「原住民」(2001:1)。

信仰逐漸改變。西班牙政權對於高地最為覬覦的資產就是金礦；16、17 世紀時的高低地間就有金礦交易的記錄，不過當時的交易主要是為西班牙政府服務。⁶⁷ 西班牙政府為挖掘金礦，對於高地的地理、地圖的資料進行蒐集(W. H. Scott 1977:9)。但是，在西班牙佔領菲律賓的前 50 年間，西班牙人在高地的礦產挖掘都沒有太大的進展。原因在於西班牙人將高地的金礦視為個人資產推動買賣，恰恰山區的礦產被當地人視為集體財產；倘若要開挖埋藏礦產的土地就會牽連廣眾，因此困難重重。除了金礦之外，西班牙政府所作關於高地的文獻資料就屬宗教為多；內容多由西班牙傳道士所記錄。

西班牙政權對 Cordilleran 山區進行軍事化統治，派遣西班牙裔傳道師、軍隊和山區的旅行者(以買賣維生)到高地遊走，企圖透過這些派遣者進而掌控高地居民的生活。18 世紀，西班牙政府逐漸由軍事化統治改為柔化、啟蒙(enlightment)方式深入 Cordillera 山區，這是高山居民接受西班牙教化較為深入的時期。西班牙除了移送低地居民到高地之外，也對高地村落領袖進行教化(civilize)工作，並且設法將高地居民遷移到低地。官方甚至在收購高地作物時刻意地打壓價格，讓高地居民生活大不易而遷往低地。換句話說，西班牙透過政治、信仰、教化等統治方針，翻轉了高地的經濟結構、居民思想與日常生活。W. H. Scott(1977)以「悲劇」來形容此時期的菲律賓高地。

綜上述，此時期的史料記錄多由上而下，由西班牙裔者代高地的歷史發言。不過，即使早期對於 Igorots 的記錄檔案不多，不過就相關紀錄的內容可以發現：早在西班牙來到菲律賓前，低地人就會到高地作生意，且高地人也會下山作交換、買賣。W. H. Scott 的著作中提到西班牙裔人類學家 Quirante 的民族誌著作，此本寫於 1624 年的著作中提及：Quirante 認為「Igorots」的不聰明，是因為他們抗拒西方的科學知識以及他們不理解遷居到礦場邊、耕地邊的好處(1977:46)。此敘述正好說明了當時高地居民對於低地的抵抗思維具主動性；且 W. H. Scott 也認為高地居民長期以來都具備自主選擇意識。

隨著菲律賓交移到美國手上；美國占領時期將呂宋島高山地區特劃成「原住民山嶽居住地」(SarDesai 2001:253)。美國殖民政權為了管理、統治上的便利，將美國原住民保留區的概念移植至菲律賓高地，劃界出政府眼中陌生的、無法掌控的所在。再隨著時間來到菲律賓獨立建國初期，整個 Cordillera 山區被總稱為

⁶⁷當時高地居民使用金礦跟低地者交換豬、水牛(carabow)等牲畜。

—Muntain Province(中譯為高山省)。另外，菲律賓的中央行政部門也增設國家民族融合委員會(Commission of National Integration)，目的是要同化原住民族群、少數族群(陳鴻瑜，1980:241)。該委員會執行同化的手段是增設小學教育，不過成效不彰；此委員會設置不僅影響到 Cordillera 山區，菲律賓南部的伊斯蘭教徒對此也相當憤慨，甚至為此決策爆發激烈衝突。

陳烈甫指出，高山省的眾議員 Luis Hora 曾在國會中提議立法，禁止使用「Moro」、「Igorots」等稱呼；⁶⁸因為這些命名代表著不開化野蠻民族之意，因此應將「Moro」改為回教徒(Muslim)，而「Igorots」則改為山地居民(Highlander)。雖此提議最終未過，但在高山省取得自治權後，已改以 Cordilleras 稱呼呂宋島的山區居民(1988:223)。而「Igorots」也逐漸被菲律賓大眾認為是創造出來指稱未開化族群的貶抑詞，因此也愈趨少用。

1966 年，菲律賓再將原先的高山省細分成四省並增設省政府與地方部會。⁶⁹1987 年，菲律賓總統 Corazon C. Aquino(任職 1986-1992 年)發佈命令將這四省設立為 Cordillera Administrative Region(簡稱 CAR)。1989 年，CAR 管轄範圍增加 Abra 省；1995 年，Kalinga-Apayao 分成 Kalinga 省、Apayao 省兩個省份。⁷⁰此後 CAR 共有六省；行政首都為 Baguio City(碧瑤市)。其中我所關注的 Kalinga 地區；Kalinga 一詞作為地理名稱外，它也作為居民的自稱。Kalinga 一詞出現在 18 世紀末，它所指的對象是住在 Cagayan Valley 一帶的人；尤其是指西班牙軍隊眼中的異教徒(pagan)和山地人(mountaineer)敵軍。⁷¹另也有一說，Kalinga 一詞就是獵首者、好鬥者的意思。Dozier(1967:vii)則說，「Kalinga」是語族的分類指稱，不可將住在 Kalinga 地區或是使用 Kalinga 語言的人視為同質，必需要按不同地區作出細部劃分。

以下是 CAR 行政區域圖：

⁶⁸ 「Moro」被用來稱呼菲律賓南部的伊斯蘭教徒。

⁶⁹ 此四省為：Muntain Province、Benguet Province、Ifugao Province、Kalinga-Apayao Province。

⁷⁰ 依據 Philippine Republic Act No. 7878 分為兩省。

⁷¹ Barton(1949:13)紀錄人類學家 Beyer 對於 Kalinga 的形容為“an ethnological hodgepodge”(民族學的大雜燴)，意指此地的移居者眾，各地人群匯流。

圖 2-6：為 Cordillera 行政區內所屬的省份。⁷²

Kalinga 省為是黃色的區塊。(此圖可與 vii 的地圖互為參考)



(三)、Halo halo

離開 TUG 機場後的 Tricycle 抵達巴士站。我們在此等候換搭沒有冷氣的老舊箱型車前往 Kalinga 省中心—Tabuk(市)。候車時，迪爸同樣地被其他在地人詢問身旁這位「白白的人」是誰，迪爸有時回答「他是台灣人」，但有時會回答「他是上村的人」。不管我和迪家人到機場、車站、菜市場、醫院、婚禮、鎮公所等地，我都成為了他們口中「白白的人」。詢問者不時以韓文、日文、中文、廣東話、英文與我打招呼或是叫賣。⁷³擠滿 20 位乘客的箱型車內，常常擠得讓人肩膀痠痛；車窗外的景緻不是黃沙飛揚就是人車並行。約莫在車內晃呀晃地經過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廂型車就抵達 Kalinga 省的 Tabuk 市區。

抵達 Tabuk 的同時已經下午四點多，但是這趟旅程尚未結束。我們又在 Tabuk 市的公有市場旁等車；這次要等的是開回水墾區的 Jeepney。放眼望看 Tabuk 市，它非但不擁塞，且也不見菲律賓處處林立的 Jollibee 速食店招牌。⁷⁴我們走在 Tabuk 的路上，兩旁的商家外貌新舊夾雜，有新穎的百貨小舖、洋酒專售店、指

⁷² 圖片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Cordillera_Administrative_Region (2011/12/12)

⁷³ 2010 年時，當我與迪爸一同步行在馬尼拉街頭時，我便被迎面走來的日本人以日本語音濃烈的英文詢問我馬尼拉的 Jeepney 如何搭乘。正當菲律賓人都覺得我是「白白的人」的同時，從北方來的日本人卻覺得我是他們眼中可以透過外表而辨識出的菲律賓人，也就是透過我曬得黑黑的皮膚作辨識。在這個例子中，可看出南/北對於我者/他者的辨別差異。

⁷⁴ Jollibee 是目前菲律賓最大的連鎖速食企業。現也跨國展店至香港、越南、印尼、沙烏地阿拉伯和夏威夷等地。其經營模式與西方速食店幾無差異，較大差異之處在於 Jollibee 除了提供漢堡、薯條、炸雞之外，另有白飯套餐、麵食套餐等選擇。資料來源：<http://www.jollibee.com.ph/about-us> (2012/11/12)

甲美容店、手工藝品店，也有雜亂的木柴燃料專賣店、兜售炸花生米的推車，和坐滿裁縫師的開放式裁縫店等。等車的空檔，迪爸總會帶我們去一家隱蔽在轉角的高級麵包店裡吃 halo halo。⁷⁵迪爸和老六對於 Halo halo 的偏好截然不同；迪爸喜歡麵包店裡乾淨明亮、食材色彩豐富的 halo halo，而老六喜歡在菜市場裡跟著炒豬肉、啤酒並列在小菜盤堆裡的 Halo halo。每當我在吃 halo halo 時，就會想起曾在菲律賓擔任短期非營利組織工作者的方志勇說過，「菲律賓這個國家就像一碗 halo halo；他們的歷史、種族、信仰、語言都很多元，就像是各式不同的食材、口味、顏色。⁷⁶」Halo halo 會出現在高級的餐館、塵沙飛揚的街道、購物中心、充斥各種味道的菜市場，就像菲律賓的內部異質性。Halo halo 就像菲律賓，且 Halo Halo 也因著不同階層的菲律賓人而有了不同的價格、花樣和販賣地。認識 Halo halo，可以幫助初來乍到的我認識菲律賓。



左圖 2-7：此雜貨店為水墾區 Jeepney 發車點，且水墾區的雜貨店多向此倉儲雜貨店進貨。



圖 2-8：市區高級麵包店裡所賣的 halo-halo。

我們等待開回水墾區的 Jeepney 是由迪爸的親戚阿 B(30 歲，Jeepney 司機)所開。這一輛加開車上除了我們，還有許多要回水墾區的人；而這些人都是早上那班固定往返市區和水墾區的車次所載不下的人。平常倘若沒加開車，他們都必須硬擠到 Jeepney 的頭頂上去。Jeepney 在市區一路經過市政府、大型倉儲式米店、銀行、賣水店、種子店等；再往郊區一點，就剩下小餐館、家庭經營式雜貨店、水果小攤。在 Tabuk 市郊區也可以看見一望無際的稻米田。Jeepney 一路上

⁷⁵ Halo halo 在 Tagalog 語中意指的是 mix mix，也就是混雜在一起的意思。其口感和外觀有點類似於台灣的刨冰，在菜市場、麵包店、餐廳裡賣的 halo halo 所使用的食材大不相同。從冰淇淋、蒟蒻、水果、脆笛酥到粉粿、米苔目、果凍、豆類、椰奶等皆有；其價位也從便宜到昂貴不等。

⁷⁶ 方志勇先生曾在蔡晏霖教授於 2011 年秋季碩士班課程「全球化下的東南亞」中發表演講。方志勇先生曾於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擔任實習員。

除了商家、房舍和田地，也會遇見軍方設下的檢查哨。軍方在地面放了輪胎和柵欄，迫使 Jeepney 司機必須放慢速度繞過這些障礙物。

一旦 Jeepney 開入跨越 Chico River 的橋面，就表示我們逐漸遠離市區；又當感受到氣溫略降、空氣清新、路段坡度略升時，就表示車子已經駛進山區了。隨著緯度愈高、視野愈見遼闊，就會看見各個大小面積不等的纏繞在山腰間的梯田和聚落。⁷⁷ Jeepney 沿途會經過一到兩個小型市集以作為休憩站。小市集販賣的產品多為鄰近聚落所生產的農作物，例如辣椒、豆子、椰子、芒果等該季所盛產的農產品，另外也會有些炸麵粉球、椰子水、麵包等小點心供旅客買來做為零嘴。事實上，Kalinga 山區的各聚落歧異度大，各地不同的高度、光照、水量等造就不同的特性和作物；因此提供交換、買賣的小市集是相當重要的存在。

一路從機場到這裡，天色不早再加上一路都沒有路燈，Jeepney 司機通常會加速駛回水墾區，阿 B 也不例外。

(四)、Lubuagan，小鎮？

回到水墾區前，我們會先經過距離水墾區半小時車程的 Lubuagan 鎮。Jeepney 不會在鎮上久待，通常只會有一些乘客上下替換。Lubuagan 鎮之於水墾區的重要性在於兩地的移墾關係，因此兩地的親屬連結和訊息往來都相當密切。

Lubuagan 鎮是尚未重新整併前 Kalinga-Apayao 省中心。1970 年代的 Lubuagan 設有 Kalinga 大學、公私立中學、大型醫療中心和公家機構，當時是座繁盛的城鎮。但是這些建設都因著省中心轉往腹地較大的 Tabuk 市後一一遷移；這象徵著 Lubuagan 鎮的邊緣位置形成。⁷⁸談及 Lubuagan 鎮的邊緣位置形成有幾個具代表性的歷史因素，首先是西、美兩殖民政權都把 Cordillera 山區劃界一區，特定行政機關管理。再來是菲律賓政府也設立 CAR 特別治理，並且分設各省。最後是 1990 年代，Kalinga 的發展中心自山坡地形上的 Lubuagan 鎮移到平原地形的 Tabuk 市。由此可見，「邊緣」、「中心」的形成並非自然形成，其政治力量介入也是影響關鍵。

人類學家 R. F. Barton(1949)研究 Kalinga 習俗與地方規範的主要田野場域就

⁷⁷每個山腰聚落看起來很靠近，但若真要拜訪不同的山頭、聚落，就要先下山再上山。

⁷⁸由於水墾區就像衛星一般地緊鄰 Lubuagan 鎮，因此分析 Lubuagan 鎮的邊緣性，即可理解到水墾區的邊緣性再形成。

在 Lubuagan。⁷⁹Barton 筆下的 Lubuagan 在當時是一個以茅草屋為主要地景的所在；Barton(1949)曾以土地的價值研究關注 Lubuagan 的地方發展。剛開始時，山區的土地是沒有價格的；居民可隨處、隨意的開墾。但自從 Lubuagan 被設為省中心後，人口增多並帶動土地的交易。初期的土地交易是根據「名望價值」(prestige value)；也就是說土地被使用的年限愈久就愈有價值。一塊具有名望價值的土地象徵著居民的集體性，因此具名望價值的土地要交易時往往會牽動村落、家族的集體討論。土地的「名望」是依據集體的認定，因此透過名望價值買賣的方式可以保障老土地的耕作價值，也可牽制土地買賣的公共性。

另外，土地交易的過程必須舉行買賣儀式(Barton, 1949:77)；這個儀式的舉行至今仍在。由於土地的公共性，以及土地的家族共有制。土地一旦要易主，就要必須舉行公開的儀式邀請家族成員前來，並且邀請村落耆老同來見證。經過集體討論來確認土地的價值、大小和權責，並且殺豬、宴客、跳舞完成土地轉換的過程。土地交易後的金額、牲畜跟獲利也在買賣儀式中同家族成員分享(分送)。這個土地買賣的儀式現在仍在，不過通常是大家族才會舉行，而且儀式形式變得簡化。

隨著 Lubuagan 鎮的移出/入人口增多，居民的集體性產生裂縫，依土地名望的交易規則受到破壞。如此一來，原本住 Lubuagan 的居民因為經濟壓力、土地不足、高度競爭的情勢，開始沿著 Lubuagan 鄰近山區另闢棲所。而水墾區就是其中一座新墾地，⁸⁰迪家也是一支從 Lubuagan 遷往水墾區的家族。以 Barton 筆下的 Lubuagan 對照今日；鎮上仍可見多棟高腳屋式家屋，但鎮上的大型建築物，如鎮公所、醫院、圖書館等，以及新搭建的房子都改以西班牙式風味的建築。⁸¹如今的 Lubuagan 鎮已不再是省中心，留下的人多是原住在此的家族。當初隨著「省中心」移居來此的人，早已隨著「省中心」的名號再移去 Tabuk 市了。匆匆的過客如同 Lubuagan 鎮匆匆即逝的繁盛。Lubuagan 如今還能吸引大批人潮的時刻正是「Laga Festival」(以下稱為編織節)。編織節起初是被鎮公所創造的節慶，至今已舉辦 50 年。⁸²

⁷⁹ 我在本文當中的 Lubuagan 拼法是以菲律賓的官方網站資料為主，而在 Barton(1949 書中的拼法則是以當地的語音拼出「Lubwagan」。且當時的 Lubuagan 是 Kalinga 的省會所在。

⁸⁰ 水墾區的原名在 Lubuagan-Kalinga 語中正為「開墾」之意。

⁸¹ 西班牙式建築的漆面色彩明亮柔和(以白色與黃色居多)，還有圓拱式的門窗以及大陽台。

⁸² 關於編織節的說明來自於現任副鎮長。年紀約莫 50 歲的副鎮長是迪爸的女性親戚，他在自家經營一間手工藝品店，專門販售 Kalinga 的圖騰織布、盾牌、陶壺和串珠項鍊等。副鎮長對於 Kalinga 的文化符碼掌握甚深，且將各式能作為 Kalinga 象徵物的傳統技藝品帶入鎮公所內作為



左圖 2-9：2011 年編織節的宣傳用大海報。

右圖 2-10：2012 年編織節，少女們頭頂陶壺、身著編織裙裝進行表演。

Jeepney 在 Lubuagan 鎮暫停過後，Jeepney 司機必須趁著天還沒黑前把乘客都送回水墾區。

第三節、來到上村

(一)、步行

順著顛簸的石子路一直開，Jeepney 會先抵達水墾區下村。下村的雜貨店是當地居民早上寄貨、翌日領物的收發地點。根據老六說，司機每搭載一個貨包(例如一箱可樂、一袋米、一籠雞等)可獲得 20 披索的工錢做為報酬，但有時因為司機並非面交給貨主，或者是貨主在幾日後便忘記支付工錢，而司機也會礙於彼此交情忽略要追討工錢，遂而演變成居民間的道義協助。⁸³司機延著道路旁的雜貨店一一卸下各家托買的貨品。⁸⁴乘客也可自由地下車、卸貨，我和迪爸、老六一起在迪爸外甥 Kate 的雜貨店外下車。Kate 是一位年近 30 歲的雜貨店老闆娘，他擅用英語交談且經營著被稱為「最大的」雜貨店。⁸⁵Kate 因著他的兩位姊姊都在

裝置藝術。

⁸³ 整個水墾區目前有在 1935 年就形成的上村和下村；另外在 1990 年時西村因為人口增多而獨立成一村。因此水墾區共三個巴朗圭(Barangay)，又稱村落。

⁸⁴ 村裡的司機所兼負的任務相當繁雜，又是郵差、送貨員、提款機等需「傳遞」的工作都會落到司機的身上來。司機們通常還會帶著一位隨車小弟幫忙處理大小事，小弟通常是自家的親戚或是鄰居等值得信賴的人。隨車小弟必須幫忙收車費、搬運、記帳、跑腿等，而小弟的薪資就由司機支付。

⁸⁵ Kate 曾在 Baguio 市讀大學，他在大學時期與一位英國男子相戀，爾後回到水墾區結婚。英國丈夫給 Kate 一筆錢開雜貨店，並且在下村蓋了水泥樓房做為他們的家。不過居民和親戚們都猜想這位英國人到下村是別有目的。因為他們常看見英國丈夫獨自到山區繪製精密地圖，或是使用地質探測器探勘土質等；再加上 Kate 也說丈夫真有一個神祕的木盒裡放著連 Kate 也不能觸摸的資料和文件。他們一同在下村住了幾年後，英國丈夫有天留下一封信、房子和一筆錢給 Kate 之後，趁著 Kate 不在家時拎著木箱就宛若人間蒸發一般地失聯了。而 Kate 傷心之餘，也利用這筆錢經營生意。Kate 的店之所不同於其他店是因為他的店緊連著道路，且他的資金足夠；他便會

西班牙工作，因此 Kate 向他們學會料理義大利麵、沙拉等食物作為招待外國訪客所用。我們在 Kate 家裡用餐、閒聊、休息過後就動身回上村。在 Kate 家旁約 100 公尺處有幾階由石塊堆成的殘破階梯，階梯上還流著山澗水，階梯後連結一條陡峭的小道。這小道就是通往上村的步行道路。⁸⁶老六揹著超過 30 公斤的沉重行李準備回上村。⁸⁷看看時間，這時候已經是晚間七、八點。

我們靠著手上的手電筒在暗夜中步行。小道彎彎延延地往上攀升，有些路段僅夠一人通行、有些路段陡峭地幾近垂直。路面由柏油階梯、碎石、土壤等不同的材質連結而成。若在早上時，可見中學生們陸陸續續地往下村的學校奔去，學生們遇到陡坡路段時，各個身體皆呈現大於 90 度的傾斜姿態往下滑行。中午時，在路上常見揹著米袋、貨物、紙箱的青壯人，他們打著赤膊並且步履蹣跚、揮汗如雨地往上村走去。傍晚時，則是學生們下課回家的悠閒身影。這段路上的風景與植物，就是學生們放學時的玩具。這條小道的中繼休息站就是上村的小學。⁸⁸白天可見，小學裡的三、四棟校舍皆漆上鵝黃色的牆面；使它在一片油綠的景觀中更顯突出。四棟平房校舍依序坐落在中央司令台的周圍，步行者們會在小學的司令台避暑，或是小解跟取水來喝。夜晚雖然較為涼爽，但山路坡度仍是讓人走得相當費力。⁸⁹此時的夜色因月照微亮，四下靜謐，陣陣微風很是溫柔。

過了小學校之後的路徑便與前段的陡峭路面顯得不同。從小學校出發之後的道路多是平坦的田埂路。路旁是一畦畦的水稻梯田，如階梯般坐落的稻田面積都不大，上田與下田之間的牆面多由石頭堆砌。走在田邊可以感受到海拔逐漸上升之後的涼爽。白天時，這段路上就會遇到正在餵食水牛的牧人，或是肩背著香蕉、水菜或是樹幹的做事人。除了水稻田外，田邊的畸零地也常見居民栽種鳳梨、山苦瓜、老虎草、水菜等作物。田邊也會有收集山泉水用的小渠道，渠道可以聯絡各層層的水田。走過層層疊疊的梯田，距離藏峰聚落也就不遠了。

藏峰聚落就坐落在山坡上，因此聚落裡的家屋建築也就如同梯田一般有著高

進貨雞隻、白米、可口可樂、洋酒、椰奶等高單價的商品來賣。

⁸⁶ 雖說這小道並不是唯一一條可抵達上村的路徑，但這條小道正是水墾區居民往返上村最經常使用的道路。

⁸⁷ 搬運工作有時也會請同行回上村的人幫忙搬；例如迪爸每回從城裡批貨到自家雜貨店時，總是因為貨物過多而需要他人的協助，只要將貨品搬回上村的人便可得到約五至二十披索不等的回饋商品，例如像是餅乾、醬油、菸、砂糖等作為酬勞。

⁸⁸ 這座小學有幼稚班以及一到六年級各一班，上村的孩童們就是這座小學的學生。因此，開始上學後的孩子們對於行經陡峭、窄小的小道都相當地經驗老道。

⁸⁹ 當地居民從上村到下村若沒有背負重物，只需 15 分鐘即可。

低排列。按階序來看，聚落內約莫有十層左右按圓弧狀排列的家屋。家屋大小各異，聚落入口處的房屋就用水泥蓋了一層平房，是近幾年才蓋好的房子。往聚落中心走去，有的房屋是用長木頭作為底座，屋牆用籐編的草蓆搭蓋，屋頂是略顯鏽黑的鐵皮。這類的房屋最為常見，因為建材簡單易取，且搭蓋技術容易仿製。這類的房屋多由家中男性協助搭建，所耗的費用相對地低廉。再堅固點的房屋就是全由木頭蓋成的，或是混點水泥作為房屋的架高柱。在夜間，村裡很安靜，僅有迪家的戶外燈還亮著光在等我們。回到上村後，步履蹣跚的我們會直接走回迪家休息，並喝上一杯迪媽早已準備好的深黑色的甜熱咖啡。這杯咖啡就是迪家為遠道而來的訪客所表示的歡迎。

(二)、甜甜的黑咖啡

每日早起，迪家陽台前的山巒總被雲海包覆。在早餐前，我會到聚落裡走走。行走在聚落裡，熱情的居民總會邀約著到家中喝杯手工磨成的黑咖啡。黑咖啡裝在鐵製的小茶杯或是中國製的塑膠杯中，有時表面還會浮著幾顆諾大的咖啡粒。上村的咖啡烹煮方式，是先將咖啡豆放到鍋裡炒。⁹⁰通常必須將咖啡豆翻炒至變得焦黑，並散發出燒焦味。接著再把炒黑的咖啡豆放到杵臼中搗成粉末。⁹¹搗後的咖啡粉挖取幾匙放入鐵茶壺或是鍋中，加入水後一併煮開；水滾沸後再加入幾匙紅糖，倒到杯中就可以喝了。山區的咖啡樹種源自西班牙時期就有植入的痕跡，不過在 Cordillera 山區並沒有全面栽種。花叔說，「山區的咖啡約莫有三種。1957 年左右，水墾區開始種拉丁美洲種的 Robusta 咖啡樹，冬天時收成。另外還有一種當地稱為 Talon 的 Arabica 咖啡樹種，不過在 1964 年因著風災造成樹種全倒之後就再也沒復種了；這種 Talon 咖啡最適合女生喝。此外，我覺得應該是最古老的品種，就是 Exelsa；我們稱它為 Sagakat。這個品種的咖啡很貴，又很難找到。我覺得這最好喝，很像有加牛奶的味道，很適合男生喝。」⁹²

迪家老六也說，Tabuk 市北邊的高山區是最大量的咖啡生產地，而整個

⁹⁰ 炒的意思就等同於烘培。上村的烘培技術就是把豆子放入鍋子炒。

⁹¹ 杵臼是用大木挖成臼洞，又以直木作成杵(劉芝田 1970)。以迪家來說，迪家的咖啡粉是迪媽搗的。除了槌搗之外，迪媽還會準備小篩網，將尚未搗碎的顆粒挑出，再搗成粉末。迪家算是較為講究咖啡粉末粗細的家戶。

⁹² 據我了解，上村居民的咖啡豆取得多來自野生的 Robusta 樹上/下(掉在地上的)。有的則是在 Tabuk 買的，有的是向住在北 Tabuk 地區的親戚家取得。各家的咖啡口味只有甜度、濃淡的差異，很少區分男女性別所喝的咖啡。在加上我並把咖啡納入本地區的主要農作物，因此資料收集也較少。此譬喻和材料則提供給日後進行研究者更深入的探討。上村的三個聚落之間約莫相隔 15 至 30 分鐘腳程，聚落之間有高低落差。

Kalinga 省是菲律賓境內 Robusta 的主要產區。很多打零工的人會在 12 月、1 月的時候到咖啡農的家裡幫忙採收。老六的親阿姨在那裏就有一座大型的咖啡園，老六在冬天時都會趁機去幫忙。他說，工資可以領現金或是咖啡豆，他通常會選擇領咖啡豆回來分送給家裡的人跟朋友。此外，在咖啡園裡掉落在地上的咖啡豆都是可以免費帶走的，所以他常常獲得比酬勞更多的咖啡豆可以帶回。喝咖啡儼然成為高地聚落中重要的交誼方式。一般家戶在招待客人時，都會煮上一杯熱騰騰的黑咖啡，以作為歡迎之意。聚落裡的緊密關係，也常因著咖啡香無限綿延。

(三)、站在高處

站在上村的空曠處，便能遠眺環繞上村的高山，以及雲海和盛陽。藏峰聚落的入口處是一視野遼闊的高點。站在藏峰聚落的入口處，可以遙望路程約莫 15 分鐘遠且同樣也被梯田包圍的綠聚落。而上村的另一個隱聚落則隱身在山頭之後，必須繼續深入才可看見。⁹³



圖 2-11：上村的聚落位置圖。

上村的北邊有 Bu-ta-owu Mountain，東邊是 A-we-chon Mountain，西邊是 Ak-ta 山。其中 Ak-ta 山為上村居民的主要林木取材山區，也是重要的耕地所地。⁹⁴此村落四周環山，海拔比另外兩村稍高，大約是 1200-1500 公尺之間。因此上村的氣候較為濕寒、多雨。因著上村水源豐沛、耕地廣闊且具安全性，所以是水墾區較早被開墾的聚落。上村目前尚無可供交通工具行駛的道路能夠使用。也就是說，上村仍仰賴人力運輸將所需物資扛運上山，含括電力輸送之後所需的電線桿、建房屋所需的水泥和各式食物等。然而，在下村和西村的生活便利度高於上村的同時，但是上村至今卻仍然維持最多的人口數。原因正是上村的可耕地佔全水墾區最大的面積。也就是說水墾區的居民多需要上村的農田所孕育出的作物供

⁹³根據 2007 年的菲律賓人口調查顯示，藏峰聚落目前約莫有 500 人，是上村中最大的聚落。次之是綠聚落和 M 聚落。由於我在田野工作期間多居住在上村最大的藏峰聚落。

⁹⁴此處的山脈名稱拼音依據上村居民提供。上村四周環山，海拔比下村、西村稍高，上村的海拔大約是 1200-1500 公尺之間。因此上村的氣候較為濕寒、多雨。

養。而這就是上村在整個水墾區的重要性。即便仰賴搬運使得上村的生活物資較匱乏，但上村居民們認為在此自產農作比起生活在他地更為自由。除此之外，根據舊有連接各聚落的山區古道來看，上村有條與 Lubuagan 鎮直徑距離最近的山路。山區古道通常是橫向地連結著各聚落，其寬度也僅供人或是牲畜步行，且沒有鋪設柏油。各古道的路徑通常是在地人才會知曉，居民們也常以這些古道作為行動上的捷徑。因此整個水墾區若有緊急需求需要到規模較大的 Lubuagan 鎮求援，上村反倒比起有聯外柏油道路的另兩村更握有最佳的路徑。

藏峰聚落除了水田面積大之外，也因水質清澈而盛產許多 *don-sui*(水菜)、*sayu-di*(龍鬚菜)等蔬菜類；不僅可以自己吃，更可以販賣到 Tabuk 市賺取所需。藏峰聚落居民的宗教信仰於早期多信奉英國國教(Anglicanism)，聚落中於 1964 年設有英國國教教堂一座；後來才有各式不同教派傳入並進而影響聚落居民的信仰與集會。聚落居民之間多有親屬關係，因此只要有陌生面孔進入村中，都會引來居民的警戒之心。「親屬關係」不僅是構成山區聚落形成的關鍵要素，更具有安全防衛的功能存在。

過去，「水墾區」是一個簽訂安全協定的政治體。隨著菲律賓的行政體系建立，將水墾區內再細分為三個 *barangay*(村落)，並以此作為行政體系中的最小單位，不僅讓政治單位統一化，更是瓦解掉區域間的結盟關係。在過去，倘若兩地沒有和平協定共識，就等同於沒有保證安全的通行證；相互往來的居民就要承擔意外、衝突的風險。水墾區與多地簽下和平協約後，居民便可到他地換工、買賣、做佃農等工作。

歷史上，Cordillera 山區之所以被認為不易管理的因素在於，山區的居民鮮少遷移到低地，且對於從低地來的外來者相當不友善。事實上，對於高地居民而言，「外來者」不僅是指從低地來的人，含括在此地無親屬卻來到此地方的人都是「外來者」。因此，村落與村落之間若沒有親屬關係的連結就少有來往。在聚落北邊的 Bu-ta-owu 山上有一座聚落，聚落裡燃起陣陣炊煙。我曾指著那個聚落問老六說，「你去過那裡嗎？」他答，「那裡有煙的地方嗎？那裏很遠很遠耶，走路走不到的。去那裏的話，要先下山之後再繼續上山。我們家沒有親戚在那裡，我從來沒去過。雖然站在這裡總會看到它，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我要去。我們不會去，沒有親戚就不要去，會有危險。你不認識他們。」

視線隨著圍繞在上村的群山山脊延伸。回想這一路上從機場、市區到上村，

以及上村和各地之間的距離。上村或許和各地之間存在著地理上可被測量的距離，可是上村與各地所保持的距離不僅是地理上的，也包括社會上、政經位置上的距離。殖民政權、國家主權對於此地的宰制、切割都再再地彰顯中央透過制度、規範劃下核心與邊緣的距離。然而「邊緣」就成為被想像、被控制的所在。

第四節、小結

在這一章節當中，我主要強調的是上村所在的 *Cordillera* 山區在不同的政治時期(殖民政權或是民主政權下)，皆以「特殊地區」的方式被治理。可以看出，治理者所預設的立場在於 *Cordillera* 山區式有別於其他一般地區的所在，他們認為 *Cordillera* 山區必須在一般建制外的管理制度下被對待。就在這一份治理者的「特別關愛」中，*Cordillera* 山區的自然資源運用和在地經濟的發展，就已被置於邊緣：一方面，治理者以叛亂之名視山區為亂源，所以必須特別管理；一方面，治理者設立相關特別法令、管理條約來牽制 *Cordillera* 山區的居民。在不同的政權治理下，*Cordillera* 山區都因著相同的治理邏輯而被圈限在「邊緣」的位置。

對於治理者而言，位居「高地」即是位居邊緣。「高地」總是被視為有別於城市、低地的所在，高地上的人群、環境往往被歸類於社區(*community*)、原住民(*indigenous*)、在地(*local*)的地景與視角；這些分類和劃界使得高地與低地、城與鄉產生想像上的距離，也產生在理解上的隔閡。然而事實上這些歸類正是被社會所建構出的理解模式，而不是位居山區的居民與全球力量、各式知識交會時所存在的實際距離。

從 Takaki 對於 Kalinga 水墾區的貿易研究中可看出，1930 年代是水墾區跨區域貿易的重要轉捩點。當時水墾區的菸葉在貿易中佔有突出的角色，透過菸葉的輸出可以換取到高價位的中國貿易品以及水牛。水墾區其他的輸出還有：規格不同的竹籃、竹帽、咖啡、豆子、鋤頭、收稻刀等。而從外地輸入到水墾區則有陶壺(*earthen pots*)、堅固的籐籃、椰子、斧等(1977:167-168)。對於水墾區的人，除了陶壺和籐籃之外，他們可以不仰賴外來品的輸入。對於其他地區而言，水墾區的產品品質次等且微不足道。然而，對於這些跨界的交易而言，讓區域間產生互動比得到好貨品來得更為重要。具有共同協議(*co-pact regions*)的地區之間，會在彼此的糧食缺困之際相互支援糧食(稻米)。複雜的菲律賓山區情勢，基本上就是一個「變動」的主體。從過去到現在，唯一不曾改變過的就是「改變」；為了生計改變、為了生存改變、為了生活改變。Tania Murray Li 認為：不管是面對社

群與國家、生計與市場或是過去與未來，改變對於「傳統的」人群而言並非新的困境(1999:5)。

本章也從上村的生態面來看其全球連結。其實上村居民相當明白山區資源是有限的(ecological limitation)；在山區有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自然資源是低地城市人的想像。位居山區的侷限性是上村居民生活中的一部份。由於高地的氣候濕冷且可耕地的大小有限，作物(尤其是稻米)的收成量根本供不應求，這導致山區之間的勞動交易與買賣相當盛行。迪爸說他曾在 30 幾歲時為了取得米，而跟三、四人一起走了三天的山路到有親戚的聚落裡換工，再把換得的米搬回聚落裡。這是必需的生存之計。作物的生長也是有時間限制的；每年總會有較難以度過的時日，那段時間就依循上村的生計知識來補充所需。我認為，高地聚落的「邊緣」(marginality)是一種與低地間的相處模式，居住高地就如同居住低地一般，是自主的、有意識的選擇，而非逼不得以或是被擠壓的。當然我也必須承認在山地與低地之間有著不對襯的關係，就如同 Anna Tsing(1993:90)所說的：邊緣性是與權力中心之間的一種持續關係。⁹⁵位處高地絕非是與低地的社會、政治與經濟關係分隔，「邊緣」是被社會建構的，而非自然生成；建構「高地」的手段便是簡化、刻板印象化以及使用對比(Shield 1991)。

⁹⁵ 原文為：Marginality is always “an ongoing relationship with power.”

第三章、「底層的共存者」—多重附生的政治經濟角力



圖 3-1

馬尼拉的醫院是專門收拾人命的屠宰場，貧民區是噩夢的沼澤地，高級政府官員拿著人民的錢到國外瘋狂購物。...我們被認為應該喜愛被奴役的命運，因為這樣標誌了我們對於國家的忠順，因此，也是對天主的忠順。...我們尋求的報復行動將永遠無法使人滿意，直到我們絲毫不能減少地拿回被偷走的一切。...我要的不只是永遠結束我的貧窮，我也要公理正義。

—引自 F. Sionil José 的《羣眾》⁹⁶

在第二章中，我透過大歷史小地方爬梳菲律賓的殖民歷史痕跡，以及 Cordillera 山區人民們是如何地被國家的視角所記憶和形塑。在這一章節中，我將針對上村的政治經濟情勢作出探討，並且深究電力背後的複雜權力糾結。本章重點在於談述埋藏於上村的全球政治經濟力量，以及各方政治能動者的相遇與共處。

上村存在著可見與不可見的政治對峙勢力。作為一個後冷戰戰線的現場，在上村可見象徵菲律賓國家權威的鎮暴軍隊。鎮暴軍隊的結盟成員為國家、地方政府(鎮公所)與官員。除此之外，鎮暴軍隊長期夾帶計畫開發水墾區自然資源(主要

⁹⁶在《羣眾》這篇小說當中的主角是一位來自北呂宋深山農村的男學生，小說中描述他到大城市裡求學、參與學生運動和理解自我的過程。他從原本相信國家體制到發掘原來壓迫農村、底層人民的元兇不是個人，就是國家體制。自此之後，他便不再畏懼衝撞警察築起的高牆，甚至殺了一名自稱是知識分子但事實上卻是個販毒危害學子的男人。他殺了人之後便回到位於呂宋島山區的家中，並且成為游擊軍隊的成員之一；他致力於建立屬於人民的國家。此文收錄在張清柏所譯的《荷西》一書中。

有金礦、水力、地熱)的資本家(尤其是美商)。與這股勢力相對的是隱藏深林中，由菲律賓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所掌控的新人民軍(New People Army,以下稱為 NPA)。⁹⁷NPA 在山區的盟友、支援團體是散布各地的非政府組織(NGO)、非營利組織(NPO)。不過這個結盟關係相當曖昧，通常不被 NGO、NPO 所承認。這兩大勢力的交鋒使得上村內部的居民與兩大勢力產生不同的互動模式。我將上村居民與這兩股勢力共處的生活稱為「日常政治的游擊戰」。這個意思是說，上村居民們都知道鎮暴軍隊以及 NPA 的出沒及目的；但是居民為了維持地方安全，發展出面對軍隊和 NPA 的應對策略，甚至從中平衡、箝制這兩股勢力。

我透過這兩股勢力的對峙以及上村的行動策略，理解到無電時期的上村居民為何將電力與危險劃上等號，以及從無電到有電的過程正是居民判斷電力的危險/安全的轉換時機。

第一節、後冷戰的鬼魅

冷戰時期，菲律賓是美國的盟友，兩者之間的互動是殖民關係的延續。雖然菲律賓極力想擺脫美國在軍事、政治與經濟上的扶持，但由於美方在菲律賓的軍事部屬及對亞洲的政治支配，使得美、菲兩方僅是改變其表面的合作型態而已。由於美、菲關係的特殊性，使得菲律賓一直存在著被中國威脅的陰影。直到中、美兩國於 1972 年達成安全協議後，中國才對菲律賓積極示好(Bert 2003: 293-299)。中國需要菲律賓的戰略協防、菲律賓需要中國的市場。但中、菲的矛盾來自於南海領土上的針鋒相對。菲律賓長久以來仰賴美國提供國防戰力所形成的劣勢，更使得菲律賓不能與美國切割，而需要透過美國牽制中國的動向。在冷戰結束後，中、美、菲三國之間的政治布局與制衡關係仍未停止。上村看似是位居邊緣的高山村落，與各大強國間的角力應該沾不上邊，但作為國家政權管制下的一隅，上村仍無法避免與國家權力遭逢。

圖 3-1 裡玩槍的小孩是迪爸的三歲的孫子，他正在家中玩著老六從大城市買來的玩具槍。這個玩槍的畫面影射出老六談及他小時後所發生的一場意外。老六說，他自小就對槍有著很大的興趣；他總會吵著爸爸去市區買玩具槍送他。直到他小學三年級時的某天，他和哥哥們正在家裡玩耍，他瞥見牆角躺著爸爸上山會

⁹⁷ NPA 起源自中呂宋島，但現今已在菲律賓各地藏有勢力；NPA 與以南菲律賓為主要基地的伊斯蘭教組織為菲律賓國內的兩大反對政府勢力。

搯的空氣槍，他一時頑皮就拿起來作勢發射。當他回過神時，家裡的大人們已經混亂成一團，他和弟弟一把被抱起後就住在阿公家裡長達兩周。後來，老六才明白原來是自己誤觸扣環並正巧射傷了迪媽。老六說這件事影響他很深，他曾經告訴過自己不可以再使用槍。可是槍枝卻在那之後再也沒離開過他。老六私藏一把舊式鐵鑄短槍，他夜間巡守村落時帶槍、參選村幹事時帶槍、夜間有緊急狀況時也會拿出槍。老六的故事並不是要說他與槍枝的關係淵源；而是生活在上村，居民們各自私有槍枝的行為不會被揭露，但也不是秘密。

上村的部分男子們握有槍枝；他們透過私下交易的黑市、人脈管道取得槍。老六曾說，「你們來的 2010 年，那年就很危險。⁹⁸因為有很多槍戰發生，而且山上的 NPA 很多。那時候我晚上不睡覺，去巡守整個上村。還有，Tabuk 市也很危險，因為很多幫派或是組織份子會在電影院、餐館裡面殺人，所以要隨身帶槍保護自己。以前警察不會抓有槍的人，但是現在如果被發現有槍就會被抓。因為現在帶槍要申請。要拿一張申請表證明你的用意才能配槍。但是為什麼警察不用寫證明單？他們也會誤殺別人！我帶槍也是要保護我的同伴。誰會一直去寫證明單？」從老六的說法得知，上村居民取得槍枝的目的仍為「安全」所需。而國家法律簡易地把擁槍的人分為合法與不合法兩類，合法的槍枝意指受到政府控管，此類的槍枝多為軍警所用、經登記的狩獵槍枝。而不合法的槍枝就被歸類為暴力、危險的象徵。從政府管控槍枝的作法，反映出官方對於山區居民槍枝自主使用上的不信任與防範。為何上村居民需要槍枝來保護自身安全？誠如老六所說：警察也會誤傷他人，軍警槍枝保護的主體是他們自身，而非山區居民。且在軍警的既成觀念中，直接地把持有槍枝者將反對勢力 NPA 連結。

根據陳烈甫的說法，NPA 的歷史背景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美、日對戰時期，有一支位於中呂宋的農民抗日義勇軍—Huklang Magpalayang Bayan，簡稱 Huks(漢名多譯為：虎克黨)。⁹⁹在美日戰役結束後，他們轉為進行農民革命。雖然中呂宋此地的農地廣闊、物產豐足，但是長年以來地主階級與佃農之間產生尖銳的對立關係，耕作者與土地所有權是分離的，不再有自耕農(1988:163-182)。¹⁰⁰雖然菲律賓政府於 1955 年頒布土地改革法(Land Tenure

⁹⁸ 2010 年所指的是台灣志工團隊集體到上村的時間點。那年因為團隊人數眾多，因此老六格外地防守村落安全。

⁹⁹ 但實際上虎克黨並不是一個黨而是一支軍隊。

¹⁰⁰ 多數地主想有農村的收成但多在城市裡過生活，大多數留在農村的佃農卻背負沉重的地租壓力，而且佃農們也難以擔負天災人禍所造成的損失。

Reform Bill)，與 1963 年的新土地改革法(Agriculture Land Reform Act)，目的都在於為生活困苦的佃農解套。但是土地改革成效不彰，反造成貧富差距加劇、政風貪濁，使得反抗勢力再次興起。

1969 年，在領導群與武裝隊伍重新組織後，此股反對勢力改名為新人民軍(NPA)。NPA 認為自身與虎克黨的差別在於，虎克黨僅是為了爭取農民以及自身利益而進行抗爭，但是 NPA 的終極目標在於建立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共產國家。¹⁰¹因此 NPA 所涉入的地區以及所連結的國際資源就比過去的反對勢力來得更為複雜。菲律賓長期經濟不佳、政局動盪，使得 NPA 有運作的空間。1969 年成立的菲律賓民主陣線(The 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是由菲律賓共產黨以及 NPA 組成。¹⁰²在菲律賓軍事法的默許下，菲律賓共產黨及其軍隊遊走、駐守於各偏遠的農村、島嶼和高山地帶。雖然政府已明文指出該黨為非法組織，且菲律賓政府也釋出利多，企圖瓦解其組織成員，不過雙方的對峙與鬥爭卻從未停歇，NPA 仍握有相當程度的軍事實力(趙江林、孟東海 2005:101)。¹⁰³

在菲律賓與美國政府的眼中，NPA 就是一股帶動叛亂的非法軍事力量。NPA 的成員來源以及 NPA 所藏匿的地區、仰賴的後援補給，也被視為 NPA 的一部份。水墾區正是 NPA 慣於藏匿的地點之一，也因此水墾區向來被地方政府劃為危險地帶，不屬於警方管轄，而是直隸於軍隊的巡守範圍。以下，我將談及上村居民與 NPA、國家軍隊共處的微妙平衡關係，以及上村位居夾心但重要的制衡位置。

(一)、NPA 作為一股地方勢力

NPA 形象多是透過國家治理的視角、後冷戰、國防的觀點來看待 NPA 這股勢力。然而在水墾區就藏匿著無從得知數量的 NPA，這些底層的、在戰線上的 NPA 與水墾區產生了不同的共生關係。NPA 在水墾區不只是一支游擊軍隊，更成為地方居民策略性選擇的結盟勢力。從上村到西村之間的一段步行經驗，¹⁰⁴我

¹⁰¹ 他們自稱為毛派，Maoist。

¹⁰² 菲律賓共產黨成立於 1930 年，他們希望透過武裝鬥爭、統一戰線來奪回國家政權。不過他們的宗旨迄今仍未成功。

¹⁰³ 菲律賓境內的反對事也曾相互結盟。菲律賓在野勢力企圖倒閣地 13 任總統 Joseph Ejercito Estrada 期間，NPA 與菲律賓南方的伊斯蘭教解放陣線 (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MILF) 都成為政治鬥爭下的工具。反對黨結合兩大反政府勢力所累積的群眾力量，形成國內的政治壓力，並再爭取國際支持之後完成政權推翻(沈紅芳，2001：29)。

¹⁰⁴ 水墾區的西村有別於其他村落的一大特點是，它與非政府組織維持緊密的來往關係。因此這層友好關係，西村的水力發電設施是由德國的非營利組織和 Tabuk 市的非營利組織合作前來裝置的；不過其發電量不足以應付全西村的需求，僅能提供部分家戶的夜間照明使用。且水力發電的

體認到對於上村居民而言，不同的路徑選擇有不同的目的，且不同的路徑也隱藏著不同的暗示。¹⁰⁵這段步行經驗，也讓我首次遇見 NPA。

從上村到西村的道路有好幾條，可依好走/不好走、柏油路/山路等方式簡略區別出幾條路徑。所謂「好走」的路，意指是先從上村往下村的方向走，這是一段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相當仰賴的山路，所有的物資、訊息流通都仰賴這段山路運送。再沿著柏油路面往西行就可以抵達西村。這條「好走」的路對應的是居民心中認為安全的道路。那一天，我們結束在西村親戚家短暫的拜訪後，於傍晚六點開始步行回上村。除了我和迪家老六以外，還多了兩位上村的年輕人與我們同行。此時大夥兒決定要走「捷徑」回上村。他們拍著胸脯對我保證說：「走捷徑很快，不用怕天黑。我們會很快回到上村，不會走三小時。」我們沿著柏油路往東走，約莫 10 分鐘之後，右轉入在地面上寫著「Welcome to A」字樣的上坡斜梯；也就是西村 A 聚落的入口。¹⁰⁶



左圖 3-2 為捷徑前段的白天路況，右圖 3-3 為好走的柏油路白天路況。

當地居民們對這條捷徑也相當熟悉，它是連結聚落往來重要的通路。不過此區域是居民在夜間會避免行走的路段，因為鄰近 A 聚落旁的山區是 NPA 慣於藏

技術仍掌握在外國技術人員手中，倘若西村的發電設備在天災、人為疏失之下有所損害，就必須等待 Tabuk 市的技術人員前來維修。因此，西村居民也漸漸地期待擁有穩定供電的發電系統。

¹⁰⁵ 從上村往下村的方向走，約莫經過 30 分鐘讓我手腳並用的陡峭下坡路段後，會接上水壑區主要的連外柏油道路。順著這條道路一直往西邊方向走去，便是通往西村的好走之路。我們在柏油路上偶爾會遇到幾台汽車、幾位挖路工人和在小溪流邊種西瓜的農人，每個步行者都在高溫艷陽下行動著。約莫三小時過後，我們才聽見從西村的潺潺溪流傳來的水花聲。據說，只要再沿著柏油路往西行，就會走到過去曾經以礦產豐富聞名的 Batong-Buhay。

¹⁰⁶ A 聚落曾於 2006 年主辦過以反菲律賓政府為名的 Cordillera Day，當時曾有超過數萬人前來參加。

匿、駐紮的所在地。我們才剛走入山林，草叢邊就清晰可見幾根疊在一起燃燒的木材，熊熊火焰旁卻完全沒有人影；當我們再往前走幾步，我看見幾台沒有掛車牌的新穎機車藏在樹木後面，用樹木作為掩蔽。同行的夥伴們都緘默不語，這更加深我對眼前詭異氣氛的焦慮。山路相當地窄小，只容一人的身形往前行；我們四人前後排列，兩人走在前方開路與照明，老六墊底看顧全體。剛開始的上坡路段，我一心想著要快點回到上村的家，因此我緊跟著前方的人且走得相當地急。但隨著坡度逐漸攀升，我每一步的踩踏愈來愈吃力，直到腿後筋骨已經無法再用力提起；搖搖晃晃的視線總讓我一不小心就滑坐在山崖邊。五味雜陳的思緒在我腦海中繞著：「不知道村子還有多遠？不知道究竟走了多久？到底我們身在何處？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受傷？會不會遇上 NPA？NPA 會不會暗殺我們？」

這段連結上村與西村的山路，在夜間相當靜謐，甚至連一點光線都沒有。樹梢上停滿一顆一顆如星芒般的螢火蟲，閃閃爍爍地掛滿了沿途的樹木；也正好為我們照亮一點前方的小路。揮汗如雨的我還沒來得及好好欣賞眼前這片螢光饗宴時，原先踩著飛快步伐的兩位年輕人倏地停了下來，並且壓低聲音說「有狗吠聲！」老六低聲地要我把手上的手電筒關掉，緊接著我們便躡步走到一旁的涼亭坐下休息。他們三人用母語來回交談，由於他們神色緊張，我便多次插嘴詢問他們在說什麼，但卻沒人願意為我翻譯。忽然，老六用英文對著一片遼闊的黑色大地喊話「你們有食物嗎？你們有藥嗎？或是你們有任何點火的嗎？我想跟你們借。」¹⁰⁷他語畢，大家除了呼吸之外，一點聲響都不敢發出。過了一會，暗夜裡便再也聽不見狗叫聲了。約莫沉默了幾分鐘後，老六才對我說，「這段山路晚上很少有人會走，因為這裡是 NPA 夜間紮營的主要地段；除非是村子發生緊急事件或是夜間行軍才會走這段路，所以夜間聽見狗叫聲便意指我們已經靠近到 NPA 的所在地。不好的是，現在我們手上所拿的打火機附贈手電筒實在太像軍隊使用的小光源。而且我沒有帶槍。為了安全，我們只好先停下腳步，並讓他們知道我們不是軍隊，所以才會向他們喊話。」當下，我總覺得在涼亭喘息的分秒如度年，深怕一個閃神就會遭受襲擊。

之後我們繼續趕路。一路走在碎石與泥土混雜的山路上，微弱的光線根本無法讓人分辨出路徑的邊界。¹⁰⁸除此之外，老六還會偶發地忽然壓低手電筒的光

¹⁰⁷ Do you have food? Do you have medicine? Or do you have any lighter? I want to borrow from you.

¹⁰⁸ 有時我就一腳踩進別人的水田裡，有時一腳踩空就滑坐在地，有時一腳踏入溪水裡就弄濕了褲管，有時被芒草割到，有時被樹枝打到，有時因青苔而滑倒。

源，並說：「不要說話，有不明的人聲，我不認識他們。」接著我們就會躲在梯田的下階，直到聲音消失為止才繼續爬田埂路。一路上，我可以感覺到同行夥伴的腳程毫無放慢，就連平常負責村落間緊急消息傳遞且對山路相當熟練的老六也顯露出慌張，但他們並未向我多說什麼，我只能默默地跟隨著他們走下去。直到我跨過一個看似作為邊線標記的木作障礙物，才驚覺這似乎是我曾走過的路段。當我們從捷徑接回原本就屬居民常走的一段山路時，我才覺得自己真的安全了。回到家時，家中的牧師五哥已經在為聚落青年主講周六禮拜。我和同行的老六兩人垮著步伐直上迪家的二樓。迪媽以為我們沿著原路回來，我謹記著老六進門前提醒我別提回家路上所遇的情況而保持沉默。當我一口口吃下迪媽煮的飯時，我也逐漸了解到這實存卻隱藏在上村日常、黑暗中的不可見者，原來是上村居民所慣為共處的一股勢力。水墾區各道路路段的好走、不好走不僅是坡度、路面和耗時等原因而已，不好走的路段其實隱藏著路上會有危險的訊息。然而，在這段行走經驗中，我們雖然完全沒有見到 NPA 的身影或是與他們正面交鋒；但是 NPA 位處暗處的存在就足以讓行走者、居民深覺到威脅的緊張感。

那晚吃完飯後，老六拿出他儲存在手機相簿裡的照片給我看，他透過照片敘說著有別於此座山區的「有趣生活」（其實就是軍旅訓練）給我聽。老六即將屆滿菲律賓徵招軍人的 25 歲底線，他相當努力地申請加入國家的特種部隊，因為他認為自己相當熟悉槍支以及複雜的山區地勢。他說，「那時候的訓練真的很難，我以為我會死掉。我沒有真的很想當軍人，只是我需要一份職業，我也想知道軍人是在做什麼的。其實我受訓完已經知道軍人的戰略和他們的想法，所以我才在想如果他們不接受我，我就加入 NPA 反對他們。反正國家不給我職業，我可以加入 NPA。一樣可以打仗。我也有一些朋友在 NPA，他們都是好人。」老六也說到一位他所認識的 NPA，「他原本住在這裡（指上村）。他爸爸被殺了，所以他要加入 NPA。他爸爸去山上時帶了一把槍，你知道他爸爸去做什麼嗎？他爸爸要去殺一隻豬。但是剛好遇到幾位軍人，有個軍人以為他爸爸是 NPA，所以就把他爸爸給殺了！但是他爸爸不是 NPA。他爸爸死掉後，我的朋友就加入 NPA 了。他恨軍人，所以他加入 NPA。可是我朋友很好，他只是想加入 NPA。」NPA 與上村居民之間的界線並非絕對，甚至是交錯的、共生的。

上村的居民們多知道 NPA 的存在與行動特性，而且他們首重避開遇到 NPA 的機會。迪媽說「其實很多 NPA 都住在那裡（指西村的深林），沒事不要去那裡。

我遇到 NPA 就叫他們不要去那裡，因為軍隊可能會去那裡找他們。我遇到軍人就叫他們不要去那裡，因為那裡面有 NPA。我都叫他們不要去。NPA 有槍，你不知道何時他們會戰鬥。以前就曾經有軍隊來殺 NPA，好多軍人衝進山裡面，還有直升機飛來飛去。我很害怕。」迪媽不僅一次說出他害怕在水墾區會有打鬥場景發生，而迪媽的應對方式就是不要進入那片山區。三哥也曾說，「NPA 跟軍隊不會打起來，因為他們彼此都知道對方在那邊。他們會互相讓路，軍隊會繞路或是 NPA 走別的路。他們都很怕死，他們不會打對方。他們有的也認識對方。」NPA 在居民認知當中若敵也似友。居民們與底層的 NPA 們有時彼此參與、有時相互迴避，這都是雙方同為底層者在生存共識下的默契。

2012 年 2 月間，有五位 NPA 成員到上村的藏峰聚落拜訪。據迪媽說，他們分別有一女四男，他們隨身都帶著長槍和無線電。這幾位 NPA 成員是為了遊說居民反對由美商奇蹟公司正如火如荼執行的國際地熱開發案。¹⁰⁹迪爸在上村以領頭羊之姿成為投下反對地熱開發案的第一人，所以 NPA 們首先來拜會迪家。¹¹⁰而迪家也依待客之道請 NPA 在家中用餐並且長聊。迪媽回憶那天說：「NPA 的長槍一枝一枝擺在客廳的牆邊，小孩子來家裡時跑來跑去的，很擔心會傷到他們。我告訴 NPA 他們別往西邊的山林去(也就是別前往 A 聚落旁的山區)，怕有軍隊埋伏在哪裡，會產生衝突！」迪爸說，NPA 只是來確認一下居民對於地熱開發案的立場和考慮選項。

雖然 NPA 得以來此進行遊說，不會被居民舉發，但這並不表示上村居民全都和 NPA 維持互敬的友善關係。上村居民中也有許多人是贊成地熱開發案的，例如花叔。¹¹¹花叔說：「他們(指 NPA)來的時候，我就堅決告訴他們：我去看過地熱開發的廠區，很乾淨、很安全，我相信政府。地熱很安全。我請 NPA 他們讓我們自己決定就好。不要來說會讓人害怕的事。」相當顯見地，花叔與迪家的意見相左，甚至在迪爸與花叔之間對於此議題的談論相當敏感。不過同時，花叔也會去聽取 NPA 舉辦的地熱說明會、迪爸也會參加鎮公所和奇蹟公司合辦的公聽會；由此可知，上村居民們對於地熱開發案的政治立場仍是擺動的。

¹⁰⁹ 我為保護本文中的發言者為我提供的相關訊息，因此文中將以奇蹟公司作為代號稱呼此美商公司。

¹¹⁰ 地熱開發案曾在上村舉辦過調查性的投票，但並不是具有政治效益的公投。

¹¹¹ 花叔曾任多屆地方議會代表，他對於國家的政策相當信任，也對於地方發展有著強烈的開發訴求。

當奇蹟公司已著手進行當地探勘並針對地方官員進行遊說工作的同時，水墾區居民的意見中仍陷膠著，各有一半支持一半反對。且反對方相當有意識地在說明會中提及 NPA 的存在，試圖讓 NPA 作為一股制衡政府、資方的力量。而奇蹟公司以及鎮公所對於水墾區居民也採取防備措施，當他們來水墾區開會時都會知會軍方調度人力前來「維護秩序」；且軍方也會動用無線電波擾亂山區的通訊。老六就說「NPA 用的基地台都會被破壞，所以如果你也是那間公司的手機號碼就會斷掉。我的 sin 卡公司就跟 NPA 的電話公司不一樣，所以我有訊號。NPA 的訊號在奇蹟公司的人離開以後才會恢復。你去問三哥，他的手機可以用了沒？」在這之後，我若看見三哥無奈地把手機關機，就會知道又有外地官員、外國人、資本家來拜訪水墾區了。

我書寫 NPA 的目的在於呈現上村與 NPA 獨特的共存關係；這獨特的共存關係會使得上村與國家、全球政經力量之間產生相對的影響。¹¹²NPA 藏匿於水墾區，一方面是與居民都對國家主權有認同上的斷裂，一方面是 NPA 著實在居民與外部勢力談判時扮演了制衡的角色。對於上村居民而言，他們已經發展出一套與 NPA 共處的方式。就像我所說的步行經驗當中，老六和年輕人們都知道何種情境下可能會影響到夜間的李PA 行動，且他們也能掌握住 NPA 的習性。¹¹³甚至於，現在擔任地方幹事的老六都說：如果未來他沒有工作的話就要加入 NPA 打仗。NPA 與上村居民各自維持著不等長的距離，例如迪爸會讓來拜訪的 NPA 在家用餐，而花叔會指責 NPA 的現身會給上村帶來麻煩，然後迪媽說很怕 NPA。不過整體來說，當 NPA 現身時，上村中並未有人舉發、攻擊或是驅趕 NPA。也就是說，被國家、軍隊形塑為叛亂、危險的反動份子，在上村居民眼中有不同的見解。

從老六的言談中，可見 NPA 與居民之間有著隱隱約約的關連，例如上村中曾有人加入 NPA、居民當中有人與 NPA 交好。若是上村突發地需要 NPA 協助、現身時(例如地熱案要強勢過關的話)，上村就會透過在地的人脈去通知 NPA。上村居民為了維持集體安全，所以不會與 NPA 發生衝突或是直接地反對他們。同時地，上村與 NPA 之間幽微、曖昧的共生關係正是讓軍隊、地方政府(鎮公所)感到困擾之處。於是對於他們而言，最為簡單的方法就是：假設上村與 NPA 為

¹¹² NPA 背後連結的是菲律賓共產黨勢力。

¹¹³ 那一晚的夜行經驗，若沒有老六和年輕人們，於我看來，都只是一片黑矇矇的夜色而已。

結盟關係。也因為這個假設，上村才有一個夾擠的空間，讓上村居民能在兩股勢力裡進行「日常政治游擊戰」。

(二)、「他們都是騙子」—國家、資方與地熱案



左圖 3-4、右圖 3-5：與民眾一同搭乘 Jeepney 抵達水墾區的揹長槍與彈藥的軍人們。

2012 年春天，就在 NPA 造訪上村後不久，軍人們也隨後抵達水墾區。圖 3-4 是一台剛從市區開回水墾區的 Jeepney，剛從 Tabuk 市回來的我和迪家家人都在這台車上。與我們共乘這部車的數位軍人是剛被調派來此進行「友善社區」、「為民服務」的工作隊伍。雖說軍人們都坐在 Jeepney 車頂上，但是共車的乘客和走在他們身旁的居民仍能感受到軍人們全副武裝所散發出的壓迫感。¹¹⁴事實上，居民們都議論紛紛著軍人們是為了 NPA、地熱案還有四月要辦的 Cordillera Day 才來此地的。

「地熱究竟是什麼？(What's geothermal?)」居民們常常這樣問。「台灣有地熱嗎？你看過地熱工廠嗎？」迪媽在我詢問相關地熱消息時反問我。由於菲律賓是全世界第二大富含地熱國家，因此自美國殖民時期便不斷地企圖開掘菲律賓的地熱產業，而水墾區也早 1990 年代便被官方證實有豐富的地熱資源(geothermal energy resources)。在水墾區開掘的地熱開發案是由美商奇蹟公司與菲律賓政府之間於 1990 年代所簽訂的國際合作案，在奇蹟公司與官方合作之前，另有 S 公司提出此合作案。¹¹⁵不過當時 S 公司派遣至水墾區的代表人員在一場協商會過後被暗殺了，因此 S 公司召回此合作案的工作小組，並從此退出此合作案。而奇蹟公

¹¹⁴因為軍人們全都揹帶著長槍、彈藥和作戰配備。

¹¹⁵ S 公司同樣也是以代號稱呼之。

司已是第二家為了開發地熱而來的美商公司。花叔說，他於 2010 年時曾至首都馬尼拉參觀過當地的地熱運轉場區，他覺得廠區很乾淨也很安全，並不會造成任何危險。花叔表達出他對於地熱開發案的停滯現況感到可惜，他說「既然水墾區含有此項開發條件，而且居民沒有能力自行開發這項能源，就應該交由政府與外商公司來協助當地進行開發。我知道這地方有很多人『不願意改變』，只想享受成果卻不願意耕耘，也不願意變得更加『現代』(modern)；也有一些人擔心文化會流失。」此段談話中，花叔將「地熱開發」與「現代」劃上正向關聯，認為地熱開發後所帶來的「前景」才是上村得以新生的好機會。

根據劉芝田於 1969 年對於 Kalinga 地區的調查文獻中也記錄到一則開發案。其中寫道：Araneta Concession 擬定開發 Kalinga 的礦、林業，且政府也已發放開發許可。不過當開採工作正式進行後，卻又受到當地居民的大力反彈。居民反對原因是：第一、Kalinga 的土地、農林、礦產是屬於當地人所有的，不得讓外人侵占。第二，倘若該公司進行砍伐，會影響當地的氣候，減少雨量就會直接威脅當地農業。第三，除了耕種外，他們也有屬於自己的獵場，開發森林等於失去其一的生計方式，且當地樹種會消失甚多。當 Araneta Concession 堅持執行時，立即引燃當地居民的憤怒。該地男子全數動員，手持刀矛、檣牌等將其團隊包圍，並且要求全數不得動工，否則將以族鬥視之(Tribal War)。¹¹⁶開發方雖有軍隊的武力保護，但他們最後仍無功而返。¹¹⁷

從水墾區的地熱開發案、Cordillera Day 的緣起(開發水庫)以及劉芝田所指出的開發事例中可以發現，Kalinga 地區由於藏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所以從過去到現在陸續有不同的資本商意圖在此進行生態開發。而菲律賓政府在多次的開發案中都扮演著資本商的共謀者。菲律賓政府認為無人登記的山林就歸屬為國家的資產，國家自然資源的保護、開發、使用的決定權是官方的權力。在地熱案的公聽會中，政府官員們會對居民們強調：我們同為「菲律賓人」，應該將土地、林地讓渡給國家來做開發，應該以「集體利益」作為考量。¹¹⁸當官方以集體利益試圖含納上村全體居民的同時，忽略居民內部的異質性。以及官方所認定「集體」當中，是存在著先後、多寡群體權益的差異。

¹¹⁶ 「族鬥」就是指會進行獵頭儀式的意思。

¹¹⁷ 即便 Araneta Concession 事後有請國會議員出面協商但仍破局，由此可見當地居民的反對的堅定意志。

¹¹⁸ 此為迪爸所描述的公聽會內容。

上村的地熱開發案在居民的日常言談間並不熱切，原因在於居民們對於此案所獲得的消息內容並不均勻。這可從地熱開發案的說明會舉行過程中窺探一二；2012 年的三至四月間，由鎮公所所發起的地熱開發說明會邀請多位水墾區居民參加，地點在鎮上。受邀參與說明會的人多是村長、地方官員與幹事、男性耆老(意見領袖)等；¹¹⁹這些人會在下村集合並搭乘專車前往鎮上開會，在鎮公所提供的場地與奇蹟公司的工程師、職員交流與問答。據花叔說，奇蹟公司在此地布局地熱開發工作已長達十多年之久，不過他第一次收到召開地熱開發案說明會的信件是在 2009 年的七月。奇蹟公司與鎮公所也曾在 2011 年八月於下村舉辦公開的說明會，不過並非所有居民都受邀參加，因此地熱開發的詳情指有少數人知道。這看似勢在必行的開發案，事實上進度緩宕不已。

迪家老六因為身為上村的地方官員之一，因此與身為地方意見領袖的迪爸經常受邀一同出席地熱案的說明會。老六針對他參加多場的說明會經驗表達出，「每次開會都會有很多好吃的食物，每次去都只是為了和外國女生一起吃飯(大聲笑)。...其實，奇蹟公司跟地方政府在等的是『安全』，聚落的安全跟人民的安全；所以才花十幾年的時間跟居民溝通，他們也不排除要找國家軍隊和尋求國際協助來維持地區和平。實際上，村長、官員大家都已經簽同意書了，也都收了錢。現在就只差居民的意見而已。」而老六所說的「居民」意見，在我看來不僅是單純地指射當地居民，還有隱匿在水墾區的 NPA 以及遠端的反政府組織。也可以說是，奇蹟公司和政府在某種程度上把居民和 NPA、NGO 的反對意見歸為同類，並視之為相連的反對陣線。

迪爸說，2011 年時就有從 Tabuk 市來的 NGO 成員到水墾區來解說何為地熱。而 NGO 當時提出的反對論點為，第一、地熱開發會破壞當地地景，萬一地熱開發失敗了，原先仰賴山區資源過活的居民們就會失去自己的土地以及財產。第二、地熱是屬於水墾區居民的財產，為何要讓外商公司來此奪取資源並賺走大把的錢財。除此之外，持反對意見的居民們也說出擔憂，他們擔心地熱開發是否會造成山崩，例如像是日本地熱開發經驗中造成原耕地者失去土地的后遺症。以及居民也擔心對於健康造成的影響，居民說曾聽聞在首都馬尼拉有一個地方因為地熱開發導致的礦物汙染，使得全部的居民們必須服藥一生的問題產生。自從

¹¹⁹ 在各次說明會中，迪爸、花叔、史叔都受到活動邀請；受邀原因分別因為他們的身分是，非政府組織領袖、前村長、前教會幹事等。他們除了曾經擔任過這些職務外，也在每次的聚落會議中扮演核心決策者的重要角色。

NGO 來此進行說明會之後，便一直都有 NPA 在水墾區駐守與觀察事件的走向。而奇蹟公司也不斷地釋放出有利於地方發展的條件尋求支持，地方政府為保護奇蹟公司的人員安全以及平衡山區的權力關係，地方政府也派遣了約 40 名軍人進駐水墾區。

奇蹟公司與地方政府在等待的安全時機，其實決定的關鍵在於居民和 NGO、NPA 所共構出的態度與行動。如此一來，居民在奇蹟公司與地方政府以及 NGO 與 NPA 之間，爭取到思考開發案的緩衝空間，居民也可以再進行條件上的協商。奇蹟公司所釋放出的條件相當全面，包括有提供地方發展資金(各聚落平均可得 15 萬披索)、學生獎助學金、電腦與發電機設備、外地參訪、農用機械以及免費的電力輸送保證等。例如像是奇蹟公司承諾為西村負擔申請電力的所需費用，也就是說各家戶免去一千多披索的申請費用，就可以得到電力設備的安裝。另外，奇蹟公司所承諾的藍圖還包括，未來地熱開發案運作之後，提供全水墾區全天候的免費電力供給，也會在 2020 年在鄰近地區興建 Awichun 機場，大量改善當地交通問題。對於這些種種的利多消息，迪媽維持其一貫的「中立」立場說道，「我是尊重政府和 NGO 的意見啦，不過政府是騙子，騙大家會提供免費的電可以用，可是誰知道最後會怎樣。」上村居民針對地熱案開過一次的聚落會議，迪媽引述當時聚落內唯一的澳洲新住民—Kin¹²⁰的意見說，「雖然地熱現階段看起來沒有問題，可是或許十年之後會造成火山爆發或是危險。如果會火山爆發的話，那我們當然不要阿，可是政府都沒有說，萬一爆發我們就死定了。你知道其實水墾區附近有火山嗎？雖然火山睡很久，可是我們又不知道火山下面發生什麼事。」迪媽引用 Kin 的談話並且相信他的論點，所以他也深深地認為迪爸持反對開發意見是相當正確的選擇。

除了迪家與花叔之外，我也以地熱開發為話題加入了少女們的談話之中。在某天放學之後的傍晚時分，我和 Ray(18 歲，中學畢業生)、Ivy(19 歲，大學生)兩位姊妹在餐桌邊談及地熱，Ray 如此說，「我只知道奇蹟公司說會提供 24 小時的電，也會在廠區裡保留百分之 80 的工作名額給水墾區的人。可是...那是地熱耶，我們能做什麼？」仍在 Tabuk 市讀大學的 Ivy 也說，「說不定他們提供的工作就是打掃阿、做危險的工作阿。像礦工那樣。24 小時的電有甚麼好？如果必須拿我們的健康去換，就不要，我們要原本屬於我們的田，還有環境。而且我們

¹²⁰ Kin 是上村中目前唯一在當地置產、購屋的澳洲籍居民，50 歲，曾為神父。

也不需要 24 小時的電。白天不需要電！」我繼續追問說，「可是奇蹟公司還說會擴大交通建設還有發獎學金！」兩姊妹笑嘻嘻地應答，「獎學金我們也可以跟外國的傳道士申請，或是你贊助我們。那如果是交通的話，就是說我們可以搭 Taxi 嗎？叻呼，我要搭 Taxi 去 Tabuk(笑)。也可以看到飛機，對嗎？坐 Taxi 去看飛機嗎？」

在訪談中，我可清晰感受到相信官方和奇蹟公司承諾的居民為少數，他們多仍持觀望的態度在看待此事的發展。不過，「政府是騙子」似乎是聚落居民之間的共識，因此居民們也不吝與政府單位相鬥智、耍賴，以取得對居民自身最有利的協商、斡旋位置。政府派遣軍隊來此的用意相同於 Peace(1993)指出官僚政治控管地方的政治技巧為「現代控制的表演」，Peace 認為現代國家控管地方透過一套表演機制，由其是對於地方的資源管理議題。國家首先設立特定機制作為友善的包裝，在上村的友善機制即是安裝電力、發電機、給地方官員開發資金等。Peace 指出這只是政府和資方的表演，他們有相當多的公開會議，但更重要地是不為人知的私下對話；且他們擅於創造說服居民的理性論述。如此一來，反方的形象易被塑造為失序、反進步的一方。在 Kalinga 過去的歷史中，他們即被這反覆的操作手法塑造為野蠻的一方；而這也就成為政府派遣軍隊來上村的理由。

在第一節當中，我說明了兩大存在於上村的對峙勢力。這兩股勢力並非在地熱案才開始較勁，他們對於水墾區的影響淵遠流長。甚至於水墾區、上村的電力發展歷程都與這兩大勢力的政治斡旋以及對山區自然資源的企圖有所關聯。在第二節中，我將回溯電力的歷史事件，以及兩股勢力在電力發展過程中所帶入的影響。

第二節、在電力之前

(一)、被擊倒的電塔

首先，根據李異平(2000)針對菲律賓電信業的研究指出，菲律賓的電信產業多在美國殖民時期建立的，且主要的資金來源皆為美方。美方在菲律賓建設電信產業的原因不在於提升菲律賓的國家建設基礎，而是為了提升在菲律賓投資的跨國企業能更有效率的提升產業獲利。由其是在 Marcos 獨裁當權時期更是依附美國的投資來發展國內電信業。¹²¹然而事實上，這些投資都只集中在金融中心、首

¹²¹ Ferdinand Marcos 任菲律賓第七至第十任總統，任期為 1965-1986 年。(一任 6 年)

都和經濟特區，獲利者多為跨國企業、富人和政治人物。如此一來，造就菲律賓民眾撥打國際電話比打國內電話還要便宜的窘境。由此可知，菲律賓的基礎建設、政策制定與資源分配等都被國際市場利益所犧牲。電信業的畸變壟斷排除了底層的農工業發展空間，且社會貧富斷痕愈難以修復。

除了國外資金的傾斜挹注外，菲律賓的電力能源長久以來也存在著供不應求的困境。1980 年代，菲律賓呂宋島曾發生過全面性的電力供應危機，當時不少原先全天候供電的城鄉地區每日停電超過 12 到 14 小時，此次失電危機導致菲律賓在經貿上的重大損失。隨著 1992 年菲律賓 Fidel Valdez Ramos 總統上任後，¹²² 他認為菲律賓國內各項基礎建設不足使得經濟成長產生瓶頸，因此他致力於推動公路、港口、航空運輸與電力等現代工程的落實與完工。另外，他也將社會基礎建設與能源部門建設視為菲國政府實現現代化的重要入場卷(趙江林、孟東梅 2005:55)。Ramos 總統為此成立了能源部，目的是加強國內能源的使用管理。2001 年 1 月，菲律賓政府實行電力產業改革法(Electric Power Industry Reform Act, EPIRA)，將電力部門自由化且國家電力私有化(許峻賓 2012:28-30)。在此政策的執行之下，菲律賓全面開放其電力投資市場，美國的能源跨國企業因著與菲國政府長久以來的政經友好關係而搶先占領了開發機會，其它的投資國家有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和韓國等。其中，菲律賓國家電力公司(National Power Corporation)在自由化後轉為官股、民股共構的經營模式；而國家電力公司也為了擴張其經營版圖以及推動「國家發展」，遂而逐漸地將電力所及範圍蔓延到諸多的無電地帶、島嶼與山區。而上村的電力來源便是在一連串的脈絡下所搭建完成。

談及水墾區居民與電力的連結起端，必須回溯到 1980 年代設於 Batong-Buhay 的一座電塔。¹²³ Batong-Buhay 距離水墾區約莫步行三小時的距離，除了山路之外也可以沿著 Lubuagan-Pasil 公路(柏油路)前往。由於此地盛產金礦的緣故，在美國、日本殖民時期便在此地開辦礦產開發事業。¹²⁴即便在菲律賓獨立之後，過去的殖民國仍以投資者的身分在此噬食礦業。對於水墾區 40 歲以上的居民來說，當時的 Batong-Buhay 一地可謂是閃爍光芒且令人心生嚮往的聚寶盆。

¹²² Fidel Valdez Ramos 為菲律賓第十二任總統，任職期間為 1992-1998 年。

¹²³ Kalinga 語的「Batong-Buhay」所指的是「石頭的生命」。

¹²⁴ 此地的金礦於 1932 年(美國殖民時期)被美國的探勘者發現，於此之後便陸續引入各式技術進行挖掘，而礦場的開挖權也隨著戰事輾轉移交。資料來源：The Philippines Natural Resource Company，網址：http://www.benguetcorp.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82&Itemid=90 (2012/10/23)。

設立於 Batong-Buhay 的電塔是為了供應礦場開挖所需，電力所及之處不含括礦產經營範圍之外。當時曾到 Batong-Buhay 工作過的中壯一輩居民都對此地資產的富饒印象深刻；礦場內的機具起降運作不歇，沿著礦場周圍所發展出的相關經濟活動也趁機興起。迪爸和花叔都是經歷這段歷史興衰的見證者。迪爸說：「以前我專門賣鐵刀。我年輕的時候就去 Batong-Buhay、Tinglayun、Pasil 等地賣刀，走好幾天好幾夜。¹²⁵以前我們這裡是做鐵刀的地方，專門生產的，當時的男生都是作鐵刀的。我收集村裡面的刀子，背去 Batong-Buhay 賣，那裏的人比較多，有錢。我賣很多東西給那裏的人，我也有做過保全，礦場的保全，因為我很高。我下班的時候還跟別人玩撲克牌，你看我很會玩撲克牌，因為我們用撲克牌賺錢啊！」當年從馬尼拉、碧瑤等大城市來 Batong-Buhay 淘金的外地人很多，因此水墾區的居民也都紛紛前往 Batong-Buhay 探尋工作機會；倘若無法取得礦場工作的居民也能從礦場所延伸出的各式需求中尋求工作出路，例如當司機、保全、翻譯、煮飯等工作。而在此工作的人，也或多或少都累積些電力設備、現代工程的使用經驗，例如電燈、電熱水瓶、電話和電報等。



圖 3-6：圖片為水墾區與 Batong-Buhay 連結的山路以及 Pasil 河流。河道邊的石頭呈黃色便是因為硫礦所致。前往 Batong-Buhay 的工作者們沿著此段山路往西走就會抵達。

Batong-Buhay 的電塔僅供應整個礦區生產現場所需。花叔說當時有人提議要牽一條電線到水墾區，不過就在電線尚未成功牽至水墾區時，電塔就在 1985 年某天的夜間被 NPA 結合部分民眾一起擊倒。花叔說，「當時大家反對任何開發，NPA 說礦場是資本家，那些人賺我們的錢、拿我們的金子。山是我們的，金子也是我們的，為什麼要給外國人、外地人賺走。所以就把電塔打倒，當時有點混亂，礦場幾乎就關閉了。外地人都跑走了。只剩下一些私人的(礦坑)有在挖。其

¹²⁵ 迪爸所敘的地名皆在 Kalinga 省內，為 Lubuagan 鎮鄰近的地區。

實都是 NPA 主要在反對。可是我們也不敢說不要打倒阿。不然你看打倒了我們就沒工作了。」而迪爸對於此事只幽幽地說，「那時候有電的地方都很危險，有電會被攻擊。」NPA 除了以反對資本家入侵為由之外，也以礦場鄰近火山活動地帶將會危害山區安全此理由加以反對礦場與電力的在地營運。此論點對於各地(水壑區)後續的電力發展產生影響。「反對任何開發」、「有電危險」成為一股風氣瀰漫在各地之間。電力的危險，也包含著居民相信資本家過量的開發對於當地生態有所危害。

花叔說當時的氣氛很詭譎，尤其是 NPA 的強大武力讓政府、居民和資本家都不敢輕舉妄動，因此礦場幾乎停工並且原債權人也將礦場開挖權轉讓給菲律賓國家單位。在這個事件當中，Batong-Buhay 所象徵的是一股外來開發力量在當地的介入。¹²⁶這股外來力量帶走山區的資產(礦產)卻享受電力使用、便利生活的特權；而且他們消費當地的資源、帶走生產利益以及女性的情感¹²⁷。因此，NPA 和當地居民所打倒的不僅是一座標的物，更是反對他們強烈體悟到的被掠奪感。而電力、開發與被掠奪感在這一系列的行動中被串連在一起。在這之後，水壑區便長達 20 多年沒有任何電力引進計畫。

1980 年代除了 Batong-Buhay 之外，當時仍為省中心的 Lubuagan 鎮也有一條可供居民付費使用的電話線。由於 Lubuagan 是國家的地方政府所在處，因此有短暫的電力可供應。不過，因為 Lubuagan 有警察局駐守，所以並沒有攻擊事件發生。居民們回憶當時撥打一分鐘的國內電話就要價 15 披索，對於在 1980 年代平均時薪僅有 8 披索的工人、居民們而言：打電話是一件相當昂貴的消費。居民所用的比喻為：「如果不是打電話去馬尼拉，寧願用走路去。」意思是說，如果要花費 15 披索就必須打電話到他們認為距離最為遙遠的馬尼拉(超過 300 公里以上)，其餘的地方都寧願親自去傳達訊息。山區居民之間的訊息傳遞仍倚仗腳力與口述傳送，年輕體壯的男性就像是一條又一條的人體電話線。

總地來說，這一節主要說明水壑區上村在電力還沒安裝以前所發生的政治事件。一方面，國家電力的政策就已經將地區分類為中心與邊緣，將電力留給重點

¹²⁶ 其開挖技術和工程人員多從大城市、美國等地來此。

¹²⁷ 在水壑區有幾位婦女與外地的淘金客生下孩子，這些孩子目前大約都已經 30 歲以上並已經育養下一代。例如，上村 18 歲的 Ray 就曾說自己的母親就是祖母與從馬尼拉來的淘金客所生下的孩子。Ray 的媽媽直到 2010 年才到馬尼拉與親生父親相認，Ray 和其姊弟也都陪同媽媽前往。Ray 說，「就是因為來淘金的祖父當年很帥，所以祖母才會愛上他的。雖然我祖父已經很老了，但他還是記得我祖母的樣子，所以當他看見我媽媽時就說我媽媽跟祖母一樣漂亮。」

開發地區使用。一方面，Baton-buhay 的電塔擊倒事件對於整個水墾區鄰近地區的電力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因為當時的電力主要供應給金礦場裡的外地資本家、國家機構使用；而 NPA 與居民的反對開發運動連帶地把電力與此運動作連結。連結點在於，金礦場長年以來獨占電力使用的權力，而金礦場的目的在於運出山區的資源；也就是說，握有電力使用特權的人是侵占山區資源的人，而侵占者就是導致山區生態有危險可能的人。對於水墾區的人來說，「電力」就與「危險」產生了關連。

(二)、地熱與電力

上一節中，我解釋了電力延遲發展的原因；接下來，我要描述在電力上未來到上村前，居民們所累積的電力使用經驗。

無電時期，村落的夜間照明依家戶經濟能力分別選擇使用煤油燈、煤油蠟燭、火炬等，村落裡也有裝電池的手電筒可用。倘若村落居民要接收廣播消息則透過收音機和手電筒的接線，取得電池電力方可使用。然而，在電力來前的照明設備也並非全面普及。村落裡使用煤油燈的地方僅限於經濟能力較好的家戶，因為煤油燈的耗費並非是各家皆可負擔的；有時是訪客到訪時才會使用煤油。此地煤油的獲取必須從外地的城市運到本地的城中，再由各路商人到城中批回到山區販賣。較為節省的家戶會選擇使用消耗量較小的煤油蠟燭。¹²⁸



左圖 3-7：上村尚未完成電力架設前，夜間使用煤油燈照明的場景。¹²⁹

¹²⁸ 煤油蠟燭的形式各異，有的是把煤油裝入玻璃瓶中，放入一條燃芯之後使用。或是把煤油倒在瓶蓋上燃燒使用。

¹²⁹ 此照片感謝 2010 年的台灣東華大學海外志工隊拍攝提供。

右圖 3-8：2011 年，迪家的天花板並置煤油燈跟電燈。

雖然上村的電力架設晚進，但上村居民因著性別、生長經驗、工作經歷等緣故，對於電力使用所累積的經驗不均等。經常往來各地之間從事買賣、換工的男性們有許多電力使用的經驗可談。例如花叔說：「一開始去 Tabuk 參加 NGO 辦的農業培訓課程，我看見別人有熱咖啡喝，但我只有喝到一杯一杯的水。後來，我觀察那個拿咖啡的人，發現電熱水瓶可以壓出熱水，然後就可以泡雀巢(Nestle coffee)。我還去罵那個知道泡咖啡的人怎麼都不跟我說，害我喝好幾天的白開水。」花叔還說他在回到村裡時，就把這個經驗轉為玩笑話跟他老婆說，說完又跟鄰居說一次。花叔就依他使用電熱水瓶的經驗夾帶他在低地所獲知的種種訊息。

另外，上村居民會到各地換工、打工、謀職，因此居民們和電力產品的遭逢也在各地發生和互動。例如婦女們之間也會討論洗衣機的使用。曾經到過 Baguio 市讀書、打工的 Kate(女性，30 歲，下村的雜貨店老闆)如此描述他使用洗衣機的經驗，「雖然我看得懂英文，可是洗衣機在用的時候要先加水還是洗衣粉？我不知道。我也提水倒進去洗衣機裡面，結果按 start 之後，洗衣機開始流水進去。可是我已經倒滿水了。然後我就清理不完那些滿出來的水了。這樣反而洗很慢，我喜歡在這裡(村裡)洗衣服可以全部泡在河裡，順便洗澡。」坐在一旁約莫 50 歲的婦女便打量著我說，「你一定不會洗衣服。你都請人家來幫你洗衣服的。你都用洗衣機洗衣服，所以你不會洗衣服。如果你們甚麼都用機器的話，那有洗澡的機器嗎？不用自己洗澡的機器。」¹³⁰電力的使用經驗多與機械相連結，因此居民間聊及電力的使用經驗時，多是以該項電子產品作為談論的主體。因此，電力經驗都是被包覆在更為實質可見的機械、物品使用經驗當中的。

在電力來到村落之前，居民的電力使用經驗和對產品的高度掌握還可以透過使用手機的現象窺見。前文提過早期在 Lubuagan 鎮有一條供付費使用的電話線，也就是有線電話。有線電話的特性在於其空間可被掌握，且確定撥通之後就可傳達訊息或是透過中介者傳達。而無線電話和手機的特性在於空間可自由移動，且掌握即時的消息。然而在上村裡的手機則是空間無法被掌握且無法即時發

¹³⁰ 當我在上村的公用水龍頭下洗衣服時，都會吸引路過的人看一眼。我經常被居民和迪家成員指證如何用手搓衣服，以及如何浸泡衣服。透過洗衣服的反覆手作，讓作為研究者的我與居民之間轉換了關係與位置，讓我成為了不在上位者的學習者。如此一來，我與居民之間的關係就透過一起洗衣服而形成較靠近的關係。

送訊息的通訊設備。¹³¹在無電時期，為手機充電、儲值是一件耗費腳程的事，必須到鎮上的雜貨店、親戚家等。在上村使用手機的最後步驟是需要天氣配合。倘若村裡天候不佳或是風速過大時就無法順利地用手机聯絡。另一方面，手機使用者也要懂得當地地勢才可以，因為在村裡僅有某些地點才能收到基地台的訊號。¹³²在此情況下，手機的通訊反造成了即時訊息傳遞的藩籬和障礙，使得溝通的有效性降低。因此多數人仍慣用口傳、面對面等方式以確保訊息接收。由上述的例子中可以得知，居民與電力產品的遭逢比起電力來得更早。

自 Batong-Buhay 的電塔被擊倒到 2010 年由居民主動地申請安裝電力。20 多年的時間中，居民從反對、漠視電力轉為自主性地申請電力設備。在這過程當中，居民對於電力的想法是否改變了？2009 年，上村和下村居民花費整年時間作為電力設置的申請作業期，在此之前，他們也為了是否集體安裝已討論了一年。也就是說，前前後後花是討論到安裝完成就花了兩年時間。然而迪爸說明當時的討論重點在於：「電力安不安全？」我向迪爸詢問地熱開發案的反對原因時，他透過比較地熱和電力答道「地熱我們知道的不多，而且政府和奇蹟公司把它說得很好，可是事情不會只有好的，沒有不好的。NGO 跟我們說日本的例子，就有地熱開發失敗了。整個山和田都破壞了，那對我們不好。像電就沒關係，電不會危害我們，沒有壞處。我們要裝電之前就討論過，我們要電，因為不危險(Not dangerous)。」

在迪爸的談話中可以發現，電力和地熱的比較會凸顯出安全和危險的差異，此差異的著重在於生態、地景與財產上的破壞程度。居民們比較出，電力是無害、安全的，地熱是高風險的、具侵害性的。居民一開始排斥電力的原因在於，電力不屬個人擁有，它屬於資方、官方的開發工具，他們惟恐電力的到來會傷害居民的生計。但當電力逐漸普及到各地之後，居民認為水墾區也需要電力，但此時他們卻反而被剝奪使用電力的權力。當他們提出電力申請的時候，他們被高門檻的費用拒絕在外，被電力維修機制排除在外，被便利的通訊網排除在外。這些舉證我在第四章會再說明。

¹³¹ 在上村落使用手機，首先必須先買得到手機；菲律賓的手機價位從 100 披索到幾千披索不等，不管是新機或是二手手機對於高地多數人而言是個高消費的產品；且購買手機還必須到城裡購得。

¹³² 倘若見到多支手機集體掛在木樁上、樹上或是屋簷下，就表示是手機通訊較為清晰的定點。另外，手機的使用通常也表現出個人對於產品的掌握程度。因為在使用手機時，使用者不僅要熟諳此電子產品的功能，也必須要慣用手机內建的語言，再來還必須要有可相互通訊與連繫的友人。當以上條件都一一成立之後，手機的使用才具有必要性與意義。

總地來說，在電力和地熱的比較討論中，電力從危險變成安全了。例如，電力的架設並不會掠奪到當地居民的財產，但是地熱會。當居民們討論電力是否安全的同時，也就表示他們正在進行電力的風險討論。Douglas 和 Wildavsky 曾指出「對於風險的感知是一段社會過程；所有的社會皆仰賴著信任和恐懼的整合。」
「承擔風險和規避風險所共同有的信任和恐懼，是如何以最佳方式組織社會關係中對話的一部分。」(1982:6-8)¹³³也就是說透過電力安裝的風險評估過程，便可以得知上村的人是如何認知電力的。在居民闡述電力時常說，「因為電沒有害(harmless)。」
「我們只是需要電來照明，晚上有電就可以了。」迪爸也曾解釋：「電不會讓我們有危險，裝電也只是為了要有燈可以用。如果不用燈的話，我們也不需要電。」

從上述可發現，居民一再強調電力的特性為無害和照明用。電力除了照明也可以讓居民使用電視、音響來增加額外的生活樂趣；且電力並未交換或是威脅到上村的資源運用。而地熱會改變當地的生計、山林，牽涉的層面遠大於電力所會帶來的影響。另外，上下村也無須透過國家補助、奇蹟公司協助就可以自行申請安裝。對於上村而言，電力的無害來自於並未破壞原本生計模式的安全。然而，我倒認為這層「無害」尚待檢驗，由於上村尚未全面 24 小時供電，而鎮公所以即奇蹟公司正合力著手建設屬於水墾區的電塔，以利日後 24 小時供電。一旦水墾區接收這份「善意」後，電力可能又會變成一條政治交換條件。

第三節、小結

(一)、多重的政治勢力

因著「服務民眾計畫」來到上村的十幾名軍人們一待就是一個多月。軍人多紮營在聚落的外圍位置，或是幾棟水泥房屋的屋樑下。¹³⁴軍人們會趁我獨自去拜訪家戶時跟我搭話聊天，也會趁我在迪家雜貨店打雜時探聽我的日間行程。一開始，我毫無戒心地和軍人們往來，甚至還覺得可以透過軍人得到不同於當地居民的一些訪談內容是件好事。直到迪爸有天面色凝重地跟我說，「別讓軍人們知道你的真實姓名以及來這裡的目的，也別讓他們知道你的行程。軍人們來，是因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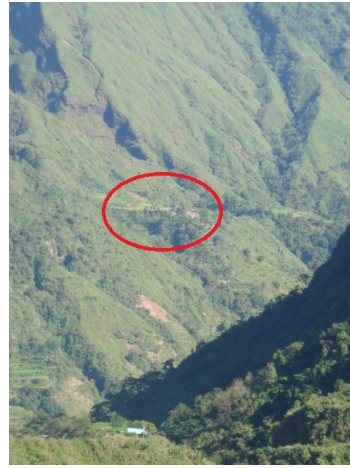
¹³³ 原文為：The perception of risk is a social process. All society depends on combinations of confidence and fear)(Risk taking and risk aversion, shared confidence and share fear, are part of the dialogue on how best to organize social relations.

¹³⁴ 聚落裡有幾戶人家的兒子也從軍，因此這幾戶居民多會招待軍人們到他們的家中用餐；不過軍人們多以自己煮食為主，缺食時才向居民購買。他們夜間多睡在戶外的睡袋中，除非兩天才會向居民借宿。

最近有 NPA 在這附近，又有一些外國人來找地熱，所以軍人們是來觀察 (observe)、看管 (watch) 我們的。你是外國人，他們會懷疑你在這個偏遠山上的目的。還有，NPA 是支持共產主義的，有人在說中國政府私下支持 NPA。對軍人來說，他們分不清楚你到底是哪國人，台灣人還是中國人。或許他們會以為你是中國人，以為你是為了國家要調查資料才來的。所以你要學會騙他們，因為你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在騙你。」除此之外，我就住在身為非政府組織領袖的迪爸家中，這些條件都讓軍方有理由懷疑我來此的動機。我也才明白原來上村居民對於官方所展現的不信任不單是說而已，他們在行動上也展現出對官方的防備。

然而，我在上村對於軍人和 NPA 的觀察，讓我體悟到底層成員的異質、複數性與國家治理視角中所認知的軍隊和 NPA 特質不完全地相同。而且底層的軍人、NPA 成員分別都與上村居民產生共生關係。居民與 NPA 之間的關係，就如同潘婉明描述馬來亞共產黨當中的女性成為馬共，是為了避免威脅、成就愛情以及擺脫貧困的一種生存策略；成為馬共更是一種生活方式的可能。因此可見，在底層的革命運動中，存在著多樣的策略性選擇(2012:43-44)。同理，NPA 的成員以及支持 NPA 的居民並不表示支持共產主義的思想，那是屬於高層領導者們的見解。底層的參與者所在乎的，不外乎是自身生存與生活延續的方法。

「這是菲律賓的冷戰！」花叔說。「菲律賓人民需要 NPA！」迪家三哥說。上村同時與軍隊、NPA 之間維持友好關係，從中斡旋、但也被兩邊勢力夾擠。上村居民並未支持政府決策而反對 NPA 的存在，也不因為支持 NPA 的理念就反抗官方政策；他們並不仰賴、信任這兩股勢力。我感受到上村的冷氛圍除了瀰漫在官方與 NPA 之間，也存在於上村日常微政治中、各家族間間微妙的不信任關係，例如迪爸、花叔在地熱開發意見中的冷對應關係。山區的軍、民之間冷對抗也可在 Cordillera Day 的舉辦中看出。四月底在我離開上村前，我一直跟迪爸商量參加 Cordillera Day 的可能性；不過我一直遭受居民們的阻止。迪爸說「今年我都還沒收到 Cordillera Day 的邀請信，每年的四月初應該就會收到的才對。今年可能還沒決定在哪裡舉辦。」花叔說「你會去參加 Cordillera Day 嗎？今年的 Cordillera Day 各省各自辦自己的，每個省有一個自己的 Cordillera Day。你可能要問問看你爸爸今年最大的是辦在哪裡。你去的話就會知道 NPA 的目的。」老六說「你不能去 Cordillera Day，因為軍人已經在這裡(指上村)看過你。你去的話他們會知道你是誰，他們會以為你是跟 NPA 一夥的。很危險！」



左上圖 3-9：站在上村可見 2012 年 Cordillera Day 的會場在紅圈所指之處。

右上圖 3-10：Y 地無法搭乘 Jeepney 直接抵達，需步行進入。

左下圖 3-11：Lubuagan 鎮上的警察，揹負長槍在鎮上巡邏的樣子。¹³⁵

右下圖 3-12：上村年輕男子與來訪的軍人合影。此圖可看見軍人的武力裝備。¹³⁶

2012 年 Kalinga 省的 Cordillera Day 辦在 Y 地，那是一個站在上村高處就可以看見的山腰平地處。¹³⁷不過因為它位在上村的對面山脈，從上村到 Y 地大約要一整天的時間。迪媽說他自己不想去 Cordillera Day，因為 Cordillera Day 期間會有很多軍隊進駐，且過去也曾聽聞有衝突和死傷。花叔也說他只想去參加大規模的、比較正式的 Cordillera Day，若主辦單位能請總統來更好。但事實上，近年來 Cordillera Day 趨向於舉辦在地、小規模的集會型態，而非是大區域性的。老六說，他曾經參加過幾年的 Cordillera Day，每次參與時他都會很直覺地認為這些外國人、菲律賓人是來聲援 NPA 跟 NGO 的。老六說，「每年都會有很多

¹³⁵ 距離上村最近的的警察局位在 Lubuagan 鎮上，由於警察的人數不多，因此警察通常只待在鎮上。警察與上村之間的互動較少，且警察多作為聯繫、通報的角色。軍人才是上村較常遇見的國家公權力執行者。

¹³⁶ 為保護當事人，照片採模糊處理。

¹³⁷ 由於此地與上村的相對位置頗為明確，所以以匿名稱之。

Jeepney 為了 Cordillera Day 集合起來載參與者去會場。可能有好幾千輛的 Jeepney。但是，軍隊會在每條通往會場的路上做盤查，還會設很多檢查哨延遲車輛的抵達。軍方也會在道路上灑滿釘子，目的是要刮破 Jeepney 的輪胎。但是參加者和 Jeepney 司機也都知道這件事，他們就準備超級多的輪胎在車子裡面，破掉就換、破掉就換。NGO 也會買很多輪胎發給各台車。政府會用很多方法阻擋，NGO 也會很聰明的反應。不會真的打起來，可是就像在比賽一樣。」Cordillera Day 就是政府與反政府勢力相互競賽的政治場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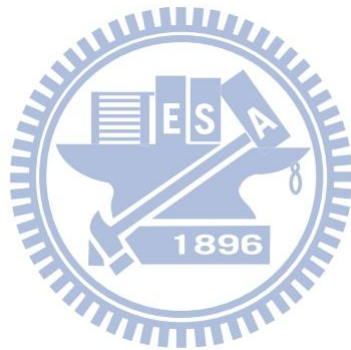
(二)、自然資源爭奪戰

透過上村與國家的政經關係會發現到，上村是全球力量交會、國家資源重組與拉扯的現場。上村是國家主權管控下的裂縫所在。國家號召居民成為忠誠者，但背地透過金錢利誘、武力壓迫等方式對待居民，而這些方法也大多同樣地被用來對待其他所謂的邊緣地區。國家與資方合作為了成為開發過程中最大的獲益者以及資源持有者，且意圖透過合法的掠奪，將居民的資產交由國家來重新分配。國家對待上村的方式並不是透過正常的建制，他們可隨時調派不同面孔的軍人來此「巡邏」；且官方派到此地的軍人不會待超過兩個月，因為官方深怕居民與軍方之間產生情感或是密謀。

國家與資方之間共謀的關係也讓上村很為難。國家與資方分別以電力架設、機場建設、道路擴建、助學金發放等方式做為交換地熱開發的籌碼。這不得不讓人思考為何首都、城市、工業區使用電力和各式國家資源都是理所當然，而位處高山地區的村落要使用電力時卻必須用自身環境作為交換。況且，上村自己也被電力架設的條件排除在外，電力架設的費用高於居民的平均所得太多，電力架設的戶數也無法達到電力公司的門檻。明白地說，各方政治勢力在此競奪的目標就是整個山區的自然資源。在國家的控管下，官方認定當地無主、無人之地即為國家所有。甚至是集體共有的公有地(public land)因為無人登記，也納入國家資產的一部分。在地熱開發案的協商中，奇蹟公司和官方全力遊說私有地地主，打算獲得鄰近相關所有者的同意後，逕自執行開發作業。上村居民則極力爭取公有地的集體性與所有權，希望能藉此抗衡地熱開發案中政府與群眾間的不平等位置。

我認為 Litfin 的觀點值得參考：他曾指出，自然的主權(sov^{er}eignty of nature)是一股合理但隱含權力與支配關係的力量，但他認為應讓主權成為一種不受限制、適時重組的動態實踐；且透過主權綠化的密集成長過程，讓世界的政治產生

新動力。或許當世界產生政治新動力時，邊緣的遭遇就有正義的可能(1998:1-27)。總地說，上村與外部之間存在著多重的距離與邊緣性。¹³⁸這多重的狀態並非只因菲律賓國家的治理所形塑，其中也含括著菲律賓作為一國家主體與各大強權之間的政治經濟情勢所產生的衝擊。上村與外部之間除了存在有地理距離、社會距離外，影響層面更廣深的是政治經濟的距離。地理監的距離可以透過交通工具與通訊工具消弭；社會距離與網絡關係可以透過事件、人群移動而串連。但是整體地來看上村與外部之間的政治經濟距離則是相當難以跨越、翻轉的鴻溝。或許也因此，居民抵抗外部力量介入在地政經運作的方式也從武力抗爭轉為談判、斡旋等策略。從無電到有電，就是一段上村以其政治經濟邊緣性與權力核心重新摩擦的過程。



¹³⁸ 在無電時期就存在著這些界線和距離，雖隨著有電之後有所鬆動與改變，但並未翻轉其遭受擠壓的邊緣位置。

第四章、「界線與關係的重劃」—電力與上村的遭逢



圖 4-1

手機這項科技一項被賦予信息傳遞無遠弗屆、隨時隨地自由流動的形象。手機訊號雖然可以超越地理的疆界，卻未必能跨越權力的界線。科技造成的時空壓縮效果，仍然被社會權力的幾何學所中介。...科技如何可能成為權力控制的媒介，卻也提供了弱勢者生存與反抗的空間。

— 引自藍佩嘉《跨國灰姑娘》

藍佩嘉(2008)筆下的東南亞籍家務移工們在周日的台北火車站裡，正使用著行動電話展開假日邀約、跨界的親密關係、自拍或是玩樂。這是一群有假期、有朋友、有據點的灰姑娘；而假日裡不可見的灰姑娘們都還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認命著。來自上村的 Nana 正是一位沒有周日假期而無法到教會參加彌撒的菲律賓籍移工。因著沒上教會，來台快滿兩年的 Nana 在台最為親近的朋友便是手機。他的丈夫阿 B 透過每日的簡訊、偶爾的越洋電話，陪伴了 Nana 在雇主家熬過了疲憊、想念和笑語。而阿 B 在手機另一頭的陪伴也是隨著上村有電之後才漸漸緊密的。

擔任 Jeepney 司機的阿 B 往往趁著到城裡的空檔，才去找充電處打電話、傳簡訊給在台的妻子。2010 年 4 月過後，水墾區的上村、下村陸續地有了電線桿、電線、電箱、電視...。隨著在村裡就有電可用之後，阿 B 不僅可以在自家裡傳手機簡訊給妻子，甚至在天晴時也可讓家中的一雙兒女跟 Nana 說上一通難得的

越洋電話。越洋電話之所以難得，一方面因為電話費用昂貴、另一方面也得要天氣好時才有穩定訊號。然而最關鍵的當然是因為，Nana 是家族中唯一到外地/海外工作的人，阿 B 家也只有 Nana 這個對象讓他們有機會打越洋電話。Nana 的跨國移動以及上村的電力供應，在表面上看起來讓位居邊緣的上村、居民都逐漸地去疆界化，可以跨越地理限制地在空中相遇。然而事實上，Nana 在台的行動受到契約箝制、上村的電力是一枚政治籌碼、阿 B 在菲律賓底層勞動累積無從翻身等等因素，都形塑著新的疆界。換句話說，在愈趨全球化的去國族疆界同時，Nana 一家人正面臨社會位置與社會界線的再疆界化(re-territorialization)。全球化下的社會總被視為面臨地域消解的時代(Appadurai 2009,Beck 1999, 藍佩嘉 2008)；事實上，全球化帶來地域消解的同時，其重組過程中的排他性也再疆界化了政經邊緣的地方。

邊緣地帶(含括地理位置、社會階級)與其內/外部都維持著不斷的互動過程。Neferti Tadiar(2009)以菲籍作家 Tony Perez 的小說為例；小說中描述的主角是在城市裡從事小型地方產業的人們。這群人包括代辦人員、娼妓和影印店店員等，這群小人物形構出都市的新中產階級支系，他們所負責的是大城市中服務階層的勞動支出。他們所生產的是非常重要的物質基礎建設，使得全球化下的科技延展成為可能。然而矛盾的是，隨之而起的大都會新形式卻將這些底層的服務者排除在外。因此位居底層者想望的一切，都是透過跨國精英階級來代為宣稱與表達。也就是說，底層與核心的互動和關係實則緊密，只是在社會建構過程中被逐一地區隔、分類和屏除。菲律賓全境歷經殖民想像、國族建構以及全球化等動態時序，位居高海拔的上村也以其微血管般的存在與這些外部力量互動、連結著。位居高山的居民生計、生態一直都嵌在低地的變動歷程中。本章中提及的村落與其內/外關係，所指的內/外關係不單是村落內、村落外的劃分，廣義地說還包含著超越地理位置上的統治者、被統治者關係，政經地位的中心與邊緣關係等。是在這層意義上，本文中的內/外之分的界線具有多重意涵的狀態。

在電力來到上村之前，上村的居民生計仰賴農作、親屬互助以及跨地的交換和買賣，所以上村的人力、物力和資源是不斷地與它地產生連結的。這些移動的人、物、訊息、技術、網絡都比電力更早地影響著上村的居民和生態樣貌。然而電力來到上村後的重要性，正如同 Appadurai 所說，「電子媒介與群眾遷移在當今世界裡並非科技上的新動力，但卻是推動(有時甚至是強迫)想像作用的新動

力。...而且當今世界裡，也幾乎沒有哪個人是沒有個朋友、親戚或同事是正要前往外地或者已經從哪裡回來了，而他們帶回的是各式各樣的故事和可能性。...大眾媒介的事件和遷移的觀眾形成了動態的、不可預見的關係，這形成了全球化和現代的聯結核心。(2009:7-8)」更進一步地說，電力促成了複雜且參差不齊的想像空間，並帶動社會關係、界線的再製與重劃。

在第二章和第三當中，我透過歷史與政治經濟視野觀看 Cordillera 山區與外部之間的脈動。在本章當中，我將焦點拉回到上村當中，並將沿著電力線路看上村。在第一節，我會說明電力的安裝過程，以及在過程中所發生的技術斷層、技術偷渡。第二節是描述上村的日常電力生活，電力如何縱向地重劃親屬關係、地主與佃農的關係，以及橫向地區隔世代差異等。第三節是論及電力所產生的間接影響。第四節是說明上村如何以自身的環境作出抵禦策略，以及第五節作為小結。

第一節、電力架設



左圖4-2：Lubuagan鎮發電站廠區所堆存的燃料桶。

右圖4-3：Lubuagan鎮發電站的高壓電塔。

設立在Lubuagan鎮上的發電所和電塔是由國家電力公司所負責。從照片中可看見場區的環境以及堆放的燃料桶；這個區域的負責人直隸於國家電力公司，因此此區的內部營運對於居民而言都是未知且無涉的。迪爸說，全Lubuagan鎮管轄範圍的電力開關就設在這個發電站裡，會「有個人」開關總電源。然而，卻沒有人知道迪爸口中的「這個人」究竟是誰，也沒有人知道電力究竟是人為開關的或是系統開關的。握住技術端與權力端的鎮公所和發電站不會主動說明，而居民的好奇也只能被檔案圍牆之外。在國家電力公司2010年的年度報告中，國家電力委

員會總裁旁的醒目標題寫著：「國家電力公司全天候努力工作的目標與任務就是在於，提供菲律賓人民，尤其是弱勢者們，可負擔且可可靠的電力。」¹³⁹我在上村時也曾見過居民的家中收藏著幾份不同的電力公司所發放的文宣和報告書，內容皆以英文為主。國家電力公司的報告、說帖中總會放上象徵著乾淨、專業技術、安全和快樂的圖片。但對於底層的民眾(尤其是弱勢者)而言，他們所在乎的重點在於集體的風險承受以及會帶來多少實質地景、生計和生活上的改變，與電力公司所在乎的安全有所落差。

由於村落居民的財產和所有網絡都在村子裡，他們不願意接受不確定性高、危險、劇烈的變動。因此，村落居民對於電力安裝，花了一年多的時間進行討論與確認。最終上村三聚落在 2010 年完成電力架設。電力架設的前置作業為，申請電力的家戶都必須預付 1420 披索的安裝費，且全聚落必須有 20 戶以上的申請量，國家電力公司才會派人前來安裝。光是這兩項門檻就阻擋了許多居民申請電力的資格。1420 披索對於月平均收入 3000 披索的上村家戶而言是筆龐大費用，有錢安裝的家戶又必須湊滿 20 戶以上(達聚落三分之一以上)；此雙重條件都再再地排除居民在電力申請上的權益。

上村的藏峰聚落內裝有四根電線桿，從空中俯瞰正構成梯形的四個端點。每根電線桿上平均有 15 條向外發散的電纜線，也有被剪掉的電線仍蜷曲地掛在電線桿上，致使電險桿上的電線看起來相當雜亂(如圖 4-1)。每個電線桿旁有一個大電表，裡頭有八個小電表分別記錄八條主電線的用電量。舉凡電線桿、電線、電箱等都是從 Tabuk 市逐一運到山區的。當大貨車載滿了材料抵達下村後，再由上村的數十位男性們協力徒手搬運到上村。這趟搬運的過程被視為村落主體力量的展現，迪媽說「當然要搬阿，因為大家都想要電，就要自己搬，就算再重也要搬上來，像碾米機也是搬上來啦。下村已經先裝好電了，上村也想要有電。我們要自己搬，不然會被別人說我們很懶(lazy)。」上村居民為避免被說「懶惰」，男性居民們的搬運勞動被視為無需支薪的自願性勞動；而女性們會從各家中準備咖啡、食物等作為貢獻。然而，從都市裡延攬到村裡施工的工程師們是領薪的技術層級人員。他們非但不用搬運，且被居民熱情款待。原因就在於他們以電力裝設技術掌握發言地位。充作居民與工程師之間橋樑的人，則是身為地方幹事之一

¹³⁹ 原文為：It is the mission of providing every Filipino, especially the most disadvantaged, with affordable and reliable electricity that keeps National Power working all hours of the day and working hard. 此份年度報告用英文撰寫，且可在網路閱覽。參考資料：http://www.napocor.gov.ph/2010Annual/NPC.AR_2010.pdf (2012/10/02)

的老六；老六擔任此工作的原因正在於，他熟用手機通訊、擅於溝通，且政治代表性。



左圖 4-4：有電線桿後的上村風景。

右圖 4-5：上村的電表箱。

工程師們掌握官方認可的技術；因此居民對於他們指示的搬運、電線桿選址、電箱分配、家戶內電線裝置等皆全面配合。對於居民而言，電力裝置技術的取得過程不易。其過程必須先通過學校訓練、證照考試、公司儲備等過渡儀式才能取得安裝電力的正當性；如此一般的過程正好形塑出「專業」印象。技術掌握者發表意見時的文化位置更勝於居民的意見，因為技術人員是握有國家證照通行證的技術員，而居民僅是在地的一群沒有臉孔的申請者而已。電線桿的選址安全或是正確與否，都輪不到居民們發聲。因此就算居民作為主動的申請方，但在施工過程中所有的決定幾乎都掌握在技術人員的手中。當電力架設完成之後，這一群工程師便離開，不留下任何技術上的授予、銜接。因此，電力相關知識和架設技術仍不被居民所知。倘若上村遇到電力使用障礙、器材故障、電線走火、電線鬆脫等狀況，就必須自行擔負後果。遠在城市裡的工程師們，是不會再上山的。

不過，居民對於電力技術的偷渡早就行之有年。工程師與居民的相對位置呈現，僅在電力安裝的當下而已。對於山區居民而言，電力架設的技術早已被偷渡到山區。技術的偷渡透過到外地工作、讀書、生活的人所攜出帶入。村裡有人曾在城裡做過建築工人、有人曾做過水電工、有人曾作過地下管線工程的臨時工等，這一群人便是技術上的偷渡客。在菲國，有明文規定必須要有執照者才能進

行電力裝置工作；可是在距離相對遙遠的山區常常等不及技術人員前來。在工程師離去後，村裡新莊的電線、電視、電燈都會由自己信任的人來幫忙安裝。像是老六就常常幫朋友們的新房子裝設電力，以及迪家剛蓋好的私用廁所也是老六自行拉電線、裝燈泡。由此可見，雖然技術執照的發放權力在於政府機關，但是技術的相授早已留滯山區。

電力架設初期(2010年)，水壑區只限於夜間供電。在水壑區，每當聽見美式流行音樂透過低音音響播放的聲音，就會知道時間已經下午五點；若在夜間看電視時被斷電，表示時間已入 11 點。此時的電力如同鬧鈴，提醒、介入著水壑區的夜間生活。夜裡，每房高腳屋中的亮度和聲響皆不同，有些家戶裝了一個燈泡在聊天、有些家戶裝了電視機在看影片、有些則聽傳統樂舞音樂，也有些家戶選擇暫緩裝設電力。尚未裝電的家戶普遍有經濟壓力，家裡的錢要優先支付學費、食費和生活開支等。延遲裝設電力的家戶，在夜裡就延續燒材、點煤油蠟燭、使用手電筒等方式作為照明方式。然而，此時的供電模式仍無法支持上村居民使用長時間耗電的用品，例如電冰箱、電扇、洗衣機等。

電力和煤油的顯著差別在於費用和實用性。電力供應之後，平均每戶的單月電費是 70-100 披索；表面來看，比起每月需耗 150 披索的煤油是相對節省。村裡的學生會說「煤油蠟燭很暗，只能照到臉，食物上有髒髒的也看不到。如果晚上要讀書、寫作業的話，會連筆尖都看不見。」因此，可得知每戶得電力照明的月消費低於煤油。但是，事實上，我認為電力器材及周邊產品的消費都使得電力的使用門檻增高不少。且電力的流量消費是無形的，不像煤油是可見、可調整的照明方式。因此，我認為，電力的來臨勢必造成居民在經濟生活上的改變，而居民經濟又會與其生態環境產生變動。

2012 年，電力進入上村已屆第三個年頭。此時的電力供應時間已拉長為下午一點到夜間十一點(一天 10 小時)。聚落居民對於電力的信賴與存在逐漸滲入日常生活的習慣中。原本掛在迪家二樓客廳正中央鐵皮天花板上的煤油燈，不知何時已被迪媽悄悄地收到櫥櫃中。迪家的兒子們在下村搬運貨物回自家雜貨店時，也不需要再傷腦筋如何揹負煤油回自家雜貨店了。迪家老六也不用再三天兩頭走山路到 Lubuagan 鎮上為手機充電費神。待在上村的下午，可以尾隨孩童的步伐去找樂子。一戶坐落在藏峰聚落下緣處の木作高腳屋裡，坐在藤編蓆子上的十幾個小孩們全都目不轉睛盯著電視機裡的小老鼠看。孩子們之間相傳著，最新

的卡通都在這戶人家上映。正當屋內看著卡通而哄堂大笑的同時，女童爸爸正坐在門口編織手工掃把。這影片是女童爸爸去 Tabuk 市區兜售掃把時，專程為女兒們買回來的迪士尼卡通 DVD。這是一部貓抓老鼠的卡通影集，劇情裡的角色全都是英文發音，但是因著滑稽的動作與色彩飽和的畫面，孩子們還是能夠「看」故事發展和有趣味的橋段。所以對於看得津津有味的孩子們而言，他們真的是在「看」電視。此時的屋外，正是夕陽西曬之際，許多看完卡通的孩子們嬉鬧著爭先跑回家。

在 2012 年初以前，這些孩子都是在吃完晚飯後才捏著手電筒去別人家裡看電視的。自從下午就有電力可用之後，聚落裡的孩子們看完電視還忙著去玩上一場躲貓貓後才回家。如此一天的電力生活，是 2010 年之前的聚落所未從有過的新樣貌。

第二節、界線與關係

(一)、電力的集體性

從電線的裝設便可看出上村內的親屬網路。親戚之間會相互分享電流，因此只要沿著電線杆上的電路和分支，便可畫出親屬關係圖。分電的方是有利於親戚之間分擔電力設備所帶來的各項消費。就以迪家來說，迪家的電錶含有迪爸家、大哥家和四哥家共三戶的用電量，但大哥家和四哥家僅裝電燈泡作為夜晚照明使用。大哥家、四哥家的家人們要觀看電視、DVD 影片或是聽音樂都會跑到迪爸家來。而電費是由迪爸一併支付，形成「電力產品家族共有化」的關係模式。在電力的觀察當中，我發現村落的親屬關係是切不斷的扣環；也是位居山區生存所必須維繫的連結。「共用電線」象徵著經濟資本上的互助關係，親屬關係就像是經濟共同體，也像是結盟關係，在任何食物、住家、生活需求中相互保護、支援，不斷地增生親屬間的有機連結。

上村的電視機多半是 20 吋左右的 CRT 電視機，也就是機身笨重且訊號接收不易的電視機款。有些家戶存了錢買了新的電視機、有些則是買二手貨，不過都必須到 Tabuk 市區採賣、托運回村裡。在電力引入的第一年，聚落內擁有電視的家庭並不多。因此當時到友人、親戚家看電視的風潮興盛一時。有天，我在鄰居喬阿姨家客廳翻閱一本老相簿。¹⁴⁰相簿裡多是喬阿姨的兒女們在剛出生時的照

¹⁴⁰ 喬阿姨約莫 45 歲，平日與小兒子單獨住在村裡。她的丈夫與兒女多在外地工作和讀書，由於

片，泛黃的照片裡可看出當時的屋舍與喬阿姨現在的水泥大房相去不遠。¹⁴¹在某張喬阿姨抱著女兒的照片中可看見當時的家中已有電視機的擺放，於是好奇著當時聚落內尚未有電力供應時，喬阿姨一家要如何使用電視機。針對這個問題，喬阿姨已經就讀大學二年級的女兒 Balla(20 歲)說：「那個時候很少看電視。家裡有一台爸爸去外面工作時帶回來的發電機，用那個發電機連上電視機就可以看。可是發電機很吵，而且需要油，所以晚上還是很早睡覺，電視機是偶爾用來看一下跳舞的，可是很少。¹⁴²」

迪媽說：「喬阿姨的老公很認真賺錢，他們不是說很有錢，但是很早就有水泥的房子。他們會存錢，所以他們有發電機、電視。以前他們家還有馬，可以騎去 Lubuagan、Tabuk。他老公是蓋房子的工人。知道怎麼蓋房子，所以他們家事很乾淨的房子。」喬阿姨家在過去除了房屋外觀之外，其生活作息與其他人無異。但當電力來了之後，喬阿姨家最大的特色就在於親戚好友們總能在喬阿姨家欣賞到時下流行的戲劇 DVD，甚至是海外最新的偶像劇，例如；臺灣戲劇「犀利人妻」和「花樣少男少女」、韓國戲劇「大長今」¹⁴³等。在迪爸家和喬阿姨家會發現到，經濟資本較高者所能得到的資訊來源較多，但他們並不會閉鎖消息來源，反而會讓影像、消息透過親屬互動散播和傳遞。

2012 年始，迪家裝設無線電視接收器。也就是說，過去只能觀賞 DVD 的電視機，如今還能接收到至少 20 個頻道以上的電視節目。「一起看電視」的家戶空間其實是個親密的所在，通常是親屬以及友好的人才會一起看電視；除此之外，一起看電視的空間也是個具階序倫裡的空間。¹⁴⁴傍晚在迪家，不久前蓋好的浴室裡正亮著燈，早上來不及去洗衣服的哥哥正在裡面洗著衣服。沿著一樓後方的階梯往二樓走去，客廳的燈泡閃著微弱的光線，爐火上正在悶煮要作為晚餐的豆子湯(bilalel)；客廳與擺放電視機的通鋪間隔有一片木板牆，牆的右邊是一扇木門可走進通鋪裡面，迪家大哥、四哥的小孩們全都在木板門邊擠著頭觀賞電視。電

喬阿姨大兒子的職業是軍人，因此當巡守的政府軍隊來到水墾區或是上村時，多在喬阿姨家的屋簷下吊掛睡袋以及使用喬阿姨家的廚房、客廳。也就是說，喬阿姨因著其兒子的身分而把來此地巡守的軍人起居當作自家事在關照著。

¹⁴¹ 喬阿姨的房舍如今在聚落中仍算是較為少見、新式的水泥平房，也就是說早在 20 年前，喬阿姨家已經使用水泥作為房屋建材。

¹⁴² 「跳舞的」是指 Kalinga 傳統樂舞的音樂錄影帶，我於 2010 到 2012 年的觀察中皆發現當地居民共同喜好的觀賞影片就是 Kalinga 傳統樂舞，幾乎家家戶戶都有樂舞的相關影片。

¹⁴³ 水墾區居民喜愛觀賞的影片類型很多，不過有屬外來片居多。包括香港的武打片、美國科幻片、台灣愛情劇以及韓國喜劇等等。

¹⁴⁴ 電視節目的收看決定權幾乎掌握在父親、兄長的手中。

視內容聽起來相當華麗，主持人洪亮的聲音炒熱電視機裡和電視前的觀眾情緒。這部「Wil Time Big Time」綜藝節目是迪家每晚在晚餐前後的重頭戲，這也是迪爸最喜愛的一齣綜藝節目。

節目由一名年長的男性藝人—Willy 所主持，同時有其他的女性藝人作為固定班底，以及年輕性感的美女舞團作為節目串場與表演所用。節目中主要的對話語言是菲律賓官方語言 Tagalog 語，偶爾夾雜英語以及相當少部分的方言。對於迪媽、年幼孩童、長年在山區的幾位親人們而言，Tagalog 語是比英語更為陌生的語言。因此，他們便只多透過畫面來臆測電視節目的內容。此綜藝節目邀請各地的民眾參與遊戲，並在節目中大秀鈔票以鼓勵得到勝利的民眾，少則五千披索、一萬披索，多則十萬、百萬披索的獎勵金。每個共同觀賞的夜晚，迪爸家的觀眾都會隨著獎勵金的發放而嘖嘖稱奇。這段節目與時間，成為迪家家人的共同經驗以及日常交談話題。

迪家的電力消費比起村裡的各戶平均消費要高上許多。¹⁴⁵不過，迪爸也因著觀看電視的高頻率，比別人更快地接收新聞、氣象、政策等消息。如此一來在各項事務決議會議中，他也能有更多判斷依據。也就是說，迪家透過經濟的運用和交換，換得其文化資本以及名望地位。電力的進入讓有消費能力者買到更多商品與取得更多影像訊息，也就相對地拉大聚落內部的生活差異。換句話說，電力同時也重組了在地居民之間的關係。原先用來交談與串門子的時間被壓縮或是轉換成為電視時間；隨著電力的使用，各家戶、各家族之間的接觸範圍縮減，也就造成訊息流通的範圍逐漸地縮減。

在電力供應之後，迪爸家的雜貨店也有細微地變化。迪爸雜貨店的進貨並無顯著變動，最大的不同僅在於煤油的儲存量愈趨減少。迪爸的雜貨店除了煤油的進貨量銳減之外，還有在產品的選擇上有了新的考量要素。舉例來說，原本在迪家雜貨店長期以來都是販賣 A 品牌的小包裝洗髮乳，大部分來買洗髮乳的人僅會說「要買洗髮乳」，不過在電視廣告以及青年人的訊息流動下，來買商品的人將語句變成了「你們有去頭皮屑的 H 牌洗髮乳嗎？」除此之外，迪爸的雜貨店自開張以來，因著電力而衍伸出新的人際互動模式—「討債」。迪爸說，「有電之後，由其是電費收費員來收錢之後的幾天，大家都來跟我『借米』。以前不會借

¹⁴⁵迪家三戶的每月電力費用開銷約為 400 披索左右，再加的電視頻道接收需月付 250 披索；共 650 披索。上村電費月平均為 70-100 披索。

米的人現在都來借了...我現在也不太願意讓他們借，除非剛好有人拿米來買東西。我才把那些米借出去，如果我把自己家要吃的米都借他們，我還要用錢去 Tabuk 買米！」迪爸所說的「借米」的意思等同於「借錢」，借米的人把原先要買米的錢挪作他用，然後再來跟迪爸借米，之後他們便能以米還米或是以錢還米。迪媽偶爾會把舊舊的帳本拿出來校對，看看還有誰欠米、欠錢未還。除非債務棘手才會由迪爸出面，否則多是由迪媽出面去向該戶的婦女追討欠款。迪媽討債時都會很委婉地在該戶家裡喝咖啡、閒聊，直到離去前才問問看對方家裡最近有無米可以吃。若有米，迪媽就會淡淡地說出債務的事。若無米，迪媽就會不發一語地離去。這種方式是為了避免在關係緊密的村裡，造成雙方關係的緊張或是尷尬。

(二)、勞作轉型

電力也加速了上村的勞作轉型。上村原有換工、自由工的工作型態。換工指的是在農忙期間、村內搭建房屋時相互支援的勞動力。而自由工是指在聚落或是家戶內協助砍柴、搬運貨物、臨時勞動、編掃把等日常生活中必須的勞動工作者；他們會依著季節、事件和自身的處境作出勞動力的分配。這些工作多是親屬、鄰居之間勞動力相互支援的方式；也是關係串連、穩固的互動模式。然而，這群換工者、自由工們，在政府眼中成為了無業遊民；¹⁴⁶也就是說，站在政府部門的歸類當中，無領固定薪資、無固定勞動者皆會被稱為無業者。然而，誠如我上文所述，「無業者」的工作實則相當繁瑣、必要且耗力的。

逐漸地，當換工、自由工的工作型態無法取得現金之後、當勞動成為可以交易買賣的商品之後，高地的生計模式便開始鬆動。在菲律賓的現代教育開始普遍執行時，位居山區的學童為了取得讀書的機會，便會到城市裡或是到村裡據經濟優勢的家中「換工」。這種類型的換工便不是以工換工，而是以工換酬。也就是說，學童會住在雇主家中幫傭，然後由雇主支付學費以及該學童在家中所需的開銷。水墾區有多位婦女表示他們在小時候都曾住在鎮上的大戶家庭、有錢家庭中，目的正是為了取得讀書機會。「我們讀書的時候都要去別人家裡住，我幫(help)他們打掃、照顧小孩、洗衣、煮飯、打水，每天很忙的，而且住的地方要回家要一天啊。不可以回家的。都是為了要讀書阿。學費很貴，要幾百塊，家裡的米如果都賣掉的話可能有錢，可是家裡的人要吃什麼？只能自己去工作啊，要讀書就要自己去。以前換工作的話就是蓋房子、收稻、翻土或是搬東西。可是要讀書阿，

¹⁴⁶ 他們的稅收憑證上的職業為：無業(Unemployed)。

所以就去住在鎮上或是城市，就要讀書。可是大部分還是工作，因為工作很累，讀書就比較少。很多也是沒讀書，就繼續在老闆家裡工作了。」他們皆認為這種模式的讀書成效很低，因為工作和休息時間完全不夠，反倒使得學業荒廢。但是，他們若不去工作，其原生家庭就無法支付學費。因為，學費是一筆清清楚楚的數字、金額，而不是家裡實際收成的幾斤米、幾袋水菜可以交換而來的。

因著村落對於各式商品需求增多、教育所需和交通費用等緣由，山區村落的勞動力便潛移默化地讓渡到他地，抑或是讓渡到固定勞動生產的範疇之中。隨之而來就是有愈來愈多的年輕人到外地、外國打工，以求取更多、更好的「實質」薪資待遇，也就是指固定額度的薪水。為此，外出工作的居民們最大的希望就是能維持家戶經濟的成長。事實上，因著勞動力的出走，高地的生計延續或許會逐漸萎靡，進而使得親屬家戶之間找不到合適的人力支援、家戶網絡不再緊密等後續效應發生。勞作的轉型也間接使得地主與佃農之間的贈予短缺。過去，當地主需要佃農、換工者協助的農務工作，逐漸轉由小型機械取代。小型機械取代的過程，不僅讓勞動力轉型；在勞動交換過程中，道義上的贈予交換遂而減少。除此之外，現金需求的增加也會加速同質農產的重複耕作，以及手工品的大量生產。其中，當居民全都同質地生產相同的作物，也就拉低彼此之間的競爭力。例如，手工掃把的量多，價錢就無法拉抬。

以迪家二哥為例。二哥有幾畝小面積的水田，還有一座穀倉和幾隻黑豬。在二哥剛成家的時候，他和二嫂兩人是以農作為主，依據日照、季節來進行勞動，並且兩人可相互分擔田裡的工作。就在二哥生下小孩之後，他認為自己必須多為孩子們的學費設想，因此把田地的勞動工作交給二嫂負責，他跑到城裡作臨時雇工。在城裡作臨時雇工的水墾區人很多，而且再危險的工作都有人都願意從事。我就聽老六說有些人在城裡協助黑道完成任務後就拿了錢回到山上躲起來。二哥雖然沒有加入這類的工作行列，但他的工作也多以清潔大樓外牆、修補高速公路路面或是清潔下水溝等危險工作為主。迪媽知道後就請二哥別在城裡待，回到山上來也是有工作可以做。後來，二哥回到水墾區之後，他一面和二嫂分擔農事，一面也加入水墾區近來增多的道路修補工程和水利工程等招募工作。二哥家的農事作為家戶生產的最基礎保障，但是二哥也仍必須從事勞動工作才能換得薪資。有時學童的學費、稅收和電費都等不到田地收成之後再補交的，因此二哥為讓家庭開支無虞，加入勞動市場是他必須的出路。

水墾區的勞動商品化起端遠早於 Baton-Buhay 礦場的開挖。因為在礦場設立之時便有許多水墾地區的人前往受雇。因此勞動商品化早就產生，只是隨著各式商品消費愈來愈多之後，貨幣的需求增大，勞動力的商品化也就加速捲動。在二哥的例子中，因為在上村成家所以重心仍留在村裡。但是對於許多未成家的年輕一代而言，在接受新式教育以及到外地戀愛後，勞動力不再回流的機率也增加。而回流的勞動力在水墾區多轉為開設雜貨店、開 Jeepney 等工作。另外，到外地的工作成為年輕人躍躍欲試的努力方向之外，到外地工作卻也總是讓村落裡的人感到憂心和掛念。原因在於到外地工作後所患的疾病和交通事故從未間斷。尤其是這一、兩年在 Tabuk 市流行的登革熱導致許多人死亡，水墾區也有人在城裡染病後過世。

老六是如此形容登革熱的，「登革熱是被蚊子咬死掉的？(笑)蚊子是只有在 Tabuk 才有的，我們這裡沒有蚊子。我還有幾個朋友，都很年輕，但因為都得了登革熱就死掉了。住在 S 聚落就好了，這裡不會有蚊子。我和媽媽都不喜歡去 Tabuk，那裡好熱而且晚上睡覺都會有蚊子。蚊子咬不會痛，所以我都不會把他打死，可是萬一他會把我咬死，那我就要考慮要不要打死他了。」迪媽也說「登革熱有不知道是什麼病？很像感冒的樣子。台灣有登革熱嗎？真的會死掉嗎？我們住在山上就好，這裡不會生病，去 Tabuk 才會生病。」

除了疾病之外，迪媽也認為出外工作的人容易因事故死亡。「去城裡工作的人就會想要有錢買機車，一台要六、七萬！你哥哥也說好多次要買機車。可是我們住在這裡需要機車嗎？我們可以搭 Jeepney 就好。下村有很多人買機車，他們會說騎機車去城裡很方便，但是騎機車就會出車禍。我們去城裡的路很不好，你搭 Jeepney 就知道路都很『跳』(意指很顛簸)，如果自己騎機車很危險，會滑倒。很多人騎摩托車死掉。」迪爸則補充說「因為年輕人都去城裡面工作，所以有錢就買摩托車，買摩托車就會自己騎回家，可是往往都會發生意外。有些人會帶安全帽、有些人不會。」在談論疾病和意外發生的過程中，迪爸、迪媽都把導因描述為是因為要到城裡工作，因而有多餘的風險需要承擔。而登革熱和車禍意外都僅是村落居民談論時較常舉出的具體描述事件，然而在迪家二哥、迪家老六的例子中可以知道，其實外出工作的人所承擔的工作風險和意外發生的機率遠比居民想像來得更多；也遠比他們自身尚未外出工作前來得更意想不到。

(三)、界線重製

迪家自下午一點開始便會輪番觀賞各式不同的節目，包括政論新聞、美國職籃、綜藝節目、愛情連續劇等。而過去兩年來所累積的 DVD 影片都只能作為忘記繳費時的後備方案了。而迪家的電視機往往工作到全家人紛紛就寢，或是直到夜間 11 點才被迫斷電結束。隨著迪家的電視收看時數增加，成員們對於內容的評述也愈來愈顯現。在觀看談及偏鄉教育問題的新聞片時，平日最常告訴我「這裡(指水墾區)很窮」的迪媽說「他們是真的很窮的地方！雖然我們沒有很多錢，可是在山上不會肚子餓，我們有米、有菜，也有雞阿，還有很多乾淨的水可以用，都不用擔心。」

又有次在看菲律賓移工在香港被殺的專題報導時，迪爸說，「你看，他們根本不把菲律賓人當作人在看，如果他們想殺就殺。不懂得尊重，把別人當作動物一樣，那些去工作的人就跟動物一樣。他們只是去工作，沒想到就丟了性命。在台灣也會欺負外國勞工嗎？」電視內容不僅讓居民看到了「外界」，也透過比對來觀看自己。他們正透過電視逐漸地建構出自我認定。當居民在村路中看見馬尼拉的購物商城、非洲的樂舞、日本的黑道、紐約的自由女神等。然而事實上，居民透過這些影像會與自身對話，他們會說「我們跟非洲一樣窮嗎？」「自由女神是美國人嗎？」「日本黑道跟 NPA 一樣嗎？」等問題。這也就像是 Appadurai (2009:26)所說的出全球化在很深的意義上是，一段歷史的、不均勻的、甚至是地方化的過程。

除了電視之外，村裡使用頻率較高的產品就是手機。在藏峰聚落的教堂前有一間居民合力搭建的茅草屋。在午後日落前，教堂邊的小廣場上便會有許多孩童聚集玩耍，也會有放學後的年輕學子在茅草屋下閒聊歇息。Ema(女性，16 歲，中學生)的家就坐落在教會的前方，有一日我便在經過茅草屋時遇見她，看他手中拿著手機充電器往來奔走，不一會兒後他也坐進茅草屋內與我聊天。此時，他手上除了手機充電器(線)之外，還多了一支手機。他對我說：「我剛剛先去借手機充電線回家充我的電池，之後再去借手機殼，要把我的電池裝進去，我要傳簡訊給我在 Tabuk 的姊姊，跟她說叫她回家。只有這個電池是我的啦(笑)，手機充電器跟手機殼都是別人的，我去借的啊，我要用的時候再借就好。我還要先去把錢存進去。¹⁴⁷」

¹⁴⁷ 菲律賓手機使用方式多以「預付」方式為主，必須先到儲值點存入足夠的金額才能使用手機功能；金額小自一披索、十披索都可以存入。在菲律賓傳送簡訊(text)只需一披索費用，因此大多數人使用傳送簡訊功能比通話功能來得多。

聚落裡除了 Ema 之外，也有多位高中女學生以「共同擁有」的方式在輪流使用手機，擁有一台專屬自己的手機者多是就讀大學的學生或是其他已從事工作的成年人。共用手機的方式一方面削減掉購買的負擔，一方面是建立起可用手機通訊的網路社群，也就是說透過共用手機累積可通訊的名單，讓手機的使用率增高，也讓使用者們有更多的名單可聯繫。共用手機的小圈圈裡，彼此也會交換使用手機的心得以及資訊，當然也會相互解決彼此在使用上的困難。然而，誠如之前所說，共用手機的現象多僅存在於聚落之內，一旦外出念書、工作便會減少共用手機的行為。「共用擁有」的手機使用方法還有另一種形式，也就是不會使用手機通訊的人或是買不起手機的家庭，便會固定找幾個親朋好友幫忙打電話傳遞訊息。例如迪家大嫂剛生下新生兒時，便會來找家中的老六幫忙打電話到戶政單位提報戶口。從手機的例子中，便可發現電力產品互動網路的邊際是無法估量的。

文化邊界中的邊界不僅是定位在官方定義下的文化單位之間，文化邊界事實上會透過不同的生活經驗、性別、政經地位等而歧異地被形塑。在手機的交錯連結中，村裡年輕女孩的聊天話題變得更為豐富，Ema 說，「有手機很危險的，因為常常有人因為手機交友而結婚。我不想要有手機，常常會有人打電話來約你出去，有時候出去後就會跟對方在一起。我們學校有人就這樣，就結婚了。我覺得這樣不好，我不喜歡。」擅用手机交友的人還有迪家老六。老六不僅交友廣闊，也常在朋友邀請下到各地拜訪與表演歌唱，因此結識許多僅有一面之緣的朋友。而老六的手機號碼便隨著這些朋友一路流傳到老六從未踏足過的他島上，例如 Visayas 島或是 Mindanao 島。此後，老六不時地會接到陌生電話的來電聊天，調皮的老六樂於變換各種身分與口音跟對方聊天，作為日常的消遣。不過老六相當了解手機交友的風險與現實面，因此都是帶著好玩但被動的心態在進行手機交友。其實手機交友在我的觀察看來，部分的人之所以躍躍欲試的原因在於「新鮮感」。聚落內年輕人們的工作、親友、生活都緊密連結，對於聚落內的消息也幾乎聊若指掌。手機遠端的那份「未知」，成了年輕人之間在話題上的調劑，因此使得手機的地位與存在有了必要性。

然而文化邊界的延展也不只是世代間的差距或是物質層面的可見之處而已。文化邊界也作為族群之間、地域之間的區別。水墾區是依據個人的出生地作為分類上的根據。他們作出族群區分的現場會發生在看音樂錄影帶的當下，當電視螢幕播放每一年的節慶樂曲時，就會聽見「這是 Kalinga 的舞蹈，聽音樂和節

奏就知道是 Kalinga 的...還有那個衣服。你看 Baguio(市)的人就比較胖，他們跳舞很慢；衣服顏色也比較不一樣。他們都叫老人出來跳。Kalinga 的音樂比較好聽。你等一下看 Ifugao 的，他們的音樂跟我們的不一樣。」在觀看樂舞影帶的過程中，幾乎在場觀眾都可以透過語言、衣著、音樂和表演方式指出各地人群間的差異。文化邊界呈現其雙重性，讓不同地區之間的人所擁有的差異突顯，但也讓跨界連結在通訊工具中延長開來。

此外，電力輸入對於村落所造成的關係重組是一段政治過程。除了手機、電視之外，電腦也是常被提及的電子產品之一。聚落內最常提及電腦的族群是青少年、大學生們，由於大學生們在城裡讀大學時偶有電腦學習課程，部分人因著研讀電腦相關科系而會談及電腦。一開始，我因著聚落內少見電腦而忽略觀察電腦的影響與重要性。但是隨著與多位青少年愈加熟悉，當他們主動詢問我電腦資訊的次數增加，我才意識到即便電腦在聚落內少見，但是電腦的使用和印象都存在於居民的言談和腦海裡。

上村的第一台電腦是由臺灣的志工隊捐贈給當地小學的，由於是捐給學校使用，所以管理與使用權都在校方，因此居民們可談論與使用的機會相當有限。而居民們所共同擁有的第一台電腦是由跨國企業奇蹟公司所提供；當時奇蹟公司與地方政府在上村舉行地熱開發案的公聽會，奇蹟公司為表示與地方居民協調的誠意，贈與各村不同的物資。上村因此得到一台桌上型電腦以及一台發電機。也就是說，電腦被視為一種友好的象徵，贈送電腦及相關設備成為關係牽引的中介。村內會使用電腦的人不多，當時人在村內的我曾被諮詢過能否協助安裝電腦，不過陰錯陽差之際我並未去成，而是再到下一趟拜訪時，我才見到這台「公用電腦」。由於水墾區沒有網路可以使用，因此這台放在村長家的電腦只能用來作為文書處理以及資料列印使用。有一次，當花叔正在外地念研究所的女兒 Jenny(23 歲，研究生)回來時，約我一同去修理電腦，並詢問我關於電腦列印上的問題。Jenny 說「你是台灣人，你會修電腦。」

這台「公用電腦」的使用者只有兩位，一位是 Jenny、一位是 Sue(女性，25 歲)。兩位都是大學的畢業生，Sue 還擔任村辦公室的文書一職，也自營一間小小的雜貨店。倒是村長家並未有人會使用這台電腦，僅是把電腦放在村長家而已。電腦的使用權代表的是一種知識能力，能使用電腦的人握有使用上的說服力。由於電腦是一外來物，當大家都對電腦的認識很薄弱的時候，「電腦」便具有不可

侵犯的光芒。除了以電腦作為友好工具之外，還有碾米機、水質探測器、翻土機等機械性用具。這些工具的背後其實是意圖交換居民的信任和親密。政府、跨國企業和 NGO 透過這些工具就像在下圍棋一樣進行高地勢力的圈圍，並且在無形之中拉攏山區居民的政治傾向。

(四)、成為國家的忠誠者

水壑區的電力架設是菲律賓的國家電力公司所負責。國家電力公司原為國營企業，之後開放私股投資，現屬於官、私股共資企業。水壑區的電費是由電力公司的收費員來此收取。由於電力公司在水壑區無辦事處或是派遣人員，因此水壑區的電力管理權是由地方政府(鎮公所)管轄。因此水壑區在電力使用上的協商對象就是地方政府，並不是電力公司。因為電力使用後，原本不常與鎮公所交涉的上村的居民、村幹事們逐漸拉近與鎮公所之間的距離，為了協調供應時間、電費收取的規則等。也就是說，水壑區因著電力架設，而與地方政府建立起比過往更為頻繁的互動。換言之，地方政府對於整個水壑區人力流動、聚落現況與地方民意，都可透過每個月收取電費的過程、電力使用協商過程而定期取得。我認為，定期收取電費與徵賦稅收的政治意圖相同；Appadurai(2009:174)提及，「評估稅收的巨大機制實際上從屬於一個複雜的規訓和監控系統。當地官員浸淫其中，發展出一整個系列的數字思考習慣...殖民主義教導的政治運算數真得可說是深入地方。」也就是說，不管是收電費或是稅收，都是提供政府一個定期監控地方的正當理由。¹⁴⁸

電力供應後，收電費成為一件很重要的事。每回當電力收費員來收電費時，都會引起居民之間相互提醒。收費員總背著一個黑色的斜背包放置現金，右手握著一疊長條狀的輸出列印紙，上頭有密密麻麻的數字表示各家戶每個月的用電量以及費用。電費收費員並非抄錄電表上的用電量，而是依據電力公司的表單向居民們收費，因此居民們表示常常搞不清楚收費標準為何，僅能按照收費員的指示繳費。也就是說，電力使用的規則並不透明。收費員是屬於國家電力公司的職員，全村落在電力使用上的窗口僅有這位收費員。這位收費員的管轄範圍為整個水壑區，舉凡故障、維修、費用、安裝等工作都由他一手包辦。但由於職責太過複雜，總是不容易找到他來協助排解問題，僅有在收取費用的這一天，每個用電戶才有

¹⁴⁸ 水壑區居民曾經表示，他們認為政府針對水壑區的人口普查和家庭收支調查的頻率增加。過去的人口普查次數遠不及近幾年所作。我在田野工作期間就遇過一次人口普查的作業，調查員針對戶數、人口、職業、收入等都作了詳細的詢問與紀錄。

機會大吐苦水或是提出問題。

另外，上村除了固定收取的電費之外；還有國家稅收。徵稅的關鍵在於政府對於地方範圍、居民數量是否具有高度的掌握；倘若政府對地方的掌握度低，隨意徵稅的後果可能導致地方反彈以及逃漏稅。但政府若對地方的掌握度高，居民的數量、名字和家戶關係都制訂成冊的話，表示政府對於此地的整編已大致完成。而雜貨店被課徵營業稅，一方面表示政府企圖掌握地方的商業運作、另一方面是掌握地方的經商階級。水壑區的大小雜貨店超過 20 家以上，大的雜貨店指的是有販賣米、酒、咖啡豆、米粉等進貨價位較高且量大的店鋪，而小型的雜貨店則是指僅有販賣零食、菸、沖泡包等價位較低且儲放期限較長的貨物。不過這樣的分類是依據當地雜貨店規模作出的，對於鎮公所而言，任何進行買賣行為的商家都必須支付營業稅額。迪爸自 2008 年開始經營自家的雜貨店。迪爸說，在山上開雜貨店不容易，因為運費相對昂貴，而且貨品的選擇也必須是居民願意買帳的品項才可以。

上村的村辦公室書記 Sue 曾向迪爸告知要收取雜貨店的營業稅，當時迪爸表示自己的店鋪規模不大，僅是提供居民生活所需，倘若要課稅的話就要請鎮公所的承辦人員親自來勘查並且收稅。Sue 一時語塞，迪爸雜貨店的課稅進度也就此延宕。然而，位於下村的各家雜貨店就都逃不過被課稅的要求。被稱為全水壑區最大雜貨店的老闆 Kate 便曾就課稅一事向迪爸大吐苦水。大學畢業後回到下村與當時的英國籍丈夫共同創立這間雜貨店的 Kate 說，以前都是經營者自行到鎮上或是市區去繳營業稅，但自 2011 年市政府卻專程派了前來課稅的承辦官員，官員會親自勘查各雜貨店的規模大小以收取不等的費用。

對於居民而言，電力在風險考量當中被視為無害。因此電力供給之後，電力成為商品、文化載體存在於日常生活中。因為電力使用需要付費，因此電力是項商品，而且電力的使用必須搭配燈泡、電視機、充電器等設備，而這些都仰賴買賣取得。而文化載體是指電力傳輸之後的影像、音樂傳播，使得上村的居民在家裡就可以看見美國職業籃球賽或是聽見英國歌手 Lady Gaga 的最新專輯。然而，對於政府單位來說，電力是最好的管控手段。透過電力公司設置之後的資料可約略掌握村落的地裡形勢與家戶數。而且透過電視媒體也能傳遞國家政策和規範。有一次，迪家老六跑到鄰近省分去拜訪朋友，但是他卻接到鎮公所的來電通知說要臨時開會，迪家老六倘若要回來水壑區必須花上兩天的時間，因此他就將開會

通知擱置並且與友人們共聚。

直到他返回上村時，迪爸對他大發雷霆後他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由於鎮公所的人員認為老六無故不前來開會，因此在水壑區所接收得到的電視新聞和廣播節目中公開老六的姓名和照片，並抨擊他在工作上失職。看到新聞畫面的迪爸生氣之餘也頗為無奈，更別提老六覺得自己相當無辜。事發之際，迪家老六傳國際簡訊給我，簡訊寫道「我還能做什麼？我有大麻煩了。我上電視了，大家都知道我去喝酒了。我害我們家丟臉。」這是老六無數次未出席會議，但是是第一次被公開指責，而且是透過電視和廣播。老六說還好村裡有無線電視接收器的家戶不多，否則他可能就選不贏下次選舉了。雖然這件事之後，老六仍然沒有乖乖參加每一次的會議，但是他對於開會通知的過濾更加小心，「如果是要投票的就要去開會，如果只是例行的報告就不用去。」這便成為老六的新應對策略。

第三節、伴隨電力而來的間接影響

「電力叢結」的意思在於，電力並非單獨地現身，且電力所連帶產生的影響如綿延長流不斷。有些後續效應是直接影響，有些是因著電力而間接性的推動；例如在本節當中所要說的作物交換以及有/無形的交通往來，都算是間接性的連帶影響。但這些影響卻也對上村本身的經濟、地景、生態產生變動的推力。我首先先以周日晚間的周日禮拜來說明，直接地影響、間接地影響如何連帶地產生，以及間接性影響的深層重要性。

上村的電力供應後，居民們的夜間活動除了看電視、聽音樂、玩手機外，周日的晚上還能參與主日禮拜(religious service)。迪家五哥在 Tabuk 市完成浸信會(Baptist)系統的神學院學位後，便被指派回到上村佈道。上村原有兩座教堂，一座是在藏峰聚落裡的英國國教(Anglican)教堂，另一座是在綠聚落裡的天主教(Catholicism)教堂。這兩個教堂都會在周日一早進行主日彌撒(mass)，由各聚落中被指派的服侍人員代為宣教。雖然兩個教堂都沒有駐堂的神父，僅偶爾由區派的神父來此佈道；但是教會由村裡的長老們主持，仍為村落裡主要的信仰中心以及道德規範所在。五哥成為牧師(pastor)後，一心想在上村建立自己的教會，因此借用迪家的一樓空處作為禮拜堂。五哥考量到不與既有的教會體系發生衝突，因此特意選在晚間舉行禮拜。五哥說，「神祝福上村，所以讓我們能在晚上作禮拜，這是祝福(blessing)。」電力讓上村的周日夜晚有聖經的朗讀聲、有電子琴伴唱的詩歌聲。然而事實上，電力所帶來的影響是提供上村居民有更多的「選

擇」。夜間，上村居民可以選擇睡眠、參加教會、看電視等；在此之後，居民便能選擇要參加早上的彌撒或是晚上的禮拜，抑或成為天主教徒或是基督教徒。因著電力讓「可用的時間」(可以集體相處的時間)延長，也讓新的選擇(新教會)有了運作的空間。換句話說，電力提供多樣選擇的可能，也同時抹去舊有慣習的一脈相承。

接下來我以作物交換以及有/無形的交通往來說明電力所造成的間接影響。說明作物交換前，我必須先介紹上村、水墾區裡的雜貨店樣貌。山區裡的雜貨店販售的是山上沒有的商品。水墾區的雜貨店必須透過城裡的盤商進貨。貨品的輸送依靠每日往返於水墾區跟 Tabuk 市之間的 Jeepney。而村落和山下的買賣中介站就是沿著聯外道路而建的一家家雜貨店了。我認為，水墾區的雜貨店可被視為資本主義的在地化樣貌；因為過去山區的買賣方式以「跟著腳來的商店」為主，也就是說過去的買賣方式為兜售、依親屬網絡展開，同時也是訊息傳遞媒介、兩地友好的象徵。然而，雜貨店的買賣方式固著於一地，先累積資金之後進行投資、儲貨以及等待利潤回收。不過，雜貨店在地化的意思則是指，它也像是村內的臨時支援站；它因著居民之間的道義關係，提供賒帳、以物交易或是討價還價的買賣關係。上村的雜貨店經營者的「在地化」更為顯著；有的經營者是唯當顧客在屋外喊叫時，才放下手上的鍋鏟開門營業，有的經營者是按照農忙、農閒才決定是否開業，有的經營者則是有錢舖貨後才會不定期地開業。迪爸的雜貨店算是上村裡最穩定營業的一間雜貨店。我以迪爸的雜貨店作為以豆交易的說明現場。

迪爸的雜貨店進貨方式透過書信以及人工傳遞。每隔兩日，迪爸就會把錢跟進貨清單(其實就是一封信件)交給一早前往搭乘 Jeepney 的居民，再請他把錢和信件交給當日的司機，然後再由司機轉交給市區裡指定合作的商行。隔天再由同一位司機把貨物運回水墾區，而迪爸家裡的兒子們就會到下村去搬運貨物。迪家雜貨店常見的進貨品項為：糖、鹽、食用油、罐頭、香煙、成藥、雞蛋、米粉、洗衣粉、餅乾等日常用品。迪家自己生產的米偶爾也會在店裡出售。居民們來店裡買東西時，除了用現金交易之外，也可以用乾豆(dried beans)、白米、咖啡豆來換取，因此為「作物交換」。作物交換的頻率中，米的使用率高於咖啡豆、乾豆，這與上村的主要作物有關；而且多僅限以這三種作物作為交換，因為可長時間保存且可食用。居民之間的交換共識為，一杯(約 100 公克)白米可換 10 披索的商品，一杯的乾豆可換 20 披索，一杯咖啡豆可換 30 至 40 披索的商品(隨時價

而變動)。迪爸偶爾也接受居民拿手作掃把作為交換，但並不常見。因為手作掃把等同於現金(可賣)，居民往往將掃把賣到市區為取得高價，多是因為緊急需求才用來交換。如此看來，行之有年的作物交換在電力引入後產生了何種危機？

交換的危機在於範圍與頻率的不對稱。雜貨店經營者(例如迪爸)向山下的盤商進貨需使用現金交易；作物交換的範圍並不包括到城裡的盤商。而迪爸雜貨店裡，顧客們拿來交換的白米、乾豆、咖啡豆，除非有人剛好來買走，否則幾乎都被作為迪家的糧食而吃掉了。這些本來作為交換的作物被吃掉後，迪爸需要再用現金去向城裡的盤商鋪貨；如此一來，使用作物交換的循環，必須由店主挪用他處的現金去支出。這也就是說，迪爸無法透過作物交換的循環交換到盤商手中的各式商品。由於迪家的經濟資本較為穩健，而且迪爸一家所需的糧食多，交換來的作物正好作為糧食。然而，換作是其他的雜貨店經營者，或是經營小本生意的居民而言，以作物交換的方式會逐漸地瓦解他們的收支平衡。

就以迪家四嫂的大餅(hot cake)生意來說。四嫂在自家製作大餅並在村內兜售，深受好評。四嫂從市區購入麵粉、奶油、糖等材料，四嫂說：「一大袋的麵粉要 800 披索，再加上其他的糖、奶油，如果我要買齊全部的東西，我每次的成本都要付 1000 披索。」每次一千披索的開銷對四嫂家著實是筆不小的花費。四嫂作不到兩個月的生意後便決定歇業，她解釋：「大家都喜歡吃我做的大餅沒錯，我也覺得這樣可以賺錢。第一個月因為有軍人在村哩，他們都是拿錢跟我買，所以我有錢再去買麵粉。可是軍人不會一直在這裡阿。村裡的人大多拿米來跟我換大餅，可是那些米我只能煮掉，給家人吃，或是給豬吃。而我就沒錢再去買麵粉啦。還有木頭也是；我每天賣大餅，你哥哥就要每天去砍木頭，如果有賺錢就沒關係。但是沒賺錢的話，我們一直砍木頭、燒木頭也是很浪費。」用作物交換的循環，在四嫂的小本生意中就無法成形。迪爸跟四嫂最大的差別在於，迪爸握有的金錢與人力資本是作為支撐以物易物的關鍵所在，因此作物交換當中的現金缺口可由別處挪補。如此一來，居民可在雜貨店中交換、賒帳，而這正是雜貨店具臨時支援站的意義。

不過臨時支援站(雜貨店)並無法全面地支援學費、電費、稅收等費用的交換。在電力進入後，愈來愈多的各式消費隨之而來，電費、器材、周邊商品等都增加居民的現金使用的負擔。也就是說，當各家戶的現金需求都逐漸擴大後，作物交換的循環勢必更加萎縮，也就會造成作物交換的式微。一旦作物交換不再，

現金的收支就更加必要；也就使得勞作轉型、作物增耕、人口外流等現象相連接。我認為，這正是電力在上村現身後的間接影響之一。

除了作物交換外，無形/有形交通的交叉影響也可從電力觀察中發現。現代工程與交通方式無疑是一場科技競賽，究竟科技運用能協助地方發展？抑或是再現一場科技新殖民？「電」作為一項現代工程，當此工程的完工與輸送達到預期效果後，便會再帶動各項工程被實施的計畫和期待。其中又以道路修建、公共建設等工程最為顯見。¹⁴⁹



左圖 4-6：正在水墾區執行的道路擴寬與埋管計畫。

右圖 4-7：上村的水利工程實施現場。

水墾區僅有一條汽機車可通行的聯外道路，其餘皆是古道、山徑；整個下村的房屋都是緊連著這條寬度僅能容納一輛 *Jeepney* 通過的道路而興建。這條道路主要以碎石頭、泥沙鋪設而成，僅有少比例的地段鋪有柏油路面；¹⁵⁰但只要 *Jeepney* 抵達 *Lubragan* 鎮之後，便可沿著一路平坦的柏油道路通往 *Tabuk* 市。明白地說，道路的鋪設材質、平坦與否與該地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有著正向關係。¹⁵¹然而，就在電力設備興建前後的一、兩年間(約 2009 至 2012 年)，聚落的連外道路陸續有大小規模不同的修補、挖掘工程也開始進行。除了道路工程外，疏通渠道、挖掘灌溉水道等水利工程也不時在招募臨時工人。不約而同的是，

¹⁴⁹ 花叔說在 1960 年代時，*Tabuk* 沒有柏油道路可以連結到外地。貨物運輸必須從 *Kalinga* 省西南邊的城市運輸到西北邊的城市，再繞到東北邊運輸到 *Kalinga* 省內。

¹⁵⁰ 例如像是下村村長家前的路段就是一片平坦的柏油路，對於開設雜貨店的村長夫人來說，這個路段由柏油材質鋪設有利於 *Jeepney* 的停放以及雜貨店生意的運作。除了下村村長家前的柏油路面之外，由幾位當地教師所購買的屋舍的聯外小徑也鋪有柏油階梯。

¹⁵¹ 這層關係可能是親屬關係、利益關係、政治關係等。

這些工程的發放單位都是 Lubragan 鎮公所、Tabuk 市府。工程的承辦人員會透過地方村長、幹事的人脈招募當地的臨時工人。如此一來，與地方官員關係親近、互動良好的居民便有較多機會取得工作。

在這類皆由政府出資、地方官員居中協調的工程發放中，首先是讓當地的青壯年透過勞動換取固定薪資，而固定薪資正完全有別於當地農業生產、生態資源使用所獲得的彈性收入。再來，政府官員藉由市府、鎮公所、村辦公室的科層體制，便能遠端介入高地聚落的公共事務發展。也就是說，由政府推動的公共事務開發有利於政府撫平與山區之間的距離摩擦(distance of friction)(Scott 2009)。對於居民而言，「休息」則是減少與政府之間摩擦係數的技巧。居民透過「休息」避免落入這類工作中的從屬關係。迪家的小七參與道路修繕工程時，總是按著自己的節奏工作與休息。他說自己只願意在「天氣好」的日子工作。天氣好不全然指得是天氣，有時還包括心情和身體狀況。不過他不去工地的日子裡，他仍會照常到後山去餵食與照顧水牛。這件他在家戶分工中所負責的「工作」，是不管天氣好壞、假日與否等都不構成阻礙他的因素。因此，在從屬關係強烈的勞動工作中，小七透過「休息」取得自身的空間。

在道路陸續修復完善之後，水墾區的各式活動與集會便也逐漸興起。舉例來說，像是 2012 年 3 月初便舉辦了水墾區第一位原住民籍神父的授禮儀式(ordination)，此儀式邀請了多位從馬尼拉等各大城市的長老級神父、外國籍神父前來參加，以及鎮長、市區教友、親友等到水墾區共襄盛舉。期間，在聯外道路上停滿了各式的私人汽車、公務車和 Jeepney。這些人潮來去都仰賴道路修建工程的實施。另外，居民也指出鎮長在近來頻頻訪問水墾區，經常來此地參加婚禮、喪禮、教會等儀式活動。

除此之外，從下村通往上村的山間小路，也因著鎮公所對於各聚落的公共建設計畫而重新鋪設了好幾個路段的水泥階梯。就連在藏峰聚落裡面，也能看見由鎮公所主導的公共工程興建。由於藏峰聚落的房屋建築如同坐在不同層的梯田般有高低落差，而不同坡度間的通道就以石子階梯作為連結。不過就在近幾年所搭建的新房屋之間，可看見水泥鋪設的平坦、工整的階梯地貌。據說，這些新鋪設的階梯都是由鎮公所出資，由村長決定使用方針以及規劃。這類款式的階梯在聚落內顯得相當「整齊」，不得不讓人關注到這類建材的使用與出現。而上述的這些例子明顯地就是透過無形的交通帶動有形的交通。其中無形的交通所指的手機

通訊、協商工程、政治運作，而有形的交通正是人群流動、建設增生、來往熱絡等。

對於鎮公所而言，水墾區的電力架設就像是一個偉大的功績。在電力安裝完畢後，他們所期待的「現代性想像」就近在咫尺。原住民籍神父的授禮儀式(ordination)中，副鎮長與其秘書就坐在會場的一邊，對現場所用的大型擴音器、音響、麥克風等設備讚許有加。副鎮長認為這些設備有助於儀式的進行，且讓儀式的場面更顯澎湃。這場授禮儀式在白天舉行，照道理說，水墾區的白天是不會有電的。但是這場授李儀式便在鎮長、副鎮長的開通下，讓水墾區在白天也有電力可用；讓一直以為被視為與政府關係交好的地方教會更添光彩。¹⁵²

另一有形的交通，是我在第三章提到過的地熱開發。隨著水墾區愈趨開放(與外界交通往來頻繁、符合現代性想像)，鎮公所以及奇蹟公司對於地熱開發的實施進度也隨著加速。每回當奇蹟公司召開開發說明會時都會透過鎮公所進行聯繫，聯繫對象為村長、村幹事們、耆老等。鎮公所聯繫的方式除了書信，便是手機簡訊。會議召開地點會選在鎮公所，或者村長家、學校教室、日照中心(Day-care center)等場地。¹⁵³迪爸和老六正是奇蹟公司認為應當邀請的與會人選。從老六某次的會後心得中，可看出電力在地方發展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他說過，「每次有美國人或是地熱公司的人、外國人來水墾區的時候，A 公司的手機訊號就會一整天都不能連結，只有 B 公司的手機還可以用。¹⁵⁴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 Lubuagan 的人會派人去把 A 公司的訊號(基地台)打壞掉，因為他們知道 NPA 都是用 A 公司的訊號在聯絡。然後鎮公所的人跟我們連絡都是用 B 公司的手機打電話。等到外國人走，或是會議結束之後，A 公司的訊號就會自動好了。」鎮公所擔心躲在水墾區的 NPA 會暗中攻擊會議現場或是外國商人，於是會透過破壞基地台來阻斷 NPA 之間的聯繫。言下之意就是說，電力訊號的供應也成為鎮公所與 NPA 之間攻防的武器之一。

第四節、抵禦策略

電力滾動了上村的內/外變遷，使得上村被納入政治經濟再疆界化的狀態。然而，上村的邊緣位置以及對環境主權的爭取，仍使上村孕育出在地的抵禦策

¹⁵² 菲律賓的政教合一統治策略自西班牙殖民時期便展開。直到戰後，天主教教會仍在菲律賓的選舉、社會政策、國家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吳宗龍 2009)

¹⁵³ 若開會場地選在鎮公所，奇蹟公司便會派遣專車來水墾區接送與會人員。

¹⁵⁴ A 公司和 B 公司為菲律賓的電信公司，在此以代號稱之。

略。必須說明的是，上村的抵禦並不是反對政府、反對地方變革；而是企圖維持在地安全、在地發聲的可能。上村透過距離的阻斷、非政府組織(NGO、NPA)的隱/現身、創造在地經濟價值等策略，目的正在於捍衛養育世代的層層梯田。上村居民對於聚落生態的觀念首重安全，而安全也就是維持和平、不飢餓、不恐慌等意思。村內關係緊密且家戶生計相連，因此即便居民間、親屬間任何的意見相左或是衝突，都必須很隱晦地陳述或是規避。因此，上村的居民內部很少發生顯見的爭執或是鬥爭，即便內部分歧存在。

舉例來說，每三年一次的地方村長、村幹事的選舉期間，村內的各個候選人維持表面上的尊敬，事實上他們都必須隨身佩槍且避免單獨行動，未免遭遇不測。選舉期間，各家戶的男人日夜輪流看守，村裡的燈火不滅。從老六過去的參選經驗中，他說「我正要去隱聚落拉票。天已經黑了，但我還是一個人出發。結果我在路上，遇到另一個候選人，他們有七、八個人，圍著我，問我要去哪裡。我說要去隱聚落，他們問我去幹嗎？我就說我去喝咖啡。他們也不能說什麼，可是其實我知道他們可能想殺我。我不緊張，我身上也有槍。而且我比他們更會用槍。等到我們抽完一根菸之後，他們要回藏峰聚落，我看他們走遠，就用很快的速度趕快跑到隱聚落的朋友家躲起來。」選舉，是村內利益重新分派的關鍵時刻。因此，由選舉而生的衝突與緊張是在所難免。不過當雙方皆以聚落安全、和平作為核心價值時，破壞安全共識的居民可能會成為眾矢之的。因此老六也說，「可是選舉不是最重要的，大家都只是想平安地度過選舉。雖然我也會想贏，雖然爸爸曾經擔心過我選輸會做傻事，但是我不會傷害我們的人。我知道他們也不會。¹⁵⁵」雖然聚落裡也會有利益糾結，但是上村仍為一個集體維繫的共同體，以此來避免危險。既然上村仍保其集體意識，但又在不同的時期面對各方力量的擾動。上村居民一方面想維繫地方安全，一方面又必須面對現實生計的問題；在手工掃把的例子裡，可找出上村保其生態安全之道的策略。

「手工掃把」的出現是居民在經濟與生態上所協調出一條路徑。手工掃把的主要材料是老虎草(*tiger grass*)與籐(*i-woy*)。¹⁵⁶老虎草的特性在於易種，只需將種子灑落在沒有農作物的土地上，不需要任何肥料或是照顧就能自行生長。這對年輕勞動力外移的高地聚落而言，只需土地成本的方式無疑是最好的作物生長模

¹⁵⁵ 老六的「他們」是指所有的候選人。

¹⁵⁶ 老虎草的 *Lubuagan-Kalinga* 語稱為 *talaga-jew*。

式。因此，居民在每年八月播下老虎草的種子之後，隔年的二月份開始便可以採收老虎草，產季會一直延續到四、五月。採收完的老虎草需要曝曬、收整長度後才能進行編織，而品質的優劣關鍵就在於曝曬的時間足夠與否，再來才是編織技巧的好壞。老虎草可儲藏的時間相當長，甚至有些家戶會囤積老虎草直到淡季才使用或是出售。



上排左圖 4-8：採收畸零地上的老虎草。

上排中圖 4-9：正在曝曬中的老虎草，充分曝曬才能成為不易發霉的掃把製作材料。

上排右圖 4-10：此步驟是手工掃把的前置作業—刨籬。

下排圖 4-11：幾位上村男子正共同製作掃把。

老虎草不僅不影響到原有農作物的生產面積，也不抵觸耕作時所需的人力耗費。花叔說在西元 2000 年之前，聚落內並沒有很多人在做掃把，因此掃把不算作是當地「傳統」的手工藝品，而是在地方政府鼓勵發展地方特色產物以及各方集思廣益之下才有「手工掃把」這項產品。其實不僅只有水墾區的人會做手工掃把，在整個 Cordillera 山區各地都有不同款式的掃把在市場上販賣。而掃把之所以成為重要的地方產物原因在於生產成本相當低，只需要購買老虎草的種子，甚至是向鄰居、親戚借種子之後，於每年的八月將種籽種在稻田旁的畸零地上、山

坡路的懸崖邊等不阻礙原農作物生長的土地上，並且只需讓它自然生長，等待來年的春天來臨。老虎草早收的話可以二月就收，一直到四月、五月都不會枯萎。因此在生產成本極低的前提之下，家家戶戶便會將掃把視為是每年額外的收入，而生產掃把的月份也逐漸變成各家戶有較多現金可使用的月份。

然而，手工掃把的生產多仰賴男性勞動力，要刨籐、編綑、塑形，其中的技藝知識多是男子之間互動傳授，尤其是特殊編法的教授更是某些家戶才特有的製作技法。在迪家，迪爸偶爾會去採收老虎草回來家前的小空地上曝曬，由三哥去砍竹籐回來作為掃把的材料之一。竹籐以及老虎草都要充分曬乾之後才能作掃把，否則很容易發黴；因此好的手工掃把品質一方面仰賴人為、一方面仰賴天氣上的賞賜。迪爸家由於還有經營雜貨店，因此在掃把製作上的數量以及效率較低。反觀花叔家，在老虎草收割季節幾乎是全家男丁都投入製作掃把的行列，甚至聘雇鄰居或是親戚家的男性來幫忙製作，他們還曾在一周內由五位男性編完一百支的掃把，再交由聚落裡的親戚到城裡兜售販賣。

每戶人家所製作的掃把，有些是靠自己搭車搬運到 Tabuk 市沿街叫賣，有些人是委託在市區熟識的店家寄賣；除此之外，聚落內也有幾位專門收購掃把的婦女把掃把帶到外地去賣。到外地賣的好處在於價格較好，在 Tabuk 市一把掃把 120 披索，再到更遠的一級城市去的話可賣到 140~160 披索。不過其缺點在於等待的時間較長；收購者並不會先支付費用，而是全數賣完之後再回來付帳。花叔說，有些家庭就缺米，因此把做好的掃把賣給收購者，再由收購者回來時一併買米回來。因此，現金急需者通常都是選擇自行去兜售，又保險且現金回收快；再來才會選擇交給在外地兜售的人去協助販賣。¹⁵⁷賣掃把的收入通常是一年當中相當值得期待的一件事。

除了手工掃把之外，我認為居民也善用「距離」作為抵禦的策略。例如掛在迪家陽台上的手機；迪家兄弟們的手機會因著每日不同的收訊狀況而調整擺放位置。不過考量擺放位置時，不會考慮放在每個人自己的口袋裡。因為在室內、走動時都不易接收訊號，如此一來，手機不會隨著使用者的移動而變化太多。手機就像是傳真機一樣，手機的主人會在中午時、傍晚時來查看手機的訊息或是來電。因此，任何「即時」的通訊需求都可能就此截斷。在通訊兩端的時間接應上

¹⁵⁷至於不急於生產掃把的家戶則會在產季快結束時才採收老虎草。因為在生產旺季時的掃把價格很難抬高，因此無現金使用焦慮的人便會延遲編製掃把的時機。

產生落差，也就使得任何緊急或是臨時的訊息無法有效傳遞。而這也就成為上村在通訊產品使用上的特性。如此這般的「落差」有時便可以成為抗拒他者要求的理由之一。身為地方幹事的老六，往往就會在收到鎮公所的開會通知簡訊後仍置之不理，說句「一樣的會要開幾次？」然後就當作沒收到簡訊一般。在這之後，若是有人問他為何沒去開會，他便會以「手機沒訊號」當作理由。除了手機沒訊號外，沒有 Jeepney、沒有網路、沒有報紙等被視為不方便的限制，反倒都成為上村的周璇事宜上的另一個堵牆。

在上村的買賣互動中也同樣地產生居民之間讓渡和抵抗的角力。雜貨店一方面成為居民轉變社會地位的工具，成為一名有資金可營運雜貨店的經商者。但是，有的雜貨店何跟著腳來的商店僅是為了獲取基本的收入，並非為了擴大其營業和獲益作為本意。因此，讓上村的買賣交易仍可維持有別於資本市場的純交易行為。在上村做買賣，除了掙錢外也可以通絡親屬關係、連結地域訊息以及增加外出經驗。並且，買賣的路徑依循古道而走，如此一來在外部的道路或是資源挹注有所斷裂之時，上村仍有古道的買賣途徑可尋求協助和疏通。最後則是政治部份，上村居民表述他們自己是菲律賓國民、但也同時需要 NPA 的言談，讓我看見上村位處在兩股勢力拉拔的現場。而勢力拉拔的過程中，產生了上村得以生存與游移的縫隙。而上村居民在生計、生態上的選擇多是來自於避免失序的安全性考量，在其抵抗策略中很重要的目的是要拒絕貧窮和危險。

第五節、小結

電力所帶來的並非眼前可見的改變，其最大的影響在於化學效應般的變遷加速感。電力讓外部的消息無法被中途截斷，透過電力線路可以直抵各家戶。再者，電力讓資本主義精神的擴散更深廣，原先透過教育、移動人群的買賣而被潛移默化的精神思想，現在透過更無威脅感的廣告、節目和電影進行移植，進而重組山區的經濟、勞動與消費等文化模式。在電力即商品的研究過程中，我認為水墾區的村落所面臨的「鉅變」並不是在於電力，而是勞動轉型、作物商品化、全球連動的形成。

在水墾區的電力使用經驗中會發現到科學技術、產品的降臨並非突如其來，且科技的傳遞與影響需要人、技術與物的共同存在與交互作用來達成；三者當中，透過「人」的移動與使用經驗是最快將科技廣為流傳的方法之一。隨著居住在水墾區的人們四處工作、移動，使得水墾區與科技的相遇並不僅限在於本地的

硬體設備改變之後；當人們因著移動而帶入出水壑區的敘說、觀念與物質都會對當地居民造成些許的想像，進而期待與習慣。電力(電線)的切割與使用，使得不同世代間對於聚落生活的感受與接觸有著不同的圖像。年長一輩的人對於電力與電子產品的使用可有可無，他們對於聚落的想像是平面式，家族內的縱軸關係、家族外的橫軸關係都是他們關照的聚落生活情境。不過，對於熟用電子產品的年輕一代(多指未婚男女)而言，電力的使用切割掉他們在聚落內無需直接面對的關係，但電力產品使得他們對外的關係更為無遠弗屆，可以連到他們從未真正親臨過的他方，創造出有別於上一世代的生活圖像。

當我在思考上村是否因著電力使用而鬆動其內部關係時，發現到以親屬作為黏著劑的村落內部關係是不易瓦解的。再加上居民目前對於電力的依賴感很低。例如停電、電力晚到等情況時，居民的反應都很淡定。更重要地是，居民也不會顯露出欣羨外地穩定供電的生活。即便鎮公所、近期到水壑區投資地熱開發的奇蹟公司都紛紛向居民保證「24 小時」供電的未來支票。不過穩定供電以及有效與外界連結的承諾都不受到居民的青睞。因為電力之餘他們尚未是必需品，他們可以選擇不買這項商品。只要居民仍握有自身能動性，失去電力的同時但不會失去掌握訊息的能力。總地來說，電力與各項物質需求確實帶來聚落內的改變，不過由於位處山區的特殊性，導致其造就變動的機會與條件有所削減；因此，電力條件、物質產品對於高地聚落的滲透性顯得較為緩慢及有所阻礙。

電力的出現是一個現象與媒介；村落改變的起點早在電力來臨之前就已經發生。因此，村落裡的變動力量不曾間斷，透過生活中的各式細節與歷史經驗進入了水壑區。而不變的是，上村以安全作為制衡策略是；透過農作、買賣和政治所構築的生態網絡讓上村維持其平衡。

第五章、結論

本文透過對電力的延伸觀察與分析，嘗試理解 Kalinga 上村在全球政經力量下的邊緣處境：不同時期的殖民、國家霸權皆在 Kalinga 的地圖上劃出不同形狀的邊緣界線，並驅趕、分類此地居民。然而，「邊緣」地區，其實一直都不是固著與封閉的地方。Kalinga 各地區之間始終透過買賣、親屬網絡、和平協定等方式互通有無，並與低地之間長期交易資源和有價物品。而如本文所展示，此地也未曾停止與國家與資本家共織的政經佈局與金權結構產生互動。

從不同的歷史時期與電力事件中可看出，位居邊緣的上村經歷以槍桿抵抗資本開發走到如今的電線桿林立，從一顆顆乾豆的交換買賣轉變成為計算一塊塊的現金硬幣，也從反叛國家到生成在地的制衡策略。換句話說，上村從未停止改變，上村如今的樣貌正是不斷因應變革所形成的。上村一再被國家治理的視角所鄙夷、被資方金權結構所利用、被國際市場所影響；但是也正因著上村位居邊緣，居民在與資本與國家的生存保衛戰中增添了時間與空間上的摩擦係數。我們或許可以說，佈滿上村的梯田，正是邊緣抵抗策略的最佳象徵。這些梯田在開發無限化的資本家、現代國家擴張者的眼中顯得無用且浪費；然而對上村居民來說，梯田卻鞏固了山區的資源循環以及保障居民的生態安全。上村和梯田是並蒂的存在；上村的邊緣位置正是它的主體所在。

我對本論文的結論分為四部份。第一部份將總結出 Kalinga 上村的歷史脈絡，並總括上村如何在電力安裝過程中被理解與定位成為「邊緣」的「他者」。第二部分談述從無電到有電的上村，所經驗的變與不變，並指出生態安全對於上村的重要性。第三部份則是提出未來的研究展望。最後，我將再思「邊緣視角」的必要。

第一節、從槍桿到電線桿

本文所研究的 Kalinga 是個自然資源富饒的所在，它擁有金礦、銅礦、山林、地熱以及豐沛的水資源。據 Welman 指出，整個 Cordillera 山區(含 Kalinga)所擁有的水資源負責供應全菲律賓的電力達 56%；且 Kalinga 為主要河流 Chico 河的發源地(2012:14)。然而，自西班牙殖民政權覬覦此地的金礦資源開始，就透過種種治理手段輸出、奪取山區的資源，挹注入金權中心、國家首都、國際競爭等開發需求。若不願配合的 Cordillera 山區居民群起反抗，便會被貼上「野蠻」、「蠻

荒」的標籤，西班牙殖民政權便以「獵頭者」(headhunter)汙名化這群擅於保衛家園的山區住民。菲律賓國土之後輾轉被美國、日本所侵略，殖民帝國透過國家機器、資本企業、教育贊助等漫天地搜括自然資源。迄今，這些強權國家仍在國際政治關係中透過與菲律賓政府「合作」的方式參與在山區的開發行列中。在此脈絡下，「電」成為統治手段。

值得提出的是，透過對於上村的觀察，本論文發現在電力來臨前的上村居民早已不斷地跨越地理上的距離，到過城市、首都、阿拉伯、韓國、台灣、美國等地方工作。上村的人力和物力早已融入跨界的循環當中；甚至在電力安裝之前，上村就已經知曉各式電力產品的使用以及共享其經驗。因此，它們的疆界與互動模式也就一直都是動態的、延展的、遠長的。並非如同住在低地者所認為的封閉的、獨居的、排外的。然而，反倒是從國家、資方和外部的視角來看，上村在電力供應之前似乎就像是一團的黑暗般；且他們同樣地認為上村唯有在安裝了電力之後才被納入「現代」、「發展」等被社會建構的接受界線範圍內。

電力是一種新治理計劃。¹⁵⁸從無電到有電的過程，正是國家政經與金權體制插手握權的好時機。在 Kalinga，居民、國家與資本家對於在地權益/權力的爭奪一路從槍桿對峙到電線桿：殖民時期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早以槍桿進行武力戰爭，而今槍桿的征戰在北呂宋地區尚未停歇；然而，更不顯見的治理與統治手段已化作一根根如國旗般佇在各個村落裡的電線桿。透過電線桿，國家的治理邏輯和信息輸送可透過媒體管理，且電線桿甚至取代地方與地方之間的連結(親屬、買賣、援農、交工等)。地方與地方之間的地域性關連一旦斷裂，金權便可依循斷裂處逐一滲透。更甚者，居民倘若不願接受電線桿的治理與管理，便會被藏在背後更具毀滅性的槍桿所脅迫。

槍桿與電線桿的統治並非隱喻而已，而是 Kalinga 的當代處境。自 2010 年有電以來，電力開啟了水壑區數條無形的聯外道路。上村的「原始」、「與世隔絕」的標籤似乎拂袖而去，因電而一腳跨入了「現代性」的想像範疇之中。然而電力的輸入並沒有翻轉上村長期電子資訊接收不良、電話費用昂貴、電力產品不易購得等問題；反而地，上村因著電力的使用，更加拉近鎮公所控制此地的距離。居民因著現金需求增多而使得農產品競爭加劇。這些影響都再一步地將上村推入政經邊緣的夾擠地帶。無電村時期，上村內部與外部的連結透過道路、人流、親屬

¹⁵⁸發電需要科學計算、技術與資金。

等脈絡；上村成為有電村後，電力所帶來的媒體、外資、發展則不約而同地促進上村的變貌。從槍桿到電線桿也反應出國家治理愈趨算計、精緻管理的過程。

第二節、從抵抗到制衡

上村雖為一座位居山區的梯田小村，但蟄伏於此的有國家(鎮暴軍隊)、NPA(新人民軍、反政府軍隊)以及在地政治團體(主要成員是居民)共三股政治力量匯聚與相互摩擦。我將這些摩擦過程稱為上村的日常生活游擊戰。這三股勢力分別透過不同的團體顯現，不同團體也會隨著事件轉換彼此關係，形成三股勢力間彼此抗衡的「作戰」狀態。作戰的範圍與方法皆不限於戰場、深山中，而是透過日常生活中偶有的互動、刺探而產生關係決策。

我發現，1980 年代的發電計畫是金權統治介入的表徵性事件，當時引發居民反感起而損毀電線桿、電路。¹⁵⁹當時的居民把電力視為具生態侵略目的的一種危險武器。¹⁶⁰相較於 2009 年，水墾區居民交叉討論電力裝置以及電力使用經驗，此時的電力需求是由居民內部提出，因此不再具有「危險」的指證，並且也去政治化。居民認為電力帶來「便利」的通訊、媒體與動力，因此決定共同安裝電力。然而水墾區居民沒想到的是，電力竟在地熱開發案當中，再度暴露其政治性：水墾區電力的完整提供成為交換地熱開發的條件之一。甚至，國家與資本家協同演出，先由官方扮演無法全面供電的黑臉，再由資方扮演無論如何都會協助居民取得電力資源的保證者。因著遭受威迫，居民便再與 NPA 形成制衡金權行動的結盟關係。

夾處在國家軍隊以及 NPA 之間的 Kalinga 當地居民之所以能發揮制衡力量，正在其內部的異質性。不同的居民背景分別與不同的政治勢力溝通、連結，使得上村內部可有效收集各方的行動與意見，並且居中制衡。在我的報導人當中，花叔便是屬意投靠政府勢力的角色。他會為了政府政策在村內極力護航，以及宣告政府執政的正當性。而迪爸則是與 NGO 團體往來密切，更在上村籌組在地的 NGO；因著 NGO 與 NPA 之間友好關係，迪爸被視為靠近 NPA 勢力的一員。而老六的角色就更加游離，他身為上村的地方官員，且參加過國家特種軍隊的訓練，但是他私心想加入 NPA 參與作戰，他的好友名單(手機聯絡簿)中正有軍隊友

¹⁵⁹ 此指的是第三章中提到的 Bation- buhay 電塔。

¹⁶⁰ 當時的電力主要設置在金礦場、水源地以及市中心等地方，NPA 便夥同居民群起反抗當地資源的輸出。

人和 NPA 友人。

雖然在國家統治集團眼中，山區的居民與 NPA 是共謀的反叛者，但事實上，居民和 NPA 之間，並非全面相通的兩個社群。由於 NPA 的身分易遭襲擊，因此出沒無影無蹤；在上村裡，僅有少部分的人與 NPA 之間維持友好關係，只在必要時期尋求 NPA 介入地方事務。另一方面，NPA 也會透過合法的 NGO 與山居村落牽線(更有人說，NPA 就是 NGO 的地下軍隊)。¹⁶¹山區的鎮暴軍隊和 NPA 是對峙團體，他們同時也分別懷疑山區居民中混藏著對方的眼線與勢力。但是基於維持居民對於自身的支持，雙方都不能隨意動武。¹⁶²如此，居民便有空間可以做政治轉圜。上村居民斡旋兩方勢力的目的並不是掌握政經實力，而是為了在夾縫中維持自身的穩定與安全。

上述的日常生活游擊戰場除了體現於政治關係，也體現在生態環境。透過文獻可知，Kalinga 一地居民因著語言和地理位置相近而被分類成為一個「族群」；事實上，Kalinga 內部的分歧與地域異質性很高(Dozier 1967)。¹⁶³不過以整個 Kalinga 來看，境內自 1980 年代起陸續興起反對興建 Chico 水庫、輸出金礦、開挖地熱等在地行動，這些抵抗正凸顯出 Kalinga 對於其在地主權、自然主權的堅持。Kalinga 居民對於其自然主權的捍衛其實與在地的經濟循環、生存保障有著高度相關性。誠如我提出對於梯田經濟的觀察，在外來者看似荒蕪的畸零地、使用成效低的自然林，都因著與稻田之間的互補性、水土保持等功能，成為山區居民維持生態與經濟安全的基礎。因此，任何危害到梯田、山林、村落的開發計畫都是直接影響居民的生存、居住以及親屬網絡的。也正因為居民對於地域完整性的看重，Kalinga 才會在歷史上經常被視為「兇蠻」的人群。

隨著現代化的治理腳步到來，Kalinga 也不再時時與外來的官、資方團體處於緊張關係。例如水墾區便也曾與鎮公所合作，進行一項借水的工程計畫，目的是為了將水墾區的豐沛水流引到缺水嚴重的鎮上。這項計畫使得上村鄰近的山林被劃開一條用來埋入管線的土黃色痕跡。這個計畫之所以獲得居民支持的原因在於，水墾區與鎮上多有遠房親屬的連帶關係，且輸水管線不會破壞原有的梯田、

¹⁶¹因此，Cordillera 地區才會不斷傳出有 NGO 領袖遭受國家迫害、掃殺的消息。

¹⁶²軍隊為了確保國家出兵的正當性，他們必須以不濫殺無辜以獲取民眾的信任與支持。而 NPA 在山區的生活，經常仰賴不同村莊的接濟與援助，且 NPA 號稱是人民的軍隊，所以他們更不會和居民之間產生嫌隙，更別說是武力相對。

¹⁶³不同的地區就有不同的「規矩」，各地區和各地區間皆有不同的親家與仇家。

村落。也就是說，水壑區(上村)對於生態資源的輸出入也並非是絕對地抵抗，輸出資源也可成為制衡雙方關係的一種手段。老六就曾說，「若是有必要的話，我們也可以不要供水給他們(指鎮上)。」老六所說的「有必要」，也就是當上村在安全(經濟、政治、生態)上出現危機的時刻，水壑區就會切斷輸水的管線作為反抗。而這條輸水管線也就成為制衡、談判的條件之一。

在電力來到上村之後，上村居民也在電力使用方式中發展出制衡的方式。由於上村尚未 24 小時全面供電，電力的使用也未完全地普及(仍有居民未使用電力)。因此，水壑區仍保有其原有的網絡關係、信息來往方式，居民仍有拒絕電力的空間。但是另一方面，電力也適時提供居民進行政治串連、國際訊息接收、即時新聞等。在此電力由上而下的統治性質，也被翻轉成為居民的抵抗與制衡工具。我由此歸納出上村的邊緣(者)能動性以及主體意識。位居邊緣也可以形成一個戰鬥位置，透過不同的行動與策略展現其自主的可能性。

我對於 Kalinga 上村從抵抗到制衡的思想軸線，是因著 Scott(2009)對於東南亞高地抵抗形式的分析，而再作進一步的推論。Scott 指出高地居民在政治形態上的游離與高度變動，他認為高地居民、村落透過日常的持續抗爭，形成抵抗、逃離國家控管的聚散伸縮形態；而國家的控管手段卻又是無孔不入地進逼。在我對於上村的研究來看，國家控管的手段未曾停歇過對於山區居民的介入、擾動。而山區居民除了反抗、判逃國家的控管外，更想反抗外力透過任何形是造成自身安全的威脅。因此，除了反抗之外，當多重的政治勢力相互抵觸、對峙時，也就讓山區的居民產生在各勢力中制衡的空間。居民除了抵抗外，可以談判、結盟、斡旋於多重的政治勢力間；並且策略性地選擇有利的生存形態。因此，我認為除了各式的抵抗方法，山區居民已更有意識地在多重勢力中產生制衡的策略。

第三節、未來的研究展望

我認為本論文還有相關研究面向值得繼續探索。首先是女性的部份：上村裡的女性在勞動、親屬、買賣等互動關係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甚至是許多地域往來的牽線者。我在上村期間觀察到，女性們比起男性們更容易與外來者產生交集，原因在於女性們在家屋的時間較多，因此外來者較易找到他們對話。由於當地女性親友間相串拜訪的機會也較多，透過女性們所掌握的訊息、述說也對於理解整個地方的連結極具幫助。於此，我認為該地的女性口述史和相關研究觀點是日後研究開展可以切入的路徑。

第二則是跨地域的村落關係探究。本論文因研究限制僅以單一村落作為研究地點，倘若未來的研究方向能擴展到鄰近村落與區域，並整合成為在地的述說觀點，就能讓山區的跨域與變動特質更為突顯。

第三同樣是跨界的研究展望。我認為在 Cordillera 不同地方、不同經營者所運作的 NGO、NPO 也是未來相當重要的研究對象。各地的 NGO、NPO 除了成員不同，組織內部與不同國籍背景(美國、德國、日本、加拿大、澳洲等)的連結也會生產出不同的影響和策略。各組織也分別執行醫療、信仰、農改、農技、教育、人權等計畫。因此，NGO、NPO 可說是 Cordillera 山區一股密織於在地的影響勢力。以世界主義(cosmopolitical)為號召的 NGO、NPO 在此地的正當性以及與各國政經結盟是否滲透在地，是我認為日後可再深入探討的面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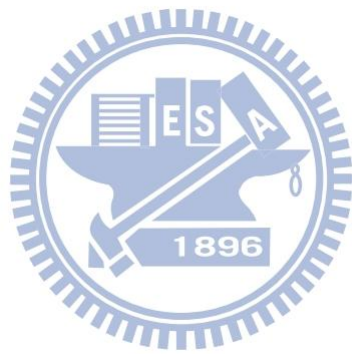
第四節、再思邊緣性

「邊緣」是相對於「中心」所形成，「邊緣」也是界線的反射；「邊緣」的想像通常對應出有別於中心之外的種種。因此「邊緣」是社會建構的，也是被想像的、被劃界的。事實上，邊緣與中心、邊緣與邊緣都是相互牽連與餵養，並且有著盤根錯結的連動關係；也就是說邊緣與中心是共同的存在。

我從 James Scott(2001、2009)講述的前現代 Zomia 高地，再到 Tsing(1993)談及 1980 年代的印尼高地族群，接連到本論文所談 2010 年的菲律賓高地。Scott 指出 Zomia 的生存邊緣處境，他並認為「邊緣」是居民為了自保而選擇的戰略位置。而 Tsing 則透過印尼高地族群談述文化與政治的邊緣性，他透過論述邊緣性來建立連動關係並指出不同力量之間互動的持續狀態(1993:9、90)。而我在本論文中所說的邊緣性，主要是指位居邊緣地帶的在地社群會透過自身的能動性對整體環境和社會關係產生連結。也就是說邊緣社群內部的能動性會對於在地環境、社會關係產生多樣的影響，也會跟不同範疇的政治群體有所連結。由此可見，在不同時代與背景下的邊緣性內涵不斷的流變，但還是可以看出邊緣性的複雜與意義是從未消失過的。

我透過 Kalinga 的上村，看見它從未停止過與各式來自內/外部力量的遭逢。這也是為何在我理解上村的同時，我也必須照看菲律賓的殖民史、山區的政治經濟情勢以及梯田生態的重要性。就如同電力在本研究中的角色一般，它牽扯出的不僅是上村內部的社會與文化面向汰變。電力現身、供應與來源的背後都是一連串複雜的政治經濟算計。電力影響著國家與國家之間、國家與地方之間、地方與地方

之間的關係。另外，電力也影響著當地的政治局勢、經濟脈動、生態平衡。如此來說，上村的電力消長過程正是複雜又多舛的國家治理與地方抗爭史。正是位居政治經濟邊緣的上村，讓我看見金權中心所不願承認的假象；也是上村讓我看見，屬於上村的邊緣特性正是透過人民與在地環境的緊緊扣連而得以生成。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Appadurai, Arjun

2009 鄭義愷譯，《消失的現代性》，台灣台北：群學。

Bert, Wayne

2003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孰能勝出：美國與中國在東南亞之爭》。台灣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Leach E. R.

1999 張恭啟、黃道琳譯，《上緬甸諸政治體制：克欽社會結構之研究》。台灣台北：唐山。

Marx, Karl

2006〔1975〕 郭大力、王亞南譯，《資本論》第一卷。中國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Polanyi, Karl

1991〔1944〕 黃樹民等譯，《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台灣台北：遠流。

Rosaldo Renato

2012〔1980〕 張經緯、黃向春、黃瑜譯，《伊隆戈人的獵頭——一項社會與歷史的研究(1883-1974)》。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Steward J.

1972〔1955〕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中譯本：史都華，1989〔1955〕，《文化變遷的理論》，台灣台北：遠流。)

Scott James C.

2001〔1979〕 程立顯等譯，《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中國南京：譯林出版社。

SarDesai D. R.

2001 蔡百銓譯，《東南亞史(上)(下)》。台灣台北：麥田。

丁匡華

1959 《中共在東南亞》。台灣台北：丁匡華。

何曉東

- 1976 《菲律賓古近代史》。台灣台北：三民書局。
- 李異平
- 2000 〈從馬科斯統治下的電信業看菲律賓與美國的依附關係〉。刊於《東南亞研究》，中國廣東：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1：25-28。
- 沈紅芳
- 2001 〈埃斯特拉達：菲律賓特色民主的產物與替罪羊〉。刊於《南洋問題研究》，中國福建：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2:28-26。
- 吳宗龍
- 2009 《戰後菲律賓天主教會與政治發展》。台灣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孫建黨、戴錦波
- 2011 〈美國政府、NGO、跨國公司在菲律賓綠色革命中的角色與作用〉，刊於《東南亞研究》。中國廣東：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6:42-47。
- 許峻賓
- 2012 〈菲律賓再生能源發展〉。刊於《廢棄物能是資源—「區域能源整合」國內外成功案例》，7：28-30。台灣台北：經濟部能源局。
- 陳烈甫
- 1969 《菲律賓的資源經濟與菲化政策》。台灣台北：正中書局。
- 1983 《馬可仕統治下的菲律賓》。台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1988 《東南亞第一位女總統柯拉蓉(Cory)艾奎諾》。台灣台北：台灣商務。
- 陳鴻瑜
- 1980 《菲律賓的政治發展》。台灣台北：台灣商務。
- 陳衍德、楊宏云
- 2008 〈美國的新殖民主義與菲律賓民族主義的回應 1898-1935〉
- 彭慧
- 2010 〈試論當代菲律賓國內的三種政治型態〉，刊於《東南亞研究》。中國廣東：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6：11-36。
- 張清柏 譯
- 1989 《菲律賓短篇小說精選》。台灣台北：圓神出版社。
- 趙江林、孟東海

- 2005 《菲律賓—奇麗的島國》。中國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 潘婉明
- 2012 〈戰爭、愛情、生存戰略：馬共女戰士的革命動機〉，刊於《思想》，21: 43-69。台灣台北：聯經出版。
- 劉芝田
- 1970 《菲律賓民族的淵源》。中國香港：東南亞研究所、菲華歷史學會。
- 1971 《菲律賓伊戈律族》。中國香港：東南亞研究所、菲華歷史學會。
- 藍佩嘉
- 2008 《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灣台北：行人。
- 顧玉玲
- 2008 《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台灣台北：印刻。

英文文獻

Barton, Roy Frankin

- 1949 *The Kalinkas: Their Institutions and Custom Law*.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arth, Fredrik

- 1956 Ecology Relationships of Ethnic Groups in Swat, North Pakist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8(6):1079-1089.

Bacdayan, Albert S.

- 1967 *The Peace Pact System of the Kalingas in the Modern World*. Ph.D. disserta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Dozier, Edward P._

- 1966 *Mountain Arbiters: The Changing Life of a Philippine Hill People*.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 1967 *The Kalinga of Northern Luzon, Philippines*. New York; Chicago; San Francisco; Toronto; London: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Douglas, Mary and Wildavsky, Aaron B.

- 1982 *Risk and Culture: An Essay on the Selection of Techn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ng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ggan, Fred

- 1963 Cultural Drift and Social Change. In *Current Anthropology*,

- 4(4):347-355.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ublishing.
- 1967 Some Aspects of Bilateral Social Systems in the Northern Philippines, In *Studies in Philippine Anthropology*. Edited by Mario D. Zamora. Pp186-203.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Alemar-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 Faier, Leiba
- 2009 *Intimate Encounter: Filipina women and the remaking of rural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inin Gerard A.
- 2005 *The Making of the Igorot: Ramut ti Panagkaykaysa dagiti taga Cordillera*.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 Gross, Daniel
- 1990 Ecosystems and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The Ecosystem Approach in Anthropology: From Concept to Practice*. Edited by Emilio F. Moran. Pp. 309-319.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Greenberg, James & Park, Thomas
- 1994 Political Ecology, I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logy: Cas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Society*. 1:1-12. Tucson, AZ: Bureau of Applied Research in Anthropology.
- Goda, Toh.
- 2001 *Cordillera: Diversity in Culture Change, Social Anthropology of Hill Peoples in Northern Luzon*. Quezon City: New Day Publishers.
- Ichikawa, Kaoru ed.
- 2012 *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in Asia*. Pacifico-Yokohama: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UNU-IAS).
- Keesing Felix M.
- 1962 *The Ethnohistory of Northern Luzo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mieniecki, Sheldon & Margaret Scully Granzeier
- 1998 *Eco-Cultural Security and Indigenous Self-Determination: Moving*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Sovereignty, In *The Greening of Sovereignty in World Politics*. Edited by Karen T. Litfin. Pp.257-274.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Kottak, Conrad P.

1999 The New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1(1):23-35.

Lawless, Robert

1977 Social Ecology in Northern Luzon: Kalinga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Population, and Change. In *Papers in Anthropology*, 18 (1).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1987 The Kalingas: People of the North Luzon Highlands. In *World and I* 2(4): 476-489.

Latour, Brono

1993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Lodon: Harvester Wheastsheaf;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itfin, Karen T.

1998 The Greening of Sovereignty, In *The Greening of Sovereignty in World Politics*. Pp. 1-27.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Li, Tania Murray

1999 *Transforming the Indonesian Uplands-Marginality, Power and Production*. Singapore: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Magannon, Esteban T.

1972 *Religion in a Kalinga Village*. Quezon City: Community Development Research Council,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Moran, Emilio

2010 *Environmental Social Science: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and Sustainability*.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Mckeown, Adam

2011 The Social Life of Chinese Labor, In *Chinese Circulations: Capital, Commodities, and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Eric

Tagliacozzo & Wen-chin Chang ed. Pp. 62-83.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in the Philippines (NCCCP)

n.d. *Where to, Kalinga?* Baguio city: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in the Philippines, Ecology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gram- Northern & Central Luzon.

Peace, Adrian

1993 Environmental Protest, Bureaucratic Closure: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in rural Ireland, In *Environmentalism: The View from Anthropology*. Edited by Kay Milton. Pp.189-204.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Pheng, Cheah

1998 The Cosmopolitical – Today, In *Cosmopolitics - 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 Written by Pheng Cheah and Bruce Robbins eds.. Pp. 20-41.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lso in *Public Policy (the Philippines)*, special issue on Globalization in Turmoil, no. 2, 1998 (January-March), 106-130.

Stanley, Peter W.

1974 *A Nation in the Making: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99-1921*.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cott, William Henry

1975 *History of the Cordillera: Collected Writings on Mountain Province History*. Baguio city, Philippines: Baguio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Co..

1977 [1974] *The Discovery of the Igorots: Spanish Contacts with the Pagans of the Northern Luzon*.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New Day Publishers.

Sallnow, M. J.

1989 Precious metals in the Andean moral economy, In *Money and the Morality of Exchange*. Edited by Jonathan Parry and Maurice Bloch. Pp.209-23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ott, James C.

2009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ajise Edelweiss E., Borromeo Teresita H., Altoveros Nestor C., Bon Sancho G.
- 2012 Traditional Rice in Central Cordillera, Philippines: Dynamics of On-Farm Management of Varietal Diversity. In *Jouranl of Developments in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7:75-88.
- Tsing, Anna Lowenhaupt
- 1993 *In the Realm of the Diamond Queen: Marginality In An Out-of-the-way Pla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3 Agrarian Allegory and Global Futures, In *Nature in the Global South: Environmental Projects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Paul Greenough & Anna L. Tsing. Pp. 124-169.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2005 *Friction: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akaki, Michiko.
- 1977 *Aspects of exchange in a Kalinga society, northern Luzon*. Ph.D. dissert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adiar, Neferti X. M.
- 2009 *Things Fall Away: Philippin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the Makings of Globaliz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Wilmer, Franke
- 1998 Taking Indigenous Critiques Seriously: The Enemy ‘R’ Us, In *The Greening of Sovereignty in World Politics*. Edited by Karen T. Litfin. Pp.55-78.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 Welman , Frans
- 2012 *Face of the New Peoples Army of the Philippines: Volume One Cordillera*. Bangkok, Thailand: Booksmango.
- Zamora, Mario D. ed.
- 1967 *Studies in Philippine Anthropology*.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Alemar-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網路資料

Cordillera People Alliance

<http://www.cpaphils.org/> (2012/10/10)

Google Map

<https://maps.google.com.tw/> (2012/12/24)

Sugguiyao Natividad, Shiu Janice, Shiu-Buslig May

2011 The exercise of priority rights and its impact to the human security of the iBalatoc, Kalinga, In *Indigenous Peoples Issues & Resources*.

http://indigenouspeoplesissues.com/attachments/article/13129/SugguiyaoShiuBuslig_Philippines.pdf (2012/12/14)

菲律賓 Cordillera 行政圖(CAR)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rdillera_Administrative_Region (2011/12/12)

菲律賓旅遊局(Philippines Department of Tourism) ,

<http://www.philippinetourism.us/tourism/about-the-philippines-department-of-tourism/> (2012/11/07)

菲律賓國家電力公司年度報告(National Power Corporation- Annual Report 2010)

http://www.napocor.gov.ph/2010Annual/NPC.AR_2010.pdf (2012/10/02)

菲律賓原住民聯合會(Kalipunan ng mga Katutubong Mamamayan ng Pilipinas)

<http://www.aippnet.org/home/daily-sharing/967-philippines-stop-the-killings-of-indigenous-peoples-leaders-justice-for-genesis-ambason> (2012/11/15)